

摘

译

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9

1975



**摘 译**

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一九七五年第九期(总第九期)

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125 字数 115,000

1975年9月第1版 1975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2171·89 定价: 0.38元

**内 部 发 行**

## 目 录

### ·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

#### 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市场”的矛盾

——从斯威齐和贝特兰通讯说起……………成 扬( 1 )

#### 捷克斯洛伐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美〕 保罗·斯威齐( 5 )

#### 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

……………〔法〕 夏尔·贝特兰( 7 )

答贝特兰 ……………〔美〕 保罗·斯威齐( 11 )

再论过渡社会 ……………〔法〕 夏尔·贝特兰( 15 )

再答贝特兰 ……………〔美〕 保罗·斯威齐( 25 )

#### 无产阶级专政、社会阶级和无产阶级

意识形态 ……………〔法〕 夏尔·贝特兰( 31 )

后记 ……………〔美〕 保罗·斯威齐( 40 )

向社会主义过渡 ……………〔美〕 保罗·斯威齐( 41 )

### · 经互会问题 ·

经互会内部反控制斗争方兴未艾……………干 戈( 5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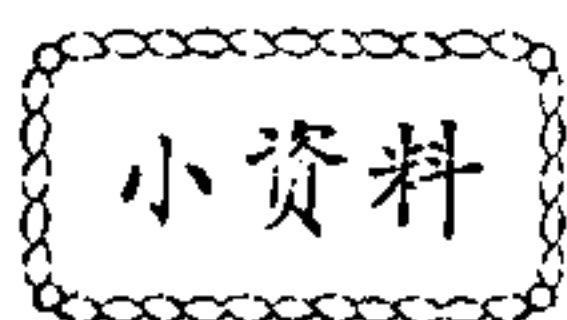
####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发展中的矛盾

……………〔苏〕 Г·Е·格列则尔曼等( 56 )

- 经互会国家的生产一体化 ……〔苏〕 A·祖勃科夫(61)  
 俄国在责骂它的经互会盟国 ……〔英〕《外事报道》(69)  
 苏联和经互会 ……〔西德〕 维利·迪克胡特(70)

· 苏修的海洋扩张 ·

- 挫败北极熊称霸海洋的野心 ……江 云(80)  
 海上的挑战 ……〔西德〕 沃尔方·霍普柯(83)  
 俄国的海上力量 ……〔加拿大〕 W·约翰·法夸尔森(93)  
 苏联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对海军力量  
 的看法 ……〔英〕 P·H·维戈(103)  
 美国海军能胜任全球的任务吗?  
 ……〔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编辑部(110)



小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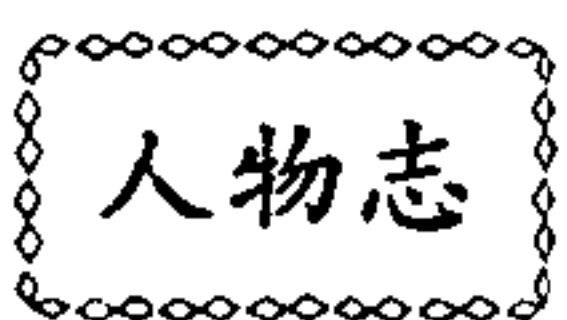
- 苏、美等国海军实力比较 ……(115)

- 中途岛之战 ……〔英〕 亨利·莫尔(116)

\* \* \*

- 格奥尔基斯库对资源消耗问题的新看法  
 ……〔美〕《商业周刊》编辑部(133)

- 旧金山唐人街的两次罢工 ……〔美〕《革命》月刊编辑部(139)



人物志

- 列昂节夫 ……(145)

- 汉森——美国的凯恩斯 ……(147)

- 中国和日本 ……〔日〕 贝冢茂树(150)

## 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 “计划-市场”的矛盾

——从斯威齐和贝特兰通讯说起

成 扬

一九六九年三月到一九七一年十一月间，美国《每月评论》月刊发表了该刊编辑保罗·斯威齐和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夏尔·贝特兰之间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讨论文章。斯威齐和贝特兰在讨论中，通过相互质疑，相互研究，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一些理论问题，对苏联为什么会出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作了一些探讨。现将这几篇文章摘译发表。正如他们所说：“我们还有许多极为重要的问题尚待探讨”，“这些问题理应详细解答，但由于其重要性和广泛性，却无法办到”。他们还认为，自己在一些问题上，可能有片面性，甚至有错误。但是，看一看他们如何认识这些理论问题，对于我们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在讨论中，当分析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原因时，这两位作者用了比较多的篇幅，开展了关于计划-市场之间矛盾问题的讨论，即计划经济和自由市场之间的矛盾的问题。他们提出：“把‘计划’跟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把市场跟资本主义等同起来”，这种看法对不对？可不可以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没有计划性作为区别一个国家的性质的标志？

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计划是什么货色，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对于披着社会主义外衣、实际上是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由于它仍然实行计划经济，有些人往往看不清楚。不是有人抓住这一点否认资本主义在苏联已经全面复辟了吗？因此，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就显得必要了。

苏修叛徒集团在篡夺了党政大权以后，形成了一个掌握全部国家机器和支配整个社会财富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把社会主义经济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这种经济，虽有计划，但显然已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了。因此，仅仅认为只要实行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苏修就是以这作为理由之一，把自己打扮成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其实，这根本不成其为“理由”。列宁早就指出：“目前最普遍的一种错误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断言的什么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完备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尽管托拉斯有计划性，尽管资本大王们预先考虑到了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但是现在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随着垄断组织特别是国家垄断组织的发展，也出现了在某些范围内“有计划地调节生产”的情况。一切修正主义者正是根据这一点，叫嚷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无产阶级发动暴力革命已经没有必要。列宁痛斥了这个谬论，并且断言：这些国家“无疑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在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看来，这种资本主义之‘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不容延缓，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



今天，用列宁的这个论断来分析苏联这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是多么适合啊！尽管它也搞什么计划，但是，“**无疑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正如两位作者说的：“这样的计划就是资本主义计划。”事实上，苏修的那种计划经济同当年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并没有多少差别。

区别一个国家性质的标志，决不是它的经济发展有没有计划，而只能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以及同它相联系的社会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生产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生产。在这里，出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它是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剩余价值规律相对立的。在这个规律的作用下，社会的生产目的变更了，不再是以榨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为目的，而是以满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劳动人民的需要为目的。与此同时，出现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种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同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出现的某些经济计划是根本不同的。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尽管也会有计划，但这种计划是服从于剩余价值规律作用的计划，是以掠取最大限度的垄断利润为目的的垄断计划。这种计划，同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存在的企业内的计划相比，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且，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完备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垄断资本的这种计划性，并不排斥它们之间的激烈竞争，价值规律作为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仍然在调节一切。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上蜕变而成的。在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商品货币关系的泛滥对于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极大的破坏和瓦解作用。今天的苏联，商品货币关系已经统治一切，市场经济也极度泛滥。但是应该看到，苏联是一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占统治地位

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全国的财富集中在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手中，这就决定了它要对全国的生产进行严密的控制，实行一定的计划。但是这种计划决不是社会主义的计划，正如贝特兰所说的，这种“计划”只能是“统治阶级为了确保它对生产资料和产品控制而采用的一种特殊办法”。只能是加紧掠夺和剥削苏联劳动人民的计划。同样，“完备的计划性”也是苏修“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在苏联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地方之间、企业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和斗争，在经济上，就表现为垄断和竞争，即计划和市场之间的矛盾。一般地说，掌握全国政权、全国经济命脉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集团要求集中统制经济；掌握地方政权、地方经济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以及企业中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则拼命要求充分的自由竞争。这是苏修统治集团内部一场狗咬狗的冲突。只要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这场斗争是不会结束的。显而易见，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条件下，尽管它也有相当严密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早已跟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了。它必然受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在垄断和竞争的交织中残酷地掠夺苏联劳动人民。

区分计划的不同社会性质，区分计划和市场的矛盾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不同性质，对于进一步认清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特点，对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工作，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都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加强计划工作，善于利用价值规律；同时防止价值规律冲击和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就要在党的基本路线统帅下制定和实行我们的计划。党的基本路线，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只有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我们的计划工作才能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服务。



# 捷克斯洛伐克、资本主义 和社会主义

〔美〕保罗·斯威齐

捷克斯洛伐克走向资本主义的表现是：实行企业自治，通过市场调节经济和依靠物质刺激——这三个因素的汇合不可避免地使经济产生了更强烈的资本主义倾向。

有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除非明文规定恢复生产资料私有制，否则就不能说这个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第四国际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明目张胆地说：“资本主义的复辟，只能是由于一种社会力量用暴力强使生产资料私有制重新建立起来。”这些人把法律范畴和实际生产关系混为一谈。实质上，只要企业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以赚取最大利润为出发点，从事市场商品生产，就是在主要方面恢复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跟这种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法律范畴迟早总会随之出现，但是，从历史的条件来看，他们不会贴上“私有财产”的标签。这完全不是一种空想的事情。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谈到股份公司时就已明确地指出：“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百九十三页）

由于股份公司的出现而使陈旧的、清楚的个人私有财产的概念已经变得如此复杂，那末，可以想象，在今天跨国公司和大量国有化的时代，这个概念变得更为复杂多了。例如在意大利和法国，国家直接或通过国营企业拥有相当多的生产资料——的确，那里实行的并不是私人所有制，但却是道道地地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并且，在将来还会出现其它各种新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

捷克斯洛伐克走向资本主义的三个方面的表现还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个制度仍然是我们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和中央计划管理制度的混合物。但重要的不是当前这个混合物的组成部分，而是这个社会制度发展的方向。毫无疑问，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过去五年中，市场因素的比重得到了发展，而且，近八个月中，自由化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为捷克斯洛伐克沿着市场经济发展扫除障碍。捷克斯洛伐克最著名的和最有影响的奥塔·希克教授被提升为杜布切克政府的副总理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希克教授或许是仅次于苏联经济学家利别尔曼的最知名的理论家和“市场社会主义”的鼓吹者；并且他还是在一九六四年开始推行的经济改革计划的主要设计者。

在“市场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南斯拉夫比其它任何国家都走得更远。假如有人想知道捷克斯洛伐克演变的过程，那末，一定要看看南斯拉夫所走过的道路。在一九四八年时，南斯拉夫已经转向市场经济了。在那里，不是只有五年而是有二十年蜕变的“经验。”

问题的中心是，不管是什么人，也不问他的意愿如何，只要他是加强市场经济，而不是反对市场经济，他就是在搞资本主义，而不是搞社会主义。

（摘译自一九六八年十月美国《每月评论》 师蒙译）



## 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

〔法〕夏尔·贝特兰

我十分感兴趣地阅读了一九六八年十月号《每月评论》上你写的《捷克斯洛伐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文。文章中有许多十分重要而精辟的论述。你说资本主义所有制不一定是“私人”所有制，我认为把它说成“个人”所有制可能更为妥当些，因为作为社会关系，资本主义所有制必然是“私人”所有制，即使它以“社会”的法律形式出现，也是如此。

然而，在你的文章中，也有某些论述我认为是错误的。

你的论点似乎主要是这样：复辟资本主义的倾向“起源”于市场的作用，“起源”于依靠物质刺激和实行企业自治等。

我认为，这几个问题只指出“次要的事实”，而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依我看，决定性的因素（即起主导作用的因素）不是经济，而是政治。

这个决定性的政治因素，是由这样一个事实引起的，即苏联的无产阶级已把政权丧失给新资产阶级了，今天的苏联共产党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已变为这个新资产阶级的工具了。

必须承认苏联无产阶级已经丧失政权，否则，我们根本无法解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苏联的国际政治路线以及“改革”和“改革”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你不是把阶级关系（“集体”拥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而

是把市场关系看成是首要的因素,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原则性错误,并导致了許多其它的错误。

这个原则性的错误,正是你在文章的第七页注释末尾所抨击的;在那里,你说,为了弄清楚生产方式的性质(或社会结构的性质),“人们必须深入表象之下去揭露根本的关系和过程”。但你在解释社会结构的性质时,又把重点放在“市场”的存在上(因此也就是把重点放在货币和价格的存在上),这恰恰就是把重点放在表象上,放在那些“一目了然”的东西上,因此不能抓住根本的关系。这些关系存在于生产领域中,即存在于基本社会关系之中。正是这些关系所构成的体系,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对人们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其中一个主要的影响是把人们分成各种社会阶级,并把这些阶级置于一定的客观的支配和剥削等关系之上。

这个原则性的错误,即把重点放在表面现象上,放在市场、货币和价格的存在(这些东西在“二十大”以前也存在,并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都存在)以及有关“市场”方面的领导人的实践上,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别的错误。

你非常正确地指责使用“市场社会主义”这个术语的错误,但你指责的不是市场关系的发展,而却是它的存在本身;而且,你孤立了这一存在,因此忽视了可能使市场关系充分发展的社会和政治条件。

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特征,不是在于市场关系、货币和价值等是否存在,而是在于无产阶级统治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存在。正是通过在一切领域(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市场关系才能逐渐地被消灭。这种消灭不能靠“颁布法令”或“发表宣言”,它需要政治上的策略和战术。缺少这些东西,最好的宣言也可能导致人们走到和期望的目标相反的一面。



“直接”和“立即”取消市场关系的想法，是危险的乌托邦的想法，正如要求“立即废除”国家一样，两者在本质上是一码事，都忽视了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过渡时期的特点。

市场形式的发展或收缩，是一种社会关系发展的标志，但它仅仅是一种标志。因此，如果把自己“局限”在这个标志内，而不去阐明决定这个发展的矛盾的运动，就会可能使人完全迷失方向。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掌权的无产阶级也可能在经济战线上被迫进行战略或战术上的退却。

不用说，为了使这种退却不致于转变为失败，首要条件就是必须把这种退却如实地理解为退却，而不要把它理解为“胜利”。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消除市场关系，但这只有到国家消亡时才有这个可能，也只有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时，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如果说，苏联资产阶级的复辟是伴随着市场作用的扩大而来的，那么，这显然是由于只有通过市场关系的全面复辟，这种统治才能全面完成。

据我看来，你的另一个错误就是声称“市场和计划的矛盾的存在”是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动力。

实际上，当这种矛盾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时候，它并不是一种能导致出现其他事物的动力。一切事物都依赖于解决事物矛盾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本身又依赖于阶级关系，包括意识形态上的阶级关系。

你明确地提出的这些理论，实质上掩盖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即政权问题，正如我以前所提到的，为了巩固这个政权，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需要在经济战线上退却（如“新经济政策”）。如果照字面上理解你的理论，那么列宁制定“新经济政策”（也就是“加强市场”），大概就会被认为是“促进资本主义”了。

我以前所提到的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所引起的思想混乱，是因为思想替代现实的结果。我想古巴领导人的政治实践情况也是如此。

如果这个领导认为市场关系问题有如此多的“重要性”——甚至使市场关系问题成为它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实践的“中心”，这不可能仅仅是主观“错误”所造成的。这是一个意识形态与政治路线的结果，这种路线集中所有的权力在统治集团手里，因此它不创造无产阶级民主地行使权力所必需的意识形态、组织和政治上的条件。

一方面，这种政治实践和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政治统治是有关的。另一方面，它产生出必然的结果——这结果必然把它们自己强加在一个“向往”社会主义的政府身上。

这些结果之一，恰恰是一种思想替代现实：不把社会主义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因而等同于劳动群众的权力，马列主义思想的统治，革命领导的群众路线的实践等等）而是等同于市场关系的“消失”。

这一“消失”显然纯粹是神话。在特定的必然包含货币、价格存在的具体环境下，市场关系是不会“消失”的。“否定”这种存在，必然会走向目标的反面——主要的是黑市猖獗。尽管借助于讲话与镇压，但这些实际关系的作用，最后总是要发生影响的。

用市场、货币等等“消失”的神话来代替必要的无产阶级专政，显然涉及到一条政治路线——一条与明确的社会力量和意识形态相适应的路线。

（摘译自一九六九年三月美国《每月评论》 上海电机厂  
“五一”工大工人业余翻译组译）



## 答 贝 特 兰

〔美〕保罗·斯威齐

首先我想感谢贝特兰教授的细加斟酌的批评。

在这里，我打算消除某些误解。如果我是正确地理解了贝特兰的意思，那末，他是把“市场关系、货币和价格”的实际存在是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因而也就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加在我头上。现在我得讲明，我决没有丝毫的打算或倾向于赞助贝特兰加在我头上的观点。我真正的看法是：市场关系（这当然是指货币和价格）在社会主义的一段长时间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给社会制度造成了一个经常性的危险。除非对它严格地加以限制和控制，否则，必将导致蜕变和后退。在一九六四年三月《每月评论》的社论里我们就曾经说过：“我们一直没有提出过立刻废除为利润的生产，更不用说在任何不久的将来社会主义社会能期望废除市场关系。但我们一直说为利润的生产必须有组织地加以限制，并且迅速地把它缩小到尽可能小的范围内。而且，必须严格地管理和控制市场关系，免得它象扩散的癌细胞，失去控制并致命地危害社会主义健康的政治机体。”

保罗·巴兰和我的观点相同。我们在《垄断资本》一文中写道：“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作为指导有效地分配和利用劳动力及物质源泉的等价交换原则，必然存在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然而，由于同样的原因，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就需要同这个原则作不间断的斗争，并最

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原则。”

在贝特兰所批评的文章中，我苦心地阐明，在捷克的经济中，重要的东西不是市场关系的存在，宁可说，“重要的是……社会制度发展的方向。毫无疑问，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过去五年中，市场因素的比重得到了发展，而且，近八个月中，自由化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为捷克斯洛伐克沿着市场经济发展扫除道路上的障碍”。并且还说：“问题的中心是，不管是什么人，也不问他的意愿如何，只要他是加强市场经济，而不是反对市场经济，他就是在搞资本主义，而不是搞社会主义。”

当然，这是十分概略的说明，没有顾及朝一个或另一个方向的、暂时的或相反的变动的可能性。如列宁认为的，新经济政策恰恰就是这种变动。但是，今天在苏联和东欧对市场不断增加的依赖性是一回事。不可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一种暂时的退却，而应看作是意识形态所允许的，并占有合法地位的社会主义的一种进步。

这种见解的必然结果是：市场和计划，从这两股势力不能并存这一意义来说，它不是一组绝对的矛盾。但从这两股势力彼此对立，为取得主导地位而陷入无休止的斗争中这一意义来说，它却是一组矛盾。问题不在于在多大范围内利用市场，而在于在多大程度上把市场作为独立的调节者。当然，这一点不是经济“法则”问题，也不是政权和经济形式的产物，而它确是政权和经济政策的问题。因此，我必须完全拒绝贝特兰的批评，他的意思是说，我只关心表面的现象、经济形式和次要的事实，等等。相反，我关心的却是那些对于社会过渡带有决定性的根本问题：权力的分配和利用，这是决定社会是否前进到社会主义，或者倒退到资本主义的问题。

这个问题从逻辑上引导到对贝特兰的理论加以考虑，他认



为在苏联和其它一些东欧国家里，新的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而正因为这一点，最近几年来，市场关系受到了鼓励和发展。他相信，在这一过程中“二十大”标志着是一个转折点，但他又断言，“如果那里早已不存在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关系，这过程就不可能有它独特的内容和影响。”接着又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这些社会关系的发展不是“取决”于市场的发展，而恰恰相反，是市场的发展取决于社会关系的发展。

对于讨论的“过程”问题，我有不同的看法，新的资产阶级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展，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辩证的，相互作用的关系。首先是官僚统治阶层（还不是一个统治阶级）权力的巩固，随之出现群众不问政治的倾向。没有革命的热情和没有群众参加制定计划，计划经济越来越依靠强迫命令而走向僵化，于是困难重重，失败屡屡。统治者借助于资本主义的技术去谋求解决这些愈来愈严重的问题，并给企业以日益增多的管理权；而在指导和管理企业方面，计划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小，受市场的压力就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国有财产的这一法律形式也就逐渐变得空洞无物，而对于生产资料的实际控制权（即所有制概念的精髓），便逐渐落到经理阶层的手中。正是这个“拥有”生产资料的集团，发展成一种新型的资产阶级。这些资产阶级自然渴望市场关系的进一步、更迅速的发展。这个过程就是削弱“旧的”官僚统治阶层的权力和特权，因而导致资产阶级报刊所谓“自由派”（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保守派”（老官僚）之间的斗争的过程。后者既然拿不出解决日益增多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办法来，只好且战且退，以此应付新资产阶级朝着市场和利润方向的发展。从逻辑上说，这个过程的结果是建立起新型公司的私有财产制并使之合法化。只有当这种情况产生时，我们才能说一个真正的新的统治阶级产生了。

以中国的事情为例，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官僚统治阶层正在滋长并在巩固它的权力。到一九六六年时，似乎就很清楚了，它在党中央委员会里已占多数，并窃取了中央和地方行政机关大部分的要职。非常可能，它很快地将会朝着以东欧国家为先例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但是毛泽东和他的忠实追随者绝不允许倒退。他们发动了文化革命，唤醒群众，罢了官僚主义领导的官，这样保证了中国至少在目前和最近的将来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我希望经过长期的努力，我们还是能够向着一种具有生命力的理论迈出第一步。这一过渡的理论同帝国主义论，确实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大问题。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仅仅是第一步，并且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关于过渡社会中正在发生的事情。

（摘译自一九六九年三月美国《每月评论》 上海电机厂

“五一”工大工人业余翻译组译）



## 再论过渡社会

〔法〕夏尔·贝特兰

来信提出了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我相信这将会大大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澄清各自的观点,从而深入到某些问题的核心。

我并不打算对你信中提出的全部论点逐一加以论述(事实上我正准备写一本书,书中将阐述其中若干问题)。因此,这里我只想针对你提出的某些概念,谈谈自己的看法。

看了来信,我感到,关于“计划和市场”问题,我们已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一致意见。因为据我看来,你承认在某一特定的时期中,市场关系的衰退或发展,并不足以表明是在向社会主义前进或是在向资本主义倒退,而且用阶级观点来看,具有政治意义的是如何控制市场关系可能会有的发展。因此,在某一特定时刻内,市场关系的变化程度并不足以表明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程度(如果这种推论成立,苏联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是最接近于社会主义的了)。

从根本上说,向社会主义前进,无非就是直接生产者逐步加强对生存条件的控制,首先是对生产资料和控制。这种控制只能是集体的控制;而所谓“经济计划”正是实现这种控制的手段之一。不过,只有在政治条件业已确定的情况下才是这样,因为如果不具备这种政治条件,“计划”只是统治阶级(他们不同于依靠自己劳动产品为生的直接生产者)为了确保它对生产资料和产品控制而采用的一种特殊办法。

但是，你在同一封信内提出的公式，却赋予“计划-市场矛盾”以一种它本身不可能具有的意义。我想简单谈谈我的看法。

据我看来，“市场”、“计划”这两个术语是意识形态的术语，而不是指实际关系。正是在此意义上，我认为“计划-市场”矛盾依然是一种“表面现象”。就事论事地谈论这一矛盾，是无法领会它的真实含义的；只有揭示了潜在的矛盾（它们涉及到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才能把握住它的实质。因此，归根到底，“计划-市场”矛盾只是这些潜在矛盾的一种表现。

既然情况如此，不言而喻，“计划-市场”矛盾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基本矛盾；它既没有表明阶级矛盾（政治矛盾），也没有表明经济矛盾（实际上，也就是从经济角度来看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而仅仅表明这些矛盾的某些变化不定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得以表现的“场所”。

更确切地说，“计划-市场”矛盾乃是以比喻的方式，表示两个“舞台”之间的矛盾<sup>①</sup>。

买主、卖主、中央计划制订者、企业经理、行政管理者等等（也就是“演员们”）登上了这两座“舞台”。这些演员并非作为社会关系的体现者和实现某些职能（这些职能是由现存的社会关系、主要是由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了的）的代理人、而是作为具有“自由意志”和一定的“心理活动”等特征的“主体”在“舞台”上出现的。

这些登场的演员，进行活动的“舞台背景”（制定计划、管理企业等）以及似乎“把他们联系在一块”的各种关系的形式，掩盖

---

<sup>①</sup> 修正主义者正是在“市场-计划”矛盾的“基础”上，阐明他们主张采取“经济改革措施”的论点。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显然并非出于偶然。（参见奥塔·希克所著《社会主义期间的计划和市场》一书，布拉格，一九六七年，第三百八十二页）



了实质性的东西——演员们所体现的、并又在别处再现的基本社会关系。这里所说的“别处”，是指：经济领域（生产部门）、政治领域（权力机构）、意识形态领域（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工具：中小学、大学、报刊、电台等）。

如果过度地渲染这两座舞台（“市场”和“计划”）的重要性，竟说从中“找到”了基本矛盾，那末，就不会对实际社会关系作出具体的分析，而是代之以一般性的描绘，描绘占据这两座“舞台”前部的演员们的“表演”以及实际社会关系在这两座“舞台”上出现的各种形式。

对处于过渡时期各国的政治史和经济史、对这些国家向社会主义前进或向资本主义倒退的史实、以及对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记述和研究这一史实的方法，作了全盘考虑之后，我切实感到亟需改变立场，也就是说，必须跳出近四十年来发生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域”，跳出“市场”和“计划”这两座“舞台”。

因此，必须向其他领域进行探索（这是不容易的），必须越出那些当前存在着的、既反映又掩盖实际关系的形式。我们必须努力掌握的正是这些实际关系，因为真正的矛盾（包括反映过渡社会真实历史的各个阶段特点的主要矛盾）就是在这些实际关系中间才得以发展的。

为了能理解这些关系和矛盾，为了不致被人指责是以比喻的方式来描绘这些关系和矛盾，为了能掌握这些关系和矛盾，就有必要进一步对表现形式作分析，也就是参照马克思当年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方法，对过渡社会所特有的形式进行分析：必须透过各种表现形式和以此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概念，揭示出既被反映同时又被掩盖起来的真正的社会关系。

人们应该从今天起（之所以要从“今天”开始，乃是因为现实历史已向我们表明：所有幻觉都是由这些表现形式所引起的）就

开始进行这种分析。如果不作这种分析，人们就会继续以一种近似的方法行事，更严重的是，就会继续站在对阶级敌人有利的立场上，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幻觉，结果也就助长了形形色色的剥削、统治和奴役等现象。

为了继续先前谈到的论点，我要说，如果把“市场-计划矛盾”看成是过渡时期的基本矛盾（就象我过去经常认为的那样），就会：

（1）继续停留在形式的领域内，把实际矛盾所引起的一系列后果说成和这些矛盾无关，而把它们仅仅归结到“市场”和“计划”的对立上去；

（2）成为列宁所说的经济主义的俘虏，因为把特权阶层的出现，归咎于一种以经济矛盾形式出现的“矛盾”，从而丢掉了关键性的阶级斗争；

（3）找不出每个阶段的主要矛盾，分析不清主要矛盾的发展，抓不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转化过程。

这样一来，人们就必然会赋予“市场”或“计划”以某些“品格”或某些固有的“属性”，也就是说，必然会把市场关系或中央计划关系可能引起的结果，同这些关系所展示的政治条件割裂开来。而只有这些政治条件，即阶级斗争，才能给这种或那种经济形式在某一特定时刻内的发展以真实、具体的含义。当然，我们都知道，向社会主义前进要求商品关系消失，并使之让位于社会主义关系（“计划关系”仅构成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而这种形式也可以同非社会主义关系相符合——这一点，我将回过头来给以说明）。

总之，我们需要从“市场”和“计划”以外的角度来系统阐明问题。说得更确切些，我们必须承认，如果说，一般意义上的“计划”并不是主要矛盾的“极点”，而“市场”也不是主要矛盾的另一



“极点”，那末，这是因为：真正的矛盾（即“市场-计划矛盾”从意识形态角度所表示的矛盾，不过这一词组既揭示了同时也掩盖着这一矛盾的存在）涉及到生产者对他们的生存条件和成果是否具有支配权。

商品关系的存在，阻碍着生产者对其产品的支配；商品关系的高度发展，导致资产阶级对直接生产者的控制，从而使生产者丧失其对生存条件的支配权。这种讲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因此，说消灭商品关系是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之一，也是正确的。不过还应该看到，由于当前还受到政治、思想以及经济方面的限制（这是同现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相联系着的），不能立即消灭市场范畴和资产阶级法权（你一定会想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特别对法权问题作了说明），只有经过政治、思想和经济等各条战线上的长期斗争才能消灭它们。这就说明，为什么目前在中国，市场关系、货币和价格等都还没有消灭，也说明，为什么消灭市场关系的任务乃是一项历史的任务。

然而，对我来说，这里还有一点也是极为重要的：绝不能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任务而看不到下列事实，即“计划”和“计划关系”也会阻止生产者支配他们的生存条件和成果。

这最后一个命题包含着长期来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的一个问题，即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有“计划”和“规划”，资产阶级同样也可以有自己的“计划”和“规划”。

资产阶级的“规划”虽带有一定程度的神话色彩，但它仍然是资产阶级政治的工具。

把“计划”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把“市场”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确实存在这样的倾向），只会帮助资产阶级（特别是苏联

的资产阶级)在“计划”的幌子下,行使其统治权,并以“计划”为名,剥夺被剥削阶级的一切发言权,进一步强化对广大群众的剥削。

此外,还有一点在我看来也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的条件,计划才成为生产者支配他们的生存条件和成果的工具。要想使计划起到这种作用,那就必须在群众首创精神的基础上,精心编制计划然后付诸实行,使计划集中反映群众的经验和智慧,并把两者协调起来。这种“协调”无疑地还必须保证能充分考虑到技术上和一般经济上的要求以及所有客观的可能性。只有扎根于群众并且受到群众监督的计划,才是更加有效的计划。

一个没有“集中”群众智慧的计划,那是资产阶级的“计划”,而不是社会主义的计划,它就不是市场的“对立物”,而是补充市场或临时代替市场起作用的东西。

在实践中,上述事实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忽视(包括我在内<sup>①</sup>),现在,如果一个人认识不到这一点,就看不到下列事实:只有确保生产者对劳动条件和产品的控制,才谈得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必须经常回顾的一个难题是:在生产高度社会化的条件下,生产者对其生存条件的支配,要求发展完全新型的社会关系;而

---

<sup>①</sup> 这需要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来领悟这个真理(它一再为那些所谓“国家财产”和“计划”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理论所掩盖了),这个真理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苏联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和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供了这两方面的经验。

就我自己关于这些问题的著作而言,你已经正确地注意到我在一九六七年所写文章的观点的改变。这些改变绝非偶然。在一九六七年时,大家都目击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发展;对我个人来讲,这一年也是我又一次旅行中国的一年,在那里我可以一点一点地领会文化革命的复杂性、范围和它的深远意义。



如果那些允许剥削和阶级统治的旧的生产关系还继续重新产生,这些新的关系就不能得到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工人阶级能通过它的先锋队强制建立一定的无产阶级关系;这是主要生产资料国有化的结果之一,因为它打碎了资产阶级用以实行其统治的法权体制。

然而,旧的资产阶级关系和各种政治的和思想意识的机构的重新产生,表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尽管生产资料实行了国有化,依然存在着重新产生资产阶级社会势力的关系的因素。

正是这种情况,因为阶级斗争继续存在,使得无产阶级专政成为一刻也不可缺少的东西。这种阶级斗争可能产生的结果之一是,资产阶级社会势力以不易察觉的形式重新攫取政权。一旦资产阶级势力的代表人物篡夺了国家和执政党的领导权,这种情况就会出现;从那时起,国家、国家财产和计划的阶级性质,就不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了。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对其生存条件的支配权完全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剥削阶级的支配权。在旧的经济、思想和政治关系基础之上的剥削阶级,只能是一种当前以国家资产阶级形式出现的资产阶级。而且,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还带来某些特殊矛盾,这些特殊矛盾尚有待于进一步分析。

因而,如果人们认识到,生产者对其生存条件的支配(也是对生产资料及劳动产品的支配),正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所在,那末,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向着社会主义前进,就需要改造这一支配权的各种形式,以使它日趋完善。在我看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意义即在于此。而阶级斗争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实现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各部门的革命化,因为这些部门有可能使资产阶级社会关系重新产

生；只有革命化，才能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而代之以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

由此可见，从社会主义观点来看，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经济的“调节”形式，而是掌权阶级的性质。换句话说，根本问题不在于究竟是由“市场”或是由“计划”（或“国家”）支配着经济，而是在于由哪一个阶级来掌握政权。假若把国家指导经济的职能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那末，确保政权阶级性质的任务就会置于从属的地位，这种作法显然是本末倒置<sup>①</sup>。

“计划-市场”或“市场-国家”这样一组术语对现实的矛盾仅提供了一些暗示，而本身却反映两者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情况，清楚地说明这对词组所描述的矛盾带有意识形态上的特征。从经济上看，市场的存在（事实上，即商品关系的存在），是资产阶级统治可能重新建立的条件；而从政治上看，国家（政权存在的一种形式），也是资产阶级统治可能重新建立的条件。在这一点上，“市场”和“国家”不是根本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根据每个时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的性质，或是市场起着主要作用，或是国家起着重要作用。

列宁着重指出，主张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的政治支配形式，总是包含着资产阶级关系，所以他也强调了苏维埃政权形式和巴黎公社经验的重要性，因为从这些政治形式所产生出的“新型国家”，是把资产阶级关系摆在从属的地位。这样，这些国家也不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资产阶级国家，实际上是由少数人对多数人施行暴力，无产阶级国家是多数人对少数人施行暴力。这里就包含着国家机器的结构和任务以及它和群众

---

<sup>①</sup> 在这一点上，人们可以注意勃列日涅夫耍的花招。为了竭力掩盖苏联背弃无产阶级专政的事实，他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正式宣称，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国家指导经济建设”。这种提法正是回避了政权的阶级性质。



关系等一系列的彻底变革。正是这一系列的彻底变革，才意味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虽然它还包含着那些使资产阶级有可能重新夺取政权的关系。<sup>①</sup>

资产阶级国家的根本特点，是国家机器和群众相“分离”，高踞于群众之上，控制和压迫群众；而工人阶级的国家，则不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它是劳动群众自己行使权力的工具（巴黎公社，苏维埃政权和中国革命委员会的实质即在于此）。

显而易见，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主要是根据阶级力量的关系，工人阶级政权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这一政权，特别通过无产阶级“先锋队”即马列主义的共产党，行使自己的权力；这样的政党，只有当它真正是一个先锋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代表整个阶级，并和整个阶级采取一致的步调，而无意取代工人阶级，才是在行使无产阶级的权力；一旦这个政党取代了整个阶级，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整个阶级，不再发挥领导作用，那末它就不再成为先锋队了。

只要权力机构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不是统治和压迫的关系，而是先锋队和群众的关系，允许群众发表他们的意见，使得领导有可能集中群众的正确思想，那末，工人阶级的政权，即使采取各种不同的具体形式，也不会影响它的阶级性质。相反，一旦权力机构脱离群众，对群众进行统治和压迫，这些机构就不再是工人阶级国家的工具，而成为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工具。这里不可能存在“第三条道路”，尤其不存在“官僚政权”，

---

<sup>①</sup> 同样，无产阶级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不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军队：军队的内部关系，也不再是资产阶级军队的内部关系，军民关系也完全不同；它为人民服务，相互协作，不再过寄生的生活，等等。在苏联，军队内部的无产阶级关系，从来就没有发展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那样的地步，这一点显然关系重大，不容忽视。

因为官僚即使在滥用行政特权时，也总是为某一统治阶级服务的。

上面所述，就要求我对你信中正确提出的某些其它问题加以考察，特别是关于我为什么要把今天苏联掌权的阶级称为“资产阶级”的理由。这个问题必须提出来。上次信中我没有谈到这个问题，而在这封信中，也只作了部分回答。事实上，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从理论和具体实践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摘译自一九七〇年十二月美国《每月评论》 上海第一  
钢铁厂工人业余翻译组译）



## 再答贝特兰

〔美〕保罗·斯威齐

来信批评我在前几封信中所使用的“计划-市场”一词，含义不清，不宜再用。批评得颇有道理，令人信服。我想到的并不是历史上的任何个别具体计划，而是具有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那种计划。不过，这确是用未经证明的假设来作辩解；目前，在世界各地有着五花八门的各种计划，而这些计划正如你正确指出的；即可以用来作为补充市场的手段，也可以用它代替市场发挥作用。

我认为，我过去集中精力研究的这个现实问题，不是根据一些抽象的理论术语就可以搞懂的，而只有把它放在十分具体的历史背景上才能弄清楚。迄今所发生的一切革命（即从占统治地位的旧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的革命），都面临着如何管理经济这样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这项任务不能靠市场的自发力量（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无形的手，马克思所说的价值规律）来解决，而必须由国家政权来承担，其理由是不言自明的。一种切实可行的市场体系，是以一整套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其中包括财产所有制的形式、收入的分配、生产资源的利用和调拨，等等。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比较稳定的价格系统，市场才能对变化着的情况进行逐步的调整，同时还使财富和权力的现有分配形式得到发展和巩固。一场真正的革命，一般来说，只有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处于土崩瓦解的情况下才会爆发，为

加强自身并削弱敌人而采取的革命措施，也有助于彻底粉碎旧的社会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依靠市场体系。要彻底摧毁旧制度，要使新的阶级掌握政权，就必须强行安排社会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大刀阔斧地彻底改革整个经济体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的消灭或消失，更不用说货币关系的消灭或消失了。工资必须用货币付给，商品必须通过现存的渠道并以人们习惯了的方式分配给消费者。在简单商品生产的部门内（象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这种部门无疑还占有极大的优势），尽管市场容易遭到干扰和破坏，但肯定还会以传统的方式继续进行活动。但是，不论这些部门占有多大优势，它们本质上仍然是消极的和反动的。而那些生气勃勃的部门（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外贸、金融、公用事业等），必须置于新政府的控制之下，新政府绝不能逃避管理这些部门的责任。为此目的而采取的一些政策，可能是权宜之计，也可能经常变更，但只要这些政策由中央统治机构加以协调，它至少能提供一项计划的雏形。苏联从二十年代以来的许多实践经验表明，这些计划的雏形，实际上已发展为成熟的、系统而周密的计划，直接指导并支配着整个经济体系的活动。尽管价格、货币甚至自由市场依然存在，但这些商品-货币关系，已逐步适应于并服从于那些为实现新掌权者的主要目的而制订的计划。

在我看来，需要探讨的关键问题是：向社会主义前进或是倒退的过程（计划的制订从中起着重要作用），究竟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这里，我姑且接受你给社会主义所下的定义；社会主义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它的实际生产者直接支配着他们生产活动的条件和成果。不过，我得承认，我想你也会承认，这种提法会引起许多困难的问题。）

假如我没有理解错，你的回答是，一个国家是否向社会主义



前进,取决于无产阶级是否掌握政权。如果是的,那就会朝着社会主义前进;如果不是(在这里,你似乎也没有讲清楚革命之后可供选择的道路),旧的剥削关系就会保存下来,新的国家资产阶级就会上台。在这方面,你没有提到在整个经济中,市场因素的发展所起的特殊作用或重要作用。

在我看来,上述公式与其说是错误的,还不如说对理解问题帮助不大。我觉得,除了看党和国家执行的政策外,你没有提出判断无产阶级是否掌握政权的其他标准来。为了使理论能更好地说明问题,难道不需要确立一条鉴别哪一个阶级掌权的“独立的”标准?也就是说,新的国家资产阶级,究竟是通过什么形式,经过哪些阶段发展起来的?也许其中,最重要的是在什么条件下无产阶级将会获胜,而又在什么条件下新的国家资产阶级将会获胜?我的讲法可能不对,但至少从目前讨论的情况来看,你对上述和其他至关重要的问题,没有提供有启发性的答案。

我这样说的理由是很清楚的。这是因为,我们必须更明确地给不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下一个定义,也因为二十世纪的革命,正是发生在这些不发达国家里的。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无产阶级的概念当然是十分清楚、非常具体的:它是指那些受雇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工资劳动者。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他们组成了工人阶级的多数,并在总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作为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产物,这些劳动者势必具有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某些思想品质:团结一致、互助合作、平等主义,等等。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无产者可看作是由资本主义塑造出来的“新人”。他们有愿望、有决心也有能力推翻旧制度,并在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中起领导作用。<sup>①</sup>革命的政党正是由这个

---

<sup>①</sup> 论述这一进程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是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

阶级中最先进的、最赤胆忠心的和最无产阶级化的分子所组成。这就决定这个党具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它的作用是领导和指引革命的发展。从政治上来讲，无产阶级掌权后的任务，一方面是镇压反革命，另一方面是通过教育和其他途径，把其余受压迫者（农民、小资产阶级、流氓无产者）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从经济上来讲，它的任务是提高生产率，杜绝浪费和铲除不合理的现象，并尽可能迅速地从商品生产过渡到一个高度计划化的经济体系。完成了这些政治和经济任务之后，整个社会就会相应地从资本主义经过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全面过渡。

有人认为，在已经发生革命的国家中，从未出现过上述设想的那种无产阶级，同时在那些国家中，也从未具有容许无产阶级成长的条件。我对这两个论点都不同意。我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四分之一世纪内发展起来的俄国无产阶级，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诚然，相对于总人口来说，他们人数很少，但集中在大城市内，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一九一七年所证明的那样，它能够在当时那种混乱环境中夺取政权，假如革命后有过一段那怕是很短的和平时期，那末，我完全相信，俄国无产阶级能使自己成为一个统治阶级，并通过它的先锋队管理国家，按照经典理论所论述的方式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十月革命后的连年内战和外国入侵，俄国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成员牺牲了。正如艾萨克·多伊彻所说：“原来的劳工运动，信心足，阶级觉悟高，辩论时慷慨陈词，斗志昂扬，政治活动热气腾腾。同时还拥有大量机构和组织、工会、合作社以及教育性质的俱乐部，而现在，这个运动冷冷清清，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sup>①</sup>

---

<sup>①</sup> 见《解除了武装的预言家托洛茨基(1921—1929)》，纽约一九五九年版第六页。多伊彻的最大功绩之一是，他清晰地看到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间俄国无产阶级变化的性质和意义。



布尔什维克党一度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现在却发现自己缺乏真实的阶级基础，同时，还得肩负起治理、领导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重任。在这种情况下，不具备完成社会主义过渡所必须先决条件也是不足为奇的。党建立了专政，完成了工业化的丰功伟绩，做好了迎击帝国主义列强侵犯的准备，但是，代价却是政治、经济方面官僚的激增。这些官僚，与其说是代表新生的苏维埃工人阶级，还不如说是压迫新生的苏维埃工人阶级；他们逐步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成为新的统治阶级。

据我看来，关键的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着这种专政向社会主义迈进或是向资本主义复辟倒退。领导者的魄力、经验和对社会主义的赤胆忠心，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但这显然还不够。领导不能够在真空中活动，各国人民在走向社会主义时，他们的觉悟程度也并非都是一样的。可以这样说，每一民族都具有由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或多或少和社会主义目标相一致的特点。以美国为例，由于国内资产阶级的根子扎得很深，种族主义思想和行为泛滥，帝国主义行为十分猖獗，美国人民的包袱是极为沉重的。但是，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在美国人民中是否存在着相当一部份的人，能够肩负起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赋予无产阶级的任务，这些人尽管不是在特定的无产阶级环境中生长的，但基本上具备了无产阶级的品质。经过人民大众的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是有可能锻炼出这样一批革命者的。这支革命力量不仅对推翻旧制度，而且对建设新制度都具有巨大的意义。

在不发达国家里，即使革命者掌握了政权，也不能避免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二〇年所面临的问题，而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同样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出大量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官僚主义，而且这些官僚主义也往往会以苏联官僚主义演变的

方式逐渐演变。但是现在,有了一种潜在的有效的平衡力量,为真正的、群众性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奠定了基础。如果领导对这一系列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并决心避免重蹈苏联的复辙,那末,就可以动员经过考验的、真心诚意的追随者,动员尚未受特权思想腐蚀的青年,给官僚主义以粉碎性打击。通过这种途径,就能扫清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制定和实行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意义的无产阶级政策。我认为,中国近年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所发生的情形,就正是这样。

在我看来,应该联系向资本主义蜕变和向社会主义前进这两种势力之间的斗争,来分析过渡社会中的市场问题。正如我在早些时候给你的复信(一九六九年三月号《每月评论》)中所阐明的那样,我从不认为过早消灭市场关系,是切实可行的或是值得一试的,而且从你上面的信来看,我想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彼此了解的。我所要强调的是,在由政府部门管理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这是难免的),有两种在政治上截然相反的解决困难的途径。一条是减少官僚主义作风,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越来越多地信任和依靠工人阶级的主动精神和责任感。这是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断完善的道路。另一条是越来越依靠市场,并且公开打着提高“社会主义”经济效率的旗号,大搞利润挂帅,鼓励工人埋头生产,多劳多得,这就为商品拜物教的广泛传播敞开大门,也为随之而来的尔虞我诈、离心离德等腐朽意识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我认为,这就是倒退、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

最后,我要强调指出,正因为消灭商品关系是一项“历史任务”,所以就丝毫不可对商品生产掉以轻心。

(摘译自一九七〇年十二月美国《每月评论》 上海第一  
钢铁厂工人业余翻译组译)



# 无产阶级专政、社会阶级 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

〔法〕夏尔·贝特兰

斯威齐的见解（见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号《每月评论》）表明，我们以前通信中所提出的一些主要问题，在基本答案上终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诚然，这些问题理应详细解答，但由于它的重要性和广泛性，却无法办到，至少在一篇文章中是办不到的；要详细解答，非要写成厚厚一部书不可。在这里，提出一些扼要的回答，仍然是可能的和有用的。

## 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特点

由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始终混淆不清，所以我们应该回顾一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就是为了能够创造一些政治条件，即在直接生产者能以社会方式集体支配生产资料和生存条件之前，就必须存在的政治条件。我们也应该回顾一下，这种支配决不是靠国家支配生产资料和“经济计划”而得到保证的。这种支配（只有经过持久的阶级斗争才能获得）能否实现，首先是要看生产者是否掌权，虽然并不是仅此而已。我们不妨在此回顾一下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所指出的：“毫无疑问，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政权问题是不能回避、不能撇开不管的，因

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它决定着革命的发展和革命对内对外政策中的一切问题。”

工人要支配他们的生存条件，尤其需要消灭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崭新的国家机器。基本上类似旧国家机器的新国家机器，势必会重新产生旧的社会关系。

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根本区别在于：无产阶级国家机器不脱离群众，隶属于群众，即列宁称之为“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消亡，而代之以“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直接生产者要支配他们的生存条件，首先就要消灭旧的国家机器，这种旧的国家机器既垄断一切关系重大的政治决议，又独占贯彻执行此类决议的手段，而且还随意支配镇压力量，毫不犹豫地用来对付劳动群众。

如果不是形式主义地使用不论时间地点而规定的“抽象标准”，那就可以说：非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或者基本上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有一极其重要的特点，就是事实上国家机器凌驾于群众之上，对群众采取强迫命令的行动。

当群众一面隶属于国家机器，一面隶属于执政党时，非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特点就更为重要了。（这一点，将在本文后头再予叙述）

一旦国家机器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而执政党非但不加抵制，反而推波助澜，那就有了重新产生政治压迫关系的客观条件，在这种关系中也可以重新产生剥削关系。一旦非生产者榨取直接生产者的剩余劳动，一旦使用这种剩余劳动产品的权力，不为生产者所掌握，那就产生了这种剥削关系；即使作出决定的代理者是“计划经济”，情况也是如此。即使剩余劳动的产品，不是由那些决定产品使用方式的人个人消费，也可能产生剥



削，这点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总之，资本主义的剥削，主要是以积累而不是以消费为目的的剥削。

简单地说，如果拥有生产资料的国家机器脱离群众，不受一个联系群众、帮助群众争取支配生产资料使用权的政党所控制，那末，我们就面临着一种重新产生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关系，是通过工资关系表现出来，那就意味着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关系；在国家机器和它附属机器里身居要职的人，统统是集体的国家资本主义里的资产阶级。

上文已经顺便指出，如果不考虑具体历史条件，特别是国家和执政党之间关系的性质、这个党的特征和它的活动方向，那末，试图提出国家的无产阶级特征的抽象标准，就是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方式。

历史经验证明，几个世纪的压迫和剥削造成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关系，以及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重新产生的这种意识形态关系，是无法在一夜之间就加以彻底改革的，由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非常大，所以，那种为了使直接生产者得以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形式，如果不是有组织的对这种意识形态加以抵制，势必有可能在不易察觉的情况下，改变了政治形式的性质，逐渐形成政权机关的“自治化”，即国家机器重新脱离群众，结果就重新产生政治压迫关系和经济剥削关系。因此，在整个过渡时期始终存在着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

### **执政党的特性**

这些问题的难处是：为了帮助无产阶级和同它结成同盟的人民大众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对于指导无产阶级夺权的马

列主义政党来说,仅仅保持在外表上的“一致”是不够的;它的阶级特征必须是在实质上一直不变的:它必须始终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如果执政党不是无产阶级的党,那末,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

显然,党的无产阶级特性不是靠“自我表白”,不是靠党自己决意“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不是靠它的“始终忠于马列主义的决心”或一种“革命理想”。党的无产阶级特性只能通过具体分析来鉴别。这个具体分析将表明,执政党的政治思想方面的实践,实际上是不是无产阶级的实践。

一个执政党只有避免对群众强迫命令并一直有助于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才能成为无产阶级政党。要能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完全接受群众的批评,不把“必需的”任务强加给群众,而是支持群众发展社会主义关系的行动。

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帮助群众自己去完成和他们的基本利益相一致的任务。在改造社会关系的连续斗争的每一个阶段中,党必须指导群众,以便他们能够在时间、地点所限制的客观和主观的范围内,发挥其具有最深远影响的能动性,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的社会关系。

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对群众“包办代替”。因为群众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并且只能通过他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来改造自己。这是一条唯一的途径,群众通过它能获得集体的觉悟、集体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即他们的阶级的自由。

因此,无产阶级政策(它是无产阶级巩固政权的唯一保证)只能是使群众去完成那些在客观上和他们的利害关系的事情。任何违反群众觉悟和意志的行为,都是后退的表现。并且这样的后退可能使无产阶级丧失政权。

因此,党的任务在于了解群众准备要做的事情,不是依靠强



迫命令去领导群众前进，而是利用群众自己提出的口号和决定，精心制定适当的战术和战略，并帮助群众把自己组织起来。

由于党群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要求和这种实践的要求，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就必然使得专政“不适用于人民内部”，并且广大群众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

说专政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也就是说不适用于小资产阶级，特别是不适用于贫下中农阶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领导小资产阶级走上代表无产阶级真正利益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对于小资产阶级决不能使用强制的办法。他们必须进行思想斗争。照毛主席的话讲，这就有可能“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以上就是一个既是执政的又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某些特点，也就是一个指导群众但不强迫命令、一个集中群众的创造精神以便帮助群众进行联合政治斗争的政党的某些特点。这样的党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必不可少的，只有在这样一个政党的帮助下，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才能在朝着他们集体自由的方向前进时加强对他们生存条件的控制；而这就需要他们的团结——不是强制的，而是自愿的团结。

### 政党和国家机器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由政党和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问题，因为这些关系的性质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主要特点，这种专政要求国家机器隶属于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当国家机器居于这样的隶属地位，政党和群众的关系被正确地用来抵制国家机器日趋“自治”的倾向时，才有可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和保证国家的最终消亡。

因此，无产阶级政权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马列主义政党，而不

是国家机器。马列主义政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工具，是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组织形式。

政党的决定性作用，是同政党所体现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占主导地位有关。要发挥这种作用，不仅关系到一切其它的社会机器，而且也关系到依靠政党进行自身改造的劳动群众，即那些要让无产阶级世界观占领自己的头脑、不断破除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劳动群众。无产阶级政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是依靠帮助群众进行斗争，在群众中贯彻无产阶级思想；而政党则从这些斗争中吸取教训并向群众学习。

这样，无产阶级政党就成了使群众的行动和思想一致的工具。

无产阶级的主导作用，逐渐增强到使无产阶级的思想成为人们自己的思想的地步。这样，就为消灭在群众中的一切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创造了条件。一个马列主义执政党要做到行动正确，就必须永远把阶级斗争放在第一位，并在这个斗争中让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成为统治因素。没有这样一个政党，就不能使客观和主观的关系实行革命化，而资产阶级的复辟也就成为不可避免。

政党的领导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的重要性质，决定了党内思想意识上的阶级斗争所占的地位，以及需要一种正确显示“无产阶级”特征的领导方式。只有这样的领导方式，不是通过强迫，而是通过对工人的思想和政治上的帮助，使人们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称之为“群众路线”的一个方面。

关于这一点，应该补充一句：如果说“群众路线”的观念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紧密相连，那末，在马列主义中是能够找到这种观念的理论基础的。然而，正是由于中国革命的经验 and 毛泽东



的思想,才有可能从理论上掌握“群众路线”这个观念,才有可能理解:正是由于应用了一条群众路线,一个执政党才会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的工具,因为无产阶级政权的存在最终是决定于党和群众的关系。

###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

在一定的时期内,一个从革命斗争中产生的政党,其存在并不能“确切”保证它不会背离社会主义道路。沿着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唯一“保证”,是执政党具有不脱离群众的真正能力。这种能力必须不断地更新;这也表示政党的更新,即不断努力避免枯燥地重复现成公式,并反复具体分析每一种新的形势,因为新的形势总是独特的。要具有这种能力,无产阶级的政党就必须实际上永远做劳动群众的勤务员,必须从劳动群众的所有革命首创精神中吸取教益,并必须献身于这些新生事物和支持它们的发展。

除非是实现了这些条件,不然,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不能对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胜利作出贡献。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实现这些条件,它就不能使它的政治路线保持一条无产阶级的路线,最终,资产阶级将会控制党,把它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资产阶级至少可以或多或少暂时在“国家资产阶级”的伪装下表现一下自己。因此,当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生产资料已由国家控制或已集体化时,就认为阶级斗争业已“终止”,这实在是一种严重的错觉。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它只是采取了新的形式罢了。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阶级斗争之所以是客观上可能的和必需的,这不仅仅是因为经常被称为“旧的剥削阶级残余”的存在,尤其是因为旧的经济、思想和政治关系的重新出现。这种

关系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被“废除”的，而只有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被其他关系破坏和替代。和这些旧关系有联系的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分工，体脑劳动之间的差别，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差别，资产阶级科学领域中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之间特有的差别，由这些差别所产生的表现形式（比如“价值”形式就是这些形式中的一种），以及在这种旧关系的基础上重新出现的思想形式等。这些旧关系构成的“客观基础”，使少数非生产者能够剥削多数生产者，并使无产阶级有可能遭到失败。这些关系，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还会继续滋生，而这段时期一直要到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后才会结束。

无产阶级的丧失政权，未必是残酷的肉体斗争的结果。既然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基本要素，那末，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也是夺权斗争和维持这种权力的斗争的基本要素。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思想的作用的削弱和由此而产生的错误，就要为资产阶级社会力量的发展、巩固、最终被它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提供条件。

面临这种危险，无论是暴力镇压或仅仅是口头上教条地“忠实于”现有的明确的观点，都是无济于事的。面临这种危险，必须不断地确立一种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思想，经过充分的社会实践，使这种思想更加深入到广大劳动群众当中，帮助群众不断地抵制旧的社会关系，反对那些用来使群众“接受”剥削和压迫的“价值”。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阶级社会中逐渐消灭那些占首要地位的个人利益和特殊利益，才有可能创造条件，使无产阶级团结成为头等大事，使个人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力量和劳动，建设一个完全新型的社会。这都是不能通过强制和镇压来实现的。这方面要求的是革命实践、具体示范和自由讨论，并且进行这些讨论的不应仅限于少数领导人，相反地应当扩大到全



党和全体劳动群众，使大家能通过劝导和行动的榜样日益自觉地坚定无产阶级的立场。

这就是无产阶级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具体意义。这个斗争并不类似于重复陈腐的公式，也不类似于以几条脱离现实和实践的原则为名发布的“开除条例”。

必须强调，这种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不可能是纯属“自发性的”，因为它必须不断地同马列主义的世界革命实践和理论相联系。如果仅以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的“自发观念”为基础，那末，要进行这种斗争和建立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观念大多是由旧的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强加给这些阶级的。仅仅抵制这些观念（这当然是必须的）还不足以使革命的无产阶级观念去取代它们。这就需要另外成立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将体现这些观念，并通过阶级斗争和对社会全部实践的经常批评和分析，确保广泛传播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些新观念。

一个革命政党的作用，决不能成为一个自封的“不犯错误的向导”或所谓的精华。它的作用将是一个“体现”革命思想和发展同这种思想相符的实践的组织，即一个为群众服务的、并永远准备向群众学习的组织。只有这种组织能保证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不会变成教条，并且相反，始终是一种能挫败新特权阶层重新获得权力的任何企图武器。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风的伟大教益之一，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之一。

（摘译自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美国《每月评论》 上海电机  
厂“五一”工大工人业余翻译组译）

## 后 记

〔美〕保罗·斯威齐

我们关于以过渡到社会主义为题的通信讨论到此暂告结束。我同意贝特兰的意见，认为我们在克服原来的分歧方面已取得良好的进展。但是我相信他一定具有同感，即我们还有许多极为重要的问题尚待探讨。这就需要深入了解和研究更多的具体革命经验和在今后开展更深入的讨论。

（摘译自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美国《每月评论》 上海电机厂“五一”工大工人业余翻译组译）



## 向社会主义过渡<sup>①</sup>

〔美〕保罗·斯威齐

在开讲前,先将其中一些提法摆出来,可能是有好处的。

一、作为各个社会制度之间过渡的普遍理论,那是不存在的。这并不是因为人们很少注意这个问题(情况也确实是这样),而是因为每次过渡都是一个独特的历史过程,必须对这些过程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解释。

二、用比较法来研究过渡,还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对以往各种过渡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目前和今后可能发生的过渡提出一些有成效的问题,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些过渡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有助于我们判断所考察的过程的历史性和完整性。

三、过渡决不全是简单、短暂的过程。相反,过渡具有它们各自的特色,甚至能以它来标志整个历史时期。过渡复杂性的一个方面是所谓“多向性”:朝着某一方向的运动本身可能会向后复辟倒退,并在一个新基础上再重新向前运动。在某些地方,这种复辟倒退可以是长期的。

四、从一种社会制度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制度,涉及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复杂、最深奥的问题。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到,“蒲鲁东先生不知道,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

---

<sup>①</sup> 本文是作者应意大利文化协会邀请,于一九七一年三、四月间在意大利都灵和其他城市的一篇巡回讲演稿。——原编者注





和脑力劳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别，以及最终用直接的人类关系来代替所有的金钱关系和商品关系。

现在很清楚，资产阶级和那些充满了资本主义的思想和品质的人，是既不希望也不能够建立和发展这样一个社会的。他们的资产阶级人性同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社会关系总和是完全不相容的。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尝试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不是资产阶级人性被改造为社会主义人性，就是社会主义关系被改变为资产阶级关系。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候，这种水火不相容的局面是绝不会发生的。资产阶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这个框框里产生的，并且经过好几个世纪，才形成了资产阶级的人性。当资本主义最终战胜封建主义的时候，它既是作为一个革命的阶级，也是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制度中，人的本性和社会关系之间已经完全取得了一致。由于封建残余的继续存在，当然还会出现不一致的因素，在某些方面（如上层建筑）甚至还很严重，然而，它对于资本主义的机能并不构成严重的威胁。

我们已经看到，社会主义人性，不可能在资本主义这个框框内，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来形成。那末，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如果有，它们又是些什么呢？

不久前，我在和贝特兰讨论中曾说过，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一问题，至少到俄国革命时期，就已有了明确的答案：“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无产阶级……是指那些受雇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工资劳动者。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他们组成了工人阶级的多数并在总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作为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产物，这些劳动者势必具有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某些思想品质：团结一致、互助合作、平等主义等等。从历史的角度来

讲，无产者可看作是由资本主义塑造出来的‘新人’，他们有愿望，有决心，也有能力去推翻旧制度，并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起领导作用。”（《每月评论》一九七〇年十二月）

我的上述这段话，不是在研究了有关原著之后写的，而是根据我多年来形成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般理解来写的。以后，人们曾要求我对这一解释进行证实。必须承认，我对此确实无能为力。我们很容易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引用大量的论述来论证无产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过程中所担负的革命使命。然而，我却没有找到有关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能力这一问题的任何专门论述；至少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系统论述中，尤其在那些分析分工对劳动者的影响的论述中，明显地蕴含着一种对无产阶级能力的反面评价。例如，下面这段选自《资本论》第一卷《机器和大工业》这一著名章节的论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逐字摘引了这段话）：“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调动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随时可以利用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这一光辉的论断，阐述了无产阶级的一个中心目标，甚至可以说，它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但是，当马克思谈到大工业“迫使社会”遵循上述途径的时候，却有意回避了革命实践的性质问题，而这种革命实践将使单纯的局部个人变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个人。

当正确理解马克思原意有困难的时候，请教列宁是个好办法。他是怎样认识这个问题的呢？

列宁在一九〇二年所写的《怎么办？》一文，可能是他对无产阶级特性最有系统的分析。正象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他在那篇



文章中论证了：无产阶级中间会自然产生“经济主义”，“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根据列宁所述，社会主义，即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并由一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取而代之的信念，是由革命知识分子传播到无产阶级中去的。正是他们最先教育了先进的工人，使先进工人们认识到自己的真正利益并把他们组织成一支革命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的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同时又向他们灌输更高的社会主义意识。就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来说，列宁观点的明确含意是：并不是资本主义本身，而是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才造就了具有继续前进并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和能力的人。在列宁看来，不断灌输革命思想的实践就是不折不扣的革命实践。

我们常常听说，特别是听到反马克思主义者说：恰恰是在否定无产阶级自发革命的可能性这一点上，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有着最显著的不同。据说，这是列宁有关先锋队的性质和任务的概念的基础。许多人认为，列宁这一概念，构成了从两位导师的教导中找不到根据的一项列宁主义的独特见解。

今天，我们都知道，正是列宁担负了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培育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责任。然而，在列宁主义关于党的概念同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之间果真有什么前后矛盾吗？

据我看，如果能够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用列宁的话来说），就能形成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意识，那末，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应当是肯定的。正如我前面所指出的，我过去总认为他们的观点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当我试图证实这一点时，才知道自己是错了。人们不仅找不到任何关于无产阶级具有社会主义革命自发性的专门论述，而且，如果认为马

克思、恩格斯对于无产阶级特性持有这种观点，那末，也就无法理解他们两人的终生实践了。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起，经过第一国际，直到恩格斯晚年作为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政党顾问为止的整个时期内，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倦地努力履行的，正是列宁所说的革命知识分子的职责，即在无产阶级中传播革命的社会主义意识。而且十分明显，当列宁在写《怎么办？》的时候，他脑海中浮现的榜样之一，也正是这两位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在我看来，这一例证的重要性在于：列宁在这个问题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他的思想和行动，同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行动都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认为，不断灌输革命思想的实践就是革命实践。

\*

\*

\*

下面，我想根据上述马列主义观点，谈谈个人对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一些看法。我们知道，资产阶级人性是在长达好几个世纪的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范围内）实际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当资本主义已经强大到足以对抗并战胜封建主义的时候，就不再存在倒退到封建主义的实际可能性了。“资产阶级人性”是完全适应于资产阶级的社会的，他们没有必要再去复活或者重新建立封建的社会关系。当然，这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力量可能在这里或那里被封建势力所击败，导致资本主义发展在局部地区、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遭到挫折。可是，这并不能阻止新制度总的发展趋势。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况下，那就完全不同了。社会主义人性，只能在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而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形成。那末，怎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人性将在足够的广度和深度内形成，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创造条件呢？我们不应该幻想，社会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社会关系（除了它的名称外），能够脱离社会主义人性的实体而存在，只有社会



主义人性的实体才能使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具有观念和意义。从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文中可以看出，他本人是了解这一观点的，尽管他并没有深入探索这一观点所含的全部内容。在那篇文章中，他阐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他的集团同少数派反对集团之间在宣传上的区别：“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而你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我们特别向德国工人指出德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而你们却非常粗劣地向德国手工业者的民族感情和等级偏见阿谀逢迎，当然这样做是比较受欢迎的。”

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问题的核心：无产阶级既要改造社会关系，也要在这一过程中改造自身。不幸的是，随后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也都完全确实地证明：至今还无法保证这一任务能够胜利地宣告完成。

就工业发达国家而言，资本主义无孔不入，适应能力很强，它比马克思所预言的还要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无产者成了经济主义的俘虏。列宁曾认为这种现象在所难免，但他相信依靠有觉悟的革命先锋队是可以克服这一缺陷的。但是，现在却有不少自封为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先锋队，不但没有使无产者广大群众转向革命的社会主义；相反，他们自己却变成了社会改良主义者了。当然，有一些人认为这只是暂时脱离常规的现象，他们相信新的革命时期已经开始，无产阶级将再次担负起马列主义经典理论所指出的历史使命。

我们再看看其他一些国家，这些国家的旧政权（不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混合体的）确实已被推翻了。我们面前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实例，很明显，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

苏联和中国。

俄国在一九一七年所处的条件下，十月革命证明了马列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前半部分是行之有效的。俄国的工业无产阶级虽比较弱小，然而在坚强的革命领导之下，它还是能够推翻那在二月革命中掌权的资产阶级统治。至于这一理论的后半部分（无产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起领导作用的能力），俄国经验最多也只能说是缺乏说服力的。俄国无产阶级一开始就比较弱小，十月革命以后，经过四年的流血内战、饥饿和混乱，它的力量又遭到严重的摧残和削弱。布尔什维克政府全力贯注于维持政权和恢复经济的一些问题，被迫依赖于一个陈旧的、显然是极端反社会主义的国家官僚政治，而且在以后几年中，还被迫扩大了这种官僚政治的范围和权力。但大体说来，从一九二二到一九二八年这段时期，苏联在艺术、教育、两性关系和社会科学等方面，都仍然是革命热情沸腾的时期，如果不半途而废，很可能产生出强大的社会主义力量和社会主义发展趋势。

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俄国很少能提供正面的经验，但它却从反面有力地证明了：只有与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的任务紧密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的形式（如生产资料国有化，全面计划经济）才具有真实的社会主义内容。苏联理论家们拚命鼓吹说，随着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将会自然地培育起来，但是他们又举不出任何证据。苏联（还有美国！）的经验倒是证明了，这些吹嘘全是一派胡言。听起来好象是自相矛盾，然而事实却是：斯大林的政策，在一个时期内曾限制了苏俄制度中某些潜在消极因素的发展。当时，一个滥用职权、为非作歹的官僚分子，就可能进劳改营，或者落得更坏的下场。但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这种限制大部分被取消，真象就很快暴露出来了。

最近一篇中国评论文章指出了问题的实质：“从生产到流



通,从经济部门到政府机关,资本主义势力猖狂活动:投机倒把,囤积奇居,哄抬物价,尔虞我诈;企业和政府里面走资派串通一气,贪污盗窃,营私舞弊,坐地分赃,贿赂成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蜕变为特权阶层的所有制,直接由一小撮走资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所支配,……这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我特别要强调,应该从事实上,而不是从概念上去解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蜕变为特权阶层所有制”这一论点。这种特权阶层(贝特兰称之为新的“国家资产阶级”),就是控制生产资料从而决定劳动成果是怎样分配的阶层。撇开法律形式不谈,这种所有制的实际内容就是阶级所有制。

值得注意的是,前面提到苏联社会现状的特征,几乎无需多大改变就能适用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区别在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苏联社会的这些大部分现象都是合法的。这就突出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任何一个法律制度(这是从这一术语的广义来说的,它包括所有权关系)能够有效地控制人的行为,除非它与随着历史发展而形成的该社会的人性协调一致。这个条件显然没有在苏联形成。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再也不会出现社会主义,更不是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首次失败中没有留下任何正面的影响。资本主义的早期也曾出现过失败,但是它们留下了可贵的经验(例如,包括“复式簿记”的发明,等等),没有这些经验,以后的资本主义可能也还要失败,或者至少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更多的困难。马列主义这一极为重要的科学,就是通过十月革命才传播到亚非拉的人民中间的。我们或许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正是苏联后期的反面教训,才使其它国家有可能看到,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持续不断进行灌输革命思想的实践。

然而,并非单纯是苏联的反面经验,才促使中国人去开辟另

一条截然不同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情况，在某些重要方面和俄国有所不同。首先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虽然比俄国少，但从未受到经济主义的严重毒害。正如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写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除了这支坚定的革命力量外，中国还有另一支在四分之一世纪的反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中而形成的更为强大的力量。这支力量在一九四九年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已发展到最高峰。一九六四年第五期《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写道：“千百万普通的工农劳动者，许多青年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过人民军队的教育和锻炼，逐渐革命化起来，成为有觉悟的经得起考验的战士，成为革命和建设的骨干力量。”中国长期的内战和抗日战争，锻炼出一支人数众多、政治上成熟的革命力量；而苏联内战和抗击外国武装入侵的时间却要短得多，那儿的革命力量又遭到了严重的削弱；结果是，革命成功后，在革命的人这个因素方面，中国要比俄国强得多。最后，俄国和中国都非常幸运，诞生了列宁和毛泽东这两位古今罕见的最伟大的革命领袖。但是，列宁在苏联还没有真正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前，就与世长辞了；而毛泽东的领导在革命胜利后已经继续了二十多年。

列宁和毛泽东都充分认识到，推翻旧统治后革命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日，列宁在《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道：“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还保存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的新人，他还站在旧世界的污泥里面。只能幻想把这种污泥清除掉。如果以为这可以马上办到，那就是愚蠢透顶的空想，就是在实践上



把社会主义世界移到半空中去的空想。

“不，我们不是这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是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上建设的，我们要同劳动者身上也有的、经常拖无产阶级后腿的一切弱点和缺陷进行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常常碰到许多分散主义的小私有者的旧习惯、旧习气，还会听到‘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旧口号。”

毛泽东说得更为明确，当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赢得最后胜利的时候，他就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象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时间刚刚过了二十年，我们就可以看到毛泽东说得何等正确。这出剧正在继续展开，从一个高潮走向另一个高潮。尽管中国在革命成功初期具备了种种有利条件，但它并没有摆脱再次陷入千百年来塑造中国人性格的旧框框和旧关系之中的危险。旧的“一切社会关系总和”同过去一样，仍然继续存在于亿万中国人的头脑和意识中。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这说明，国有化、建设重工业、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等等固然很重要，但清除旧社会残留的一切污泥浊水，才是社会主义过渡的中心问题。在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中国革命者透彻理解并紧紧抓住了这条真理，有意识地把它作为不断灌输革命思想实践的出发点。

试图在这里分析这一革命实践是不合适的，何况我本人认识肤浅、能力有限，也没有资格来做这样的分析。我想强调的是，

这个社会主义过渡的中心问题，还是第一次这样被充分认识到和正确地提出来。在这一过程完成之前，要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也是不可能的。

可以用这样一条告诫作为结束语。在政治上如同在科学上一样，解决某一问题的第一步，就是正确地认识和提出问题。但这第一步通常离开最终解决还是很远的，并且在讨论改变人的本性这一类问题的时候，上述告诫就更加确切了。幸而毛泽东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楚，我们希望他的学识会永远成为中国人民的传家宝。这场革命的最终胜负，可能要在我们今晚在座的各位离开人世多年之后才见分晓。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高潮时说过：“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马克思说，整个历史就是不断改造人的本性。毛泽东不也教导我们，即使阶级统治消灭之后，改造人的本性的既定任务，无论怎样总是绝对不会停止的吗？

（原载一九七一年五月号美国《每月评论》 上海第一钢铁厂工人业余翻译组译）



## 经互会内部反控制斗争方兴未艾

干 戈

在苏联，历来的文章都是把经互会描绘成一片人间乐园的景象。可是，近几年来，苏修的书报杂志却不时谈起经互会的“矛盾”来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里，我们选译了苏修书刊上谈论经互会矛盾的几篇文章，还配了一些西方的有关论述，供读者分析参考。苏修文人写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发展中的矛盾》一文，所谈的矛盾确实不少：什么“客观和主观的矛盾”啦，“重要的和无足轻重的矛盾”啦，“一般的和局部的矛盾”啦，“长远利益和短期困难的矛盾”啦，以及“加强民族经济的趋势和发展国际经济联系的趋势的矛盾”啦，等等。这些矛盾，在它们那里还可以越摆越多。暂且不管这些矛盾说得是多么的含糊其辞、似有若无，但也透露了：经互会决不是什么人间乐园，而是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如果不是如此，也不需要苏修花费这么多的口舌和笔墨来“分析”了。

从苏修摆出的那些所谓矛盾中，可以看出，苏修通过经互会控制它的“兄弟国家”和这些“兄弟国家”反对苏修控制的斗争日益发展起来了。这是苏修大为恼火的。苏修经常对这些“兄弟国家”进行训斥，说它们不懂得“国际分工的优越性”，不懂得投资经互会联合建设项目的“长远利益”，害得苏联境内的许多资源迟迟不得开发。更为不满的是，埋怨“兄弟国家”付给它的石油、

天然气等燃料的经互会贸易价格“太低”，使苏联吃了“大亏”。

苏修在它的“兄弟国家”面前摆出一副老子对儿子的态度，有一丝一毫的道理吗？否！

就以经互会的贸易价格来说吧，它是苏修掠夺“兄弟国家”财富的主要手段。譬如，苏修卖给东德的商品，价格普遍比卖给西德的高，其中硬煤的价格要高一倍。而东德向苏修出口的商品，价格恰好相反：一九七一年东德卖给苏修的氢氧化钾，每吨为一百八十三卢布，而同期西德卖给苏修的氢氧化钾，每吨则为二百零三卢布。从这里可以看出，经互会贸易价格对谁有利、对谁不利了。至于一辆自行车换蒙古的五匹马，更是赤裸裸的掠夺。石油的价格也不例外，波兰等国的石油消费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靠苏修供应的，在这种情况下，价格由谁说了算不是明摆的吗？只要看看苏联的石油账单就清楚了：近两年，苏修出口石油收入增加了一倍。那末，苏修为什么现在还要大叫大嚷它出售给“兄弟国家”石油的价格过低呢？没有别的原因，无非是想抬高石油价格，再从“兄弟国家”身上刮一层油。

关于苏修大肆鼓吹、一再要别人理解的所谓“国际分工”的意义，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苏修的文章中一再提到的苏匈制铝工业的协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匈牙利的铝矾土蕴藏量非常丰富，可是开采以后却要把原料运往苏联冶炼，再从苏修进口铝锭。据说这个协作给本来缺少电力资源的匈牙利带来了莫大的利益：不仅每年可少进口本来是炼铝需要的二十七亿度电力，并且进口的铝比自产的铝还便宜百分之十六至十八呢！不过，明眼人一看就很清楚，这显然是一笔假账。除非轻便的电力输送费用要比笨重的铝矾土、铝锭的相向运输费用大，才会有这种咄咄怪事。铝，是国防工业的重要原料。苏修不仅利用来自匈牙利的铝大搞扩军备战并转手贩卖、攫取暴利，而且也用它



来对匈牙利进行控制：你要成品铝吗？就得听我的！这就是苏修的所谓“国际分工”带给匈牙利人民的莫大恩惠！事实就是这样，苏修的“国际分工”，是剥削和掠夺其他国家，使这些国家经济畸形发展，沦为苏修附庸的一个重要工具。

苏修还经常指责“兄弟国家”“没有长远利益的眼光”。这指的是它的“兄弟国家”对开发西伯利亚毫不热情。为了开发西伯利亚，苏修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但是，要把大批资金、人力投向这个无底洞，而换取一句“长远利益”的空话，它的“兄弟国家”当然要想出各种办法进行抵制。其实，所谓“长远利益”，很现实的问题是对谁有“长远利益”的问题。有人算了一笔账：在波兰进口总额中，苏联所占的比重，一九五八年是百分之二十八点八，到了一九六八年，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五点四；在匈牙利进口总额中，苏联所占的比重，一九五六年是百分之三十三，一九六八年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二。从这笔账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牟取越来越多暴利的，正是苏修，而带给东欧的却是越来越沉重的压榨和越来越严密的控制。对于这样的“长远利益”，如果俯首听命的话，那才真正是“没有眼光”哩！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是一批善于玩弄权术、阴险奸诈的恶棍。他们掠夺、剥削和奴役经互会其他国家已经多年了。有掠夺，就有反掠夺，有剥削，就有反剥削，有奴役，就有反奴役。这是一个规律。苏修决然摆脱不了这个规律。随着全世界人民反霸斗争的深入发展，经互会国家广大人民反对苏修控制的斗争正方兴未艾；他们必将奋起，成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掘墓人。“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发展中的矛盾

〔苏〕Г·И·格列则尔曼等

社会主义作为新的社会制度和世界体系，它的极大的优越性在于克服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民族和国际之间的对抗。然而，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现阶段，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某些矛盾还没有彻底消失。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所固有的矛盾，就其起源、本质和解决方法来说，就这些矛盾在个别国家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来说，就其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后果来说，是各不相同的。它们中间有客观的和主观的矛盾、重要的和无足轻重的矛盾、一般的和局部的矛盾、长远利益的和短期困难的矛盾，等等。各种不同的矛盾反映了社会主义共同体中国际关系的复杂性。而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对于这些国际关系的形成是有影响的。克服这些矛盾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使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水平相一致，加强它们的社会结构的一致性，提高各兄弟国家人民的国际主义觉悟。总之，就是要加速社会主义各国趋于一致的过程，加强它们的团结。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经济基础，即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构中，包含着一系列这类矛盾。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由各民族-国家经济综合体所组成，这些经济综合体由国际社会主义分工联合起来。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在两种同时发生作用的趋势的影响下进行的。一种趋势是加强民族经济，这表现为迅速



克服过去的工业落后状态,建立现代工业和合理的经济结构,并在经济活动中广泛利用本国资源。另一种趋势在于越来越广泛而又频繁地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促进各国民族经济的相互接近。在各民族经济综合体中,逐渐出现了一系列以满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为特点的生产部门。这两种趋势是形成世界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统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它们互相补充,同时又处于一定的矛盾之中。

本国经济的巩固,为生产的日益国际化,因而也为逐渐克服和最后消灭地方经济的狭隘性创造了积极因素。形成世界社会主义经济这个过程是通过商品-货币关系而间接表现的,因为互相合作的伙伴都是社会主义主权国家,它们在进行相互贸易中都拥有财富的所有权。同时,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力求从相互合作中获得好处,并指望在用于发展出口生产和其他联合事业的单价、投资数额和投资回收的期限方面,至少不超过本国的正常指标。然而,有不少客观原因妨碍着每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达到这一目的。这些原因是:各国的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收的期限以及各国生产的结构等等,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还应该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些较不发达的国家有它自己的利益,坚持它在社会主义经济合作共同体中的特殊地位。为了克服经济落后状态,这些国家都在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显而易见,它们对于参加国际间的生产(零件或部件)专业化,跟那些工业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是不那么感兴趣的,并且也具有较少的现实可能性。

这样,由于任何一个民族经济综合体的发展首先决定于该国的内部条件,并根据其本国的计划来实现。因此,一国的发展就同整个世界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发展的需要处于一定的矛盾

之中，并且在社会主义各国的相互经济关系方面产生一定的矛盾。在世界社会主义市场中没有一种能充分反映社会主义各国生产条件的价格体系，这样就有碍于把各国的价值折合为经互会成员国国际市场的区域性价值。其结果，在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关系中，价值比例就难以表现，这本身便是矛盾的根源。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非对抗性的经济矛盾，以最普遍的形式表现在买卖关系中。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存在差别的情况下，价值规律的作用导致被交换的商品中包含着各国不一样的劳动消耗。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越大，它们劳动消耗的差别也越大。每一个国家都希望通过出口商品收回生产成本和获得正常的利润，然而这一点并非总是能够实现的，因为其他国家也这样希望，而它们的生产条件又极不相同。

矛盾也产生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个别国家经济结构不完善，尤其是生产技术水平不够高，它们之间自然资源的分布不平衡——这一切就引起世界社会主义市场上出现某些商品缺少的现象。例如，现有的某些品种的工业原料、石油、天然气、机器制造业技术完善的制品，都不能完全适应日益增长的需要，许多商品的质量也不够高。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暂时的、非对抗性的矛盾的一个例子，就是燃料和原料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商品的合同价格常常背离生产成本，同国际市场的价格又距离极大，因此，在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中就缺少为增加燃料原料商品出口所应有的刺激因素，这也是同它的消费者的利益相矛盾的。

输出(或输入)同类产品的国家之间也会产生一定的矛盾。例如，在一九六四到一九六八年，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向经互会其他成员国输出的新鲜蔬菜缩减了，而与此同时，罗马尼亚输出的新鲜蔬菜却不断增加。在同一期间，匈牙利增加了新鲜水果特



别是苹果的输出，而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则相对地缩减了这种商品的输出。这样一来，在增加新鲜水果和新鲜蔬菜输出的竞赛中，保加利亚在世界社会主义市场中的某些地盘就转入了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之手。为了改变保加利亚输出新鲜水果的状况，就必须提高它生产水果的效率，这将不仅符合保加利亚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sup>①</sup>

矛盾也可能在查明建立高度专业化企业的金融和技术可能性时出现，意见分歧的原因是平衡支付差额问题，可能是这些企业的产品销路从长远看来缺乏足够的保证，也可能是难以规定专业化产品的价格，等等。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产生非对抗性矛盾的直接原因，是旨在保证等价交换、刺激出口生产、以及对国际专业化和实行各种协作经济措施所产生的利益和消耗加以合理分配的那些价值手段的不完善，还有就是这些国家经济合作的某些组织和法律方面的不完善。

这一切证明，当前存在一系列客观因素使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分工、由于参加各国之间的生产专业化和合作而产生矛盾。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一系列矛盾的造成，是由于客观上需要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这个过程关系到较发达的国家援助较不发达的国家。但是，援助国的经济潜力和受援国的需求之间，常常不是简单地建立起客观的互相依赖关系。援助国不得不从本国的物力和财力中拨出一部分，这是一个复杂的任务，有时会妨碍正确理解经济较不发达的兄弟国家的利益。而受援国则可能不是经常考虑到较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有时

---

<sup>①</sup> 参见一九七二年第七期《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

会提出过高的援助要求。

蒙古人民共和国同苏联和经互会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是正确建立经济上较不发达和较发达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榜样。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是有效地利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优越性，调动国家内部的条件来保证经济持久的高速度发展。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考虑到蒙古在克服自己经济落后方面本身的物质资源和劳动资源不足，所以就向它提供广泛的经济援助，其中包括高度熟练的工人干部和专家。这种援助一部分是为了利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天然财富，这种天然财富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由此可见，在合作过程中，不仅蒙古的需要可以得到保证，而且援助国的需要也可以得到保证。

经验证明，无视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各个国家与整个社会主义体系之间存在的非对抗性矛盾，并不能消除这些矛盾，相反地会促使这些矛盾尖锐化。例如，不去考虑各国对参加国际专业化的实际利益的关心，就可能阻碍专业化本身的进程。如果一个国家在世界社会主义市场上获得必需商品的要求得不到满足，那就可能限制它参加国际社会主义交易的热情，使它不适当地转向资本主义市场。不过，克服矛盾并不总是意味着立即满足每个国家的眼前利益。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发展中的客观矛盾，可以通过集中力量共同解决一些国家所共有的迫切问题以及通过实现国际利益的途径来克服。在经济关系方面，这首先是创造一系列条件来刺激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进一步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分工，以及保证较不发达国家有一定的优先权，以便加速它们经济发展的进程。加强共同计划工作，改善世界社会主义市场的价格形成体制，发

(下转第 68 页)



# 经互会国家的生产一体化

〔苏〕A·祖勃科夫

**编者按：**这是一篇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残酷剥削和掠夺经互会其他国家人民的自供状，从中可以看出苏修为提高石油卖价制造的种种借口。文章也透露了经互会国家对外贸易自由化的一些情况。

经济一体化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客观地发展着的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基础上实现的。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对社会分工的过程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不考虑到国际分工深化的可能性，在个别国家范围内建立一系列部门和单位，效果并不好。这样，许多种需要大量消耗能源的产品（铝、镁、某些聚合物等）就不一定要本国自己生产。例如，为了每年生产十万吨铝，仅需要三、四千工作人员；那么，在机器制造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中，消耗相应数量的电力就能保证二十万到四十万人员有工作。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燃料动力资源有限的国家里，需要大量消耗能源的产品生产与其说会成为保证其他部门发展的条件，不如说会成为阻碍其他部门发展的因素。

国际社会主义分工和物质生产一体化为建立有效的、紧密配合的国民经济结构提供了可能。因而国际社会主义分工不仅促进部门之间，而且也促进部门内部（零件的、工艺的）专业化的

深化。匈牙利和苏联在铝工业中的国际专业化和协作就是这种专业化的例子。按照国际专业化和协作，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大规模地生产铝矾土，提供给苏联；在苏联加工成铝后，再把这种金属提供给匈牙利。这样的协作使匈牙利的电力亏空避免增加到每年二十七亿度，这个数字几乎是它目前从苏联得到的供应量的三分之二（一九七四年是四十二亿度）。苏匈在铝工业上的合作，要求两国的投资达到大致相等的规模。预算证明，匈牙利从苏联获得的铝比匈牙利工业所生产的便宜百分之十六到十八。如果注意到目前的世界价格，那么从协作上得到的好处将大大高于上述数字。

通过物质生产一体化进一步完善经互会各国工业的部门结构，是社会主义一体化纲领提出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在燃料和耗电部门的发展中，分工和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是特别迫切的。仅仅在对外贸易合作的基础上解决这些任务是不可能的。在考虑到各国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和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必须采取能保证各国经济结构和谐发展的一体化性质的全面措施。通过这种途径就可以比较有效地保证各国对多种燃料、原料和材料的需要。

技术进步使生产和消费的产品品种经常扩充，加速了商品种类的更新。同时，远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具有迅速而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的现实可能性。例如，经济发达国家就需要三到五千或者六到八千种黑色金属轧材的品种和规格。为了在现代化的、具有高度生产效能的轧钢机上生产出钢材，每一个国家，如果它仅仅指望发展本国的冶金业的话，那么它每年就必须生产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万吨钢。在规模较小的钢铁生产中，生产全部所需的钢材品种可以在具有生产能力比现代化机组低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轧钢机的条件下得到保证。此外，在经济上需



要广泛的钢材品种和轧钢机数量有限的情况下，就必须经常维修轧钢机，而这就会使轧钢机的使用时间丧失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部门一体化（特别是在零件和工艺专业化的道路上正在发展的部门一体化）与相互的对外贸易相配合，包括作业提供，对于保证各国有可能建设最新的、专业化的、具有高度生产效能的机组和具有最大生产能力的企业来说，是现实而有效的条件。

互相提供燃料原料产品，首先是苏联的提供是保证经互会各国需要的最重要的来源。苏联所提供的份额在最近二十年中约增加了一倍，这证明苏联天然财富的重要国际意义。<sup>①</sup> 苏联提供给经互会各国的燃料和原料达到了很大的规模。一九五〇年苏联向经互会各国输出了七十万吨石油和石油产品，一九七二年的输出增加到了六千三百万吨。在最近十三年内，提供的天然气从二亿四千二百万立方米增加到四十亿零七千二百万立方米，电力从三千四百万度增加到八十四亿三千六百万度。苏联还对这些国家输出了大量的煤和焦炭、铁和锰矿石、黑色金属和铁合金轧材、有色金属、原木和其他原料产品。苏联不断增长的出口以及经互会各国互相提供燃料和原料之所以成为可能，既是由于对外贸易合作的传统形式的发展，也是由于这些国家之间生产一体化的发展。

燃料原料部门的生产一体化包括各种形式的合作。这首先是为了增加矿物原料和燃料的储备而实现了共同的地质普查和地质勘探工作（例如经互会国家在蒙古开展的共同的地质工作）；在双边的基础上（其中包括苏匈和波匈在提炼铝矾土生产中的合作）以及在多边的基础上（例如在生产小型化学产品或人

---

<sup>①</sup> 在经互会各国互相提供这种产品的总额中，苏联所提供的份额大致上从五十年代初的百分之四十增加到七十年代初的三分之二。

造纤维和合成纤维中的多边合作) 在生产原材料方面国际专业化和协作的深化;各有关国家贷款对他国工业项目的投资(其中包括一系列经互会国家为发展含铁原料、各种铁合金、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原料的生产提供给苏联的贷款)。

同这些合作形式有关的还有:建立国际合营企业(例如苏蒙在蒙古领土上组织的开采晶石、有色与稀有金属的合营企业“蒙苏有色金属公司”以及在铜钼的大型矿场基地额尔德尼井鄂博建立的合营采矿选矿企业);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某些地段以便开采一定的天然财富(例如保加利亚方面在科米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采伐原木);建立国际经济组织,以便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工程建设、生产、贸易(包括国际经济联合组织“国际原子动力公司”);用某几个国家的资金和人力建设某些企业,以备将来国际使用(例如经互会各国为了将来建立经互会有关国家的统一的动力系统而组织的动力系统联合公司;为了把乙烯从匈牙利运到苏联,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运到捷克斯洛伐克而建设或扩建了用管道联结起来的化学企业)。

燃料原料部门的生产一体化不是短时期内起作用的。在解决燃料原料问题时,不能只从目前的利益和已有的条件出发,而是必须考虑到长期的远景、在原料部门的发展和分布中不断变化着的情势以及在原料产品生产同消费中科学技术进步的新趋势。

在各部门的燃料原料综合体中发展生产一体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部门产品生产的特点和出口国的运输。无论是为了保证本国需要还是经互会其他国家的需要,使用苏联的天然财富势必引起财政上和物质上的巨大耗费,因为这首先是同这些资源的分布特点有关的。在苏联的欧洲部分和乌拉尔,居住着我国近四分之三的人口,这里生产着大约百分之八十的工业



产品，同时这些地区也消费着近百分之八十的燃料和电力以及大部分原材料。可是，在苏联潜在的燃料资源总数中，欧洲部分和乌拉尔一共只占百分之九，而在乌拉尔以东的地区却有百分之九十一的燃料资源。在苏联的东部地区集中着绝大多数的石油、天然气、煤、水力资源、森林、有色金属和其他原料的储藏量。

改进苏联工业在东部的布局，不可能完全排除苏联欧洲部分燃料原料的不足。一九七〇年苏联不得不从东部地区把大约一亿四千万吨燃料以及大量的各种原材料运到欧洲地区。近几年，从苏联的东部地区运往欧洲地区的燃料和原料不断增加。可见，扩大苏联对经互会各国的燃料原料供应通常总要加剧我国欧洲部分燃料原料的不足，需要进一步扩大东部地区天然财富的开采。考虑到在这方面有利害关系的不仅是苏联，而且也包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采取这样一些形式，使保证互利的共同努力能在这些形式中联合起来。

而且苏联出口原料和燃料势必引起长途运输的问题。如果说六十年代从苏联运输原料和燃料到经互会欧洲各国边境，基本上是在长达二、三千公里的距离内进行的，那末到七十年代末，运输的距离就将增加到三、四千公里。这种消极的客观现实，在对外贸易中，并不引起注意。商品，无论是原料还是机器都是在国境上出卖的。卖者把商品运到进口国国境上，路上究竟运送了三万公里还是三千公里，对于买者来说是没有区别的。可是这对卖者来说，并不是没有区别的，因为长距离运输会降低它的出口效果。但是主要的问题在于出口者和进口者都应该把这个问题当作共同的问题，从所有的复杂性上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忽视这些客观因素——运送距离的扩大和运输燃料原料产品时耗费的增长。运输上的技术进步远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能

补偿在不断拉长的运输中所发生的耗费。

保证苏联和经互会各国所需的大量的苏联东部地区的原料燃料资源，同开采、加工以及发展基础结构的大量投资有关。<sup>①</sup>在住房和文化生活建设上，按一个工作人员及其家庭计算，在西伯利亚的石油天然气开采地区的生活耗费要比在苏联欧洲部分几乎高一倍。

由于燃料原料产品从苏联开采地运至经互会其他国家消费地的生产和运输的特殊条件，所以有必要在建设、生产和运输上进一步加强协作。

燃料和原料的世界价格的提高，必然使经互会各国更加渴望对燃料动力业和原料部门的生产一体化，实现发展燃料、电力、原料和各种材料的共同规划。但是，这种互利只有通过加强互相联系和提供互惠，才能得到满足。在这方面，首先要进一步加强经互会有关国家在发展燃料原料部门直至制订共同规划方面有计划的共同活动；这些规划规定不同形式的联合投资，以建立新的生产能力和专用运输干线，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燃料原料产品供应上的互利。

物质生产一体化的进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一步完善专业化产品的价格形成。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下，规定专业化产品的对外贸易价格是适宜的；这一价格是在使用现代技术设备、工艺规程和生产组织的情况下以成品和配套品（这是必须为成品制造的）的生产费用为基础的。当然，在这方面应当考虑到最低的生产费用。这个问题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加工工业各部门需要进一步加紧开展专业化和协作，这就很有必要加速解决有效而互利的价格形成这一复杂问题。

---

<sup>①</sup> 燃料原料部门的投资比机器制造业高四到七倍（按照在价值上可比的产品量计算）。



经互会各国实行经济改革的经验，显示了生产活动和对外贸易活动联合的各种形式，这种活动正在扩大各级组织开展直接的国际经济联系的可能性。例如，在保加利亚，建立了一些专业化的对外贸易机构，作为国家经济机构的成员；一些部和主管机关有权从事对外贸易活动，而一些对外贸易机构也作为它们的成员参加进去。同时，外贸部仍然有权监督和领导各级经济机构的对外贸易活动。

在匈牙利，大部分大工业企业有权从事对外贸易活动。这里也推行工业机构和对外贸易机构相互联系的委托销售形式，后者根据同工业企业达成的协议，在委托销售的约定范围内销售产品。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在使用生产活动和对外贸易活动的几种联合形式。一部分工业企业和联合公司可以单独在国外市场上销售产品；某些对外贸易机构归经济联合公司管辖，根据同外贸部达成的协议销售联合公司的产品；另一些则归外贸部管辖，销售各企业和联合公司的产品。

在波兰，除了仅归外贸部管辖的对外贸易机构以外，还有作为生产联合公司成员的对对外贸易机构在进行活动或者正在成立。在捷克斯洛伐克，除了专业化的对外贸易机构以外，还有受联合公司和对外贸易部双重管辖的各个部门在经营商品出口业务。这里也采用生产活动和对外贸易活动的联合形式，把对外贸易机构变为独特的公司，各工业企业的代表广泛参加这些公司的领导工作。

随着经互会各国的生产一体化，在这些国家里出现了生产和外贸“接合”的明显而正在加强的趋势。在这方面，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第一，研究对外贸易机构加入各工业部、主管机关、联合公司和大企业的经验，以及后四者在国家的集中监督和管理

下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的经验；第二，在委托销售的原则上生产机构和对外贸易机构建立联系的实践。使用这两种形式，就为生产机构直接关心对外贸易活动的成果在客观上保证了优良的条件。第一种形式更适合于通过生产的国际专业化和协作而开展各部门内部的一体化，第二种形式适合于部门之间的一体化（例如，采掘和加工工业或它的某些部门）。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第三期苏联《经济问题》杂志 范休译）



（上接第 60 页）

展各种形式的财政信贷合作，首先是扩大国际投资银行的活动，建立各种类型的国际生产机构、科学技术机构以及经济核算制联合组织——所有这些措施，保证着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更好地发挥作用，为提高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联系的效率创造条件。

（摘译自苏联莫斯科一九七四年出版的《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一书 朱文娥译）



## 俄国在责骂它的经互会盟国

〔英〕《外事报道》

经互会在一九七二年莫斯科最高级会议上明确提出的“社会主义一体化”计划遇到了困难：匈牙利和波兰出现“越轨”行为，捷克人也越来越不听话了。

对捷克来说，重新调整是特别复杂的，捷克在一九四五年时，是中欧工业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谢迪维最近指出，捷克的生产能力现在受到人力资源不足的严重限制。这使它不能按照经互会计划要求的那样快、那样有效地扩大能源、或者开发原材料。

同时，俄国人明显地摊了牌。苏联驻布拉格商务参赞谢苗诺夫在捷克读者可以看到的一种技术杂志上发表文章，强烈抱怨东欧喜爱西方的机器和技术，而不喜欢苏联的产品。他说，如果保持目前从西方进口机械的速度，苏联则“不可能扩大经济关系，因为我们供应燃料和原材料的能力是有限的”。

谢苗诺夫可能是根据莫斯科计划者提供的汇报写文章的，然后再详细谈到俄国和东欧对经济一体化的看法上的基本分歧。匈牙利、波兰和捷克的专家们主张集中力量搞直接贸易交流，随之而产生一体化，俄国人则坚持，必须首先考虑同详细的集中经济计划有关的苏联经济的发展。谢苗诺夫说：“我常常发现从西方购买的工厂装备在苏联也生产，而且质量更好。”这种

（下转第 79 页）

# 苏联和经互会

〔西德〕维利·迪克胡特

## 经互会和它的转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年轻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处境十分困难。这些国家过去差不多都是半殖民地性质，依附于帝国主义国家。如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可以说是等于没有工业，就是波兰和匈牙利这些国家的工业也是片面发展，为帝国主义加工定货。除了战争的严重破坏外，还受到西方国家封锁禁运。苏联作出了当时力所能及的种种努力，帮助它们发展为政治上和经济上独立的国家。

人民民主国家遵循列宁和斯大林的教导：装备良好的重工业是建立独立自主和全面发展的经济的前提。这一方针无疑是考虑了每个国家的特点，根据是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人民民主国家都需要建立一个不同程度的统一的工业基础。这一方针并不排除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进行贸易和兄弟合作，但着眼点却是每个国家主要必须依靠自己的资源和考虑本国人民的需要来发展自己的经济。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有计划地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贸易和相互支援，一九四九年建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至一九五〇年底，计有阿、保、东德、波、罗、苏、捷、匈八国参加经互会。六十年代初，经互会接纳蒙古和古巴为正式成员

国,南斯拉夫为准成员国。相反,阿尔巴尼亚未再参加活动。

经互会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使成员国克服了它们的落后状态,大大改善了本国人民的生活条件。倘使一直坚持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方针的话,它们在今天是一定能取得更加动人的成就的。

之所以未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经互会国家的经济政策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随着修正主义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上台掌权,修正主义头目抛弃了全面地和独立自主地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而采用了帝国主义的“国际分工论”。

早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赫鲁晓夫就提出了这一修正主义政策的原则:“今天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需要象苏联从前那样发展重工业的一切部门了,苏联过去之所以要这样做,因为它在很长的时间内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现在,既然有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各国的联盟,它们的防御能力和安全都是以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工业力量为基础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欧洲人民民主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最有利的天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来专门发展某些工业部门和生产某些产品。”

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一九五九年第一期)对这一新方案作了更加清楚的阐述:“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兄弟团结和持续扩大的经济合作,国际社会主义分工日益重要,它使每个国家有可能这样来发展自己的生产力,即无需仿照苏联的工业结构而根据自己最有利的天然条件和经济条件专门生产某些产品。因此,对于例如象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来说,发展那些制造载重汽车、拖拉机、机车以及锻压设备的重型机器制造部门,是不恰当和没有好处的。这些部门早已在苏联和其他一些兄弟国家建立了,可以满足整个社会主义



阵营的需要……自给自足的倾向对于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十分有害。”

就在领土和人口少于苏联这一显然不成其为理由的借口之下，东欧人民民主国家被迫放弃全面发展经济，集中去搞一些“传统”落后因而具有“有利条件”的经济部门。按照这种逻辑，一个象比利时那样的小国或象日本那样缺乏原料的国家，要实现工业化那更是难以设想了。就是象波兰、捷克这种资源异常丰富、人口密度也比苏联大得多的经互会国家，也由于发展那些“早已在苏联建立了”的经济部门，而被说成是“不恰当和没有好处的”。

这些国家倒是应该变成苏联的销售市场和隶属于苏联的加工车间。苏联发展各种经济部门是天经地义的，因为“自给自足的倾向”在苏联根本没什么害处，相反，这种“自给自足的倾向”一到人民民主国家，据说就“十分有害”了。由此可见，“国际社会主义分工”的基础是多么不平等。在这种条件下，种种“兄弟合作”的动听言词都掩盖不了这一事实，即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由苏联一手控制而以“社会主义阵营经济一体化”的形式被固定下来。所谓一体化“恰当地把每个国家的利益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结合起来”（赫鲁晓夫语），戳穿了说，也就是同一心想把许多国家“合给”自己的苏联新资产阶级的利益结合起来。

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今天一直是帝国主义政策表现的一个方面。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不论是凭借武力占领、统治弱小国家的老殖民主义形式，还是对名义上独立的国家进行经济剥削的新殖民主义形式，或是将原有社会主义国家——部分依靠军事占领——完全束缚于社会帝国主义苏联太上皇统治之下的形式，都是和帝国主义一脉相承的。

## 社会帝国主义对经互会国家的新殖民主义剥削

修正主义者所说的“国际社会主义分工”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呢？总的来说是：苏联的国民经济生产国内消费所需要的大部分产品，而其他经互会成员国则专门集中生产一些比苏联成本低廉的某些产品。后者大批生产这些产品卖给苏联，一部分也卖给其他经互会成员国和资本主义国家或第三世界。一方面它们依靠苏联作为市场，因为它们不可能将专门生产的这些产品全部用于自己消费。另一方面它们也要依靠从苏联（在某种程度上也依靠其他经互会成员国和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绝大部分不属于它们专业生产的产品以及大部分生产专业产品所需的原料。因此，这些经互会国家必须完全听凭苏联摆布。这就是社会帝国主义者梦寐以求的“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他们嘴上说的是：经互会的内部关系不是每一个成员国和苏联之间的双边关系，而是所有经互会成员国之间“在平等基础上的全面合作”关系。实际上却完全不是那样。以波兰为例，据《一九六九年波兰小统计年鉴》介绍，一九五〇年波兰进口总额中苏联占百分之二十八点八，捷克斯洛伐克占百分之十三点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占百分之十一点五。这是波兰最大的三个贸易伙伴国。那么，既然说经互会是旨在全面进行合作，到了一九六八年，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比重总应该有所增加吧。事实正好相反：苏联所占比重增为百分之三十五点四，捷克和东德则反而分别降为百分之八和百分之十点四。

波兰的出口也是一样：苏联所占比重由一九五〇年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三增加到一九六八年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五；同一时期，捷克由百分之九点二降低到百分之八点六，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由百分之十三点九降为百分之八。

波兰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现象。匈牙利马特雅斯·斯齐勒斯意味深长地在苏联一九七二年第十四期《新时代》杂志上写道：“我们的国家同苏联的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说：“一九四七年苏联占匈牙利外贸总额的百分之十三点一，一九五五年占百分之二十二，一九六五年已达百分之三十五点六，一九七〇年更增至百分之三十六，按计划到一九七五年应增为百分之三十九。一九七〇年我国和社会主义国家换货总额中苏联占百分之五十五……一九七一年一年的外贸保证了我国百分之四十左右的国民收入，足见外贸在匈牙利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匈牙利全部原料进口的百分之四十一依靠苏联。有些商品（石油、柴油、镍、铁砂、生铁、机制纸需用木材等）苏联满足了我们进口需要的百分之九十至一百。”

一九五六年保加利亚进口总额中苏联占百分之三十三，一九六八年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二。一九五六年保加利亚进口的拖拉机将近五分之三购自苏联，其余部分则购自捷、罗和东德。到一九六八年则几乎百分之百从苏联进口。保加利亚从苏联进口柴油一九五六年为一万九千吨，一九六八年增至四十万零九千吨。同一时间内从罗马尼亚的进口数则由十三万九千吨减为两万七千吨。一九五六年保加利亚向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购进手表分别为一万四千只和四万一千只，一九六八年中向苏联购买六十六万六千只，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则仅购买六百只。这些例子就足以证明，经互会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单方面地倒向苏联一边了。

“国际分工”的具体情况怎样呢？下面略举数例：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九五八年出版的第五期《经济科学》杂志报道，经互会已就每个国家专门生产固定类型的加工机床达



成了协议。保加利亚一向生产的二十五种加工机床中规定只生产十种。匈牙利的二十种中规定生产十六种，东德的六十四种只准生产五十六种，波兰的四十种限定生产三十五种，罗马尼亚由十一种减为六种。相反，苏联生产的品种却未加以任何限制。

苏联一九六八年出版的第四十一期《经济报》指出：“匈牙利生产收割机是不恰当的，因为苏联在这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所以匈牙利农业机器部门已停止生产收割机，专门生产D4-K型拖拉机。”

如前所述，由于生产专业化，经互会国家被迫放弃了某些经济部门，而变成必须依赖苏联供应。《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一九六九年统计年鉴》介绍：一九六〇年保加利亚生产了七万五千辆自行车，到了一九六八年，却减到年产二万四千六百一十二辆。一九六〇年保加利亚只从苏联进口四百辆自行车，另有四千零八辆购自匈、东德和捷克等其他国家，而一九六八年则进口了三万零一百二十三辆苏联自行车和五百八十八辆其他国家自行车。这样看来，苏联资本家不仅霸占了保加利亚的国内市场，而且也打击了“兄弟国家”的竞争。

再有一例：从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期间，匈牙利将拖拉机产量由三千五百八十三台缩减为两千七百九十七台。而在这个期间，苏联出口给匈牙利的拖拉机则由两千五百八十六台增加到两千六百四十四台，匈牙利从捷克进口拖拉机由两千一百零四台减为五百二十五台，从东德进口的拖拉机由六百零四台减到零。

社会帝国主义者所以搞“国际社会主义分工”和“经济一体化”，其目的就在于把经互会成员国变成是推销苏联商品的可靠市场。而“一体化”更使得依附于社会帝国主义的国家越来越难

以保持其经济自主，难于摆脱对苏联的依赖关系和减少它们涉足其他市场的机会。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社会帝国主义者还通过“分工”将剩余的资本用来投资发展某些其他国家的企业，让这些企业专门生产比苏联自己生产更为便宜和利润高的产品，以供应苏联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无论苏联方面还是其他经互会国家方面(就我们所能看到的资料而言)都没有公布苏联贷款或经互会国家欠苏联债务的详细数字。苏联对外贸易部长帕托利切夫所著《对外贸易》一书中只是说：“苏联向保加利亚提供了大量长期贷款”或“苏联给予古巴以多方面的长期贷款”，或者说：“苏联向蒙古的出口额一直大于从蒙古的进口额，其原因是苏联以长期贷款方式向蒙古提供大量货物。”一九七一年的贸易决算说明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蒙古同苏联的贸易逆差为九千二百二十万卢布，远远超过了蒙古向苏联出口的计达七千一百五十万卢布的商品总值。由此可以估计蒙古每年负债达八千万至一亿卢布。这笔债由于蒙古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完全屈膝投降而得到部分减免，因为社会帝国主义者可以利用蒙古作为将来侵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据地。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报告中声称，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〇年期间，“社会主义国家”依靠苏联“技术援助”建成了三百多个工农业项目。“国际投资银行”的建立说明了经互会国家依赖贷款到了何等程度。经互会于一九七一年组织“国际投资银行”，共有基本资金十亿转账卢布，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等于三亿九千九百三十万卢布)由苏联提供。“关于建立国际投资银行的协定”提到：“银行的主要任务是，为实现有关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和合作计划，扩建共同关心的原料和燃料基地，以及建设为银行成员国经济发展共同关心的其他经济部门项目提供长期和

中期贷款。”这就是说，社会帝国主义者不仅仅是要确保自己拥有的销售市场，他们还以贷款形式输出资本，而且和其他帝国主义者一模一样附有严格的保留条件，即输出的资本必须用于“共同关心”的项目，也就是说，不是有利于接受贷款的国家，而是有利于提供贷款的国家去束缚接受贷款的国家。

所以说，问题主要在于经互会国家国民经济的新殖民主义依赖性。这种依赖性还可以使社会帝国主义者通过重利盘剥和贵卖贱买进行额外剥削。由于经互会国家本身经济的畸形发展，它们不得不依靠苏联的进口，因此社会帝国主义者可以任意提高苏联商品的价格。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国家用不了自己大量生产的专业化产品而不得不卖给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又可以压低这些产品的价格。

嘴上说，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价格以“客观基础”作为根据，而且是根据“在一定程度上订正过的国际贸易价格”。这种价格据说是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时价为标准，同时稍作“订正”，以“消除”世界市场价格的不合理之处。因此，可以指望苏联大体上能够按照卖给世界市场亦即资本主义国家的价格向经互会国家出售货物，只是稍许有些不同，而这对比较困难的贸易伙伴来说一般是有好处的。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社会帝国主义者公然向自己的经互会伙伴伸手要利上加利的价格，根本不能同他们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要价相比。

我们想列举苏联同两个德国的贸易为例说明这一点。下表是一九七一年东德和西德进口苏联同类商品的价格，这是我们按照苏联官方对外贸易统计资料计算得出的。从中可以看出，卖给西德的商品绝大多数价格远较东德为低，有的甚至低一半以上。

至于苏联的进口情况，要列出数字加以比较不太容易，因



## 一九七一年东德和西德进口的苏联商品价格

进 口 商 品	单 价	东 德	西 德
硬煤	每吨卢布	12,63	6,94
铁砂	”	7,52	6,19
锰砂*	”	16,60	16,07
黄铁砂*	”	7,60	6,89
上等石棉	”	121,37	108,86
铁棍(废铁)	”	30,77	25,88
镁	”	620,30	571,20
苯	”	71,10	33,82
甲苯	”	55,00	26,14
甲醇	”	50,09	36,23
浓缩磷灰石	”	15,57	12,15
针叶林锯木	每立方米卢布	40,74	40,40
亚硫酸盐植物纤维素	每吨卢布	144,27	142,14
硫酸盐植物纤维素	”	126,55	115,85
棉花纤维	”	699,24	617,64
亚麻纤维	”	217,08	174,65
肠衣	每扎卢布	1,04	0,92
小麦	每吨卢布	66,04	58,11

\* 1970年数字。

为苏联既从东德进口也从西德进口的产品很少。可以谈谈氢氧化钾的情况：一九七一年苏联从西德进口两千七百二十五吨，付款五十五万四千卢布，每吨价格为两百零三卢布。从东德进口两千二百一十吨，付款四十万零四千卢布，因此每吨价格只有一百八十三卢布。苏联从西德进口合成橡胶每吨价格为六百七十九卢布，而向东德进口的每吨价格为三百五十五卢布，几乎只有一半。

由于这种暴利盘剥，经互会国家在同苏联的贸易中出现了

大笔逆差。象蒙古这样一个农业国出现的逆差尤其骇人听闻，一九七〇年达到一亿两千五百四十万卢布。六十年代开始，这个国家将自己的工业化计划拚命作了减缩而集中主要力量搞畜牧业。

一九七一年古巴进口苏联商品的价值为六亿零两百万卢布，而对苏出口则只有两亿八千八百九十万卢布，贸易逆差竟达三亿一千三百一十多万卢布，超过了整个出口额。除一九六五年外，经互会国家集团一九五七年以来贸易决算年年欠苏联的债。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十月西德再版的《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一书 杨寿国译)

---

(上接第 69 页)

说法是含糊的，但是，怒气是明显的。

经互会中的摩擦长期以来是明显的，但是俄国人并不常常是这样直截了当地、这样公开地发泄他们的怒气。

(摘译自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三日英国《外事报道》)

## 挫败北极熊称霸海洋的野心

江 云

海洋，从来是帝国主义逞王称霸的重要场所。从本期摘译的几篇有关文章、材料中可以看出，苏修这头北极熊在追逐海洋霸权中，已经达到了十分嚣张的程度：黑海是它的“内湖”，北极海域成了它的“里海”，不仅如此，它还想把地中海、红海划为“内海”；它的军舰在英伦三岛四周游弋，在印度洋昼夜出没，在对马海峡、在太平洋横冲直撞；今年四月，它的一次海军“演习”，竟出动了二百多艘军舰，比平时它在公海上活动的军舰多达一倍以上……。苏修海军头目戈尔什科夫狂妄地叫嚣：“苏联海军的旗帜现在趾高气扬地在世界海洋上到处飘扬了！”

这头北极熊之所以要在海洋上到处横冲直撞，按照戈尔什科夫的说法，一是因为“只有海军才能保卫本国边疆以外的据点”；二是通过海军“礼节性访问和炫耀军威来赢得朋友和影响别人”。这无异是苏修侵略扩张的自供。既然“据点”已伸展到本国的边疆以外，那当然是侵占别国的领土了。如果这也称得上是一种“保卫”的话，那末，只能是“保卫”侵略的果实了。所谓海军的“礼节性访问”，北极熊在这方面确实也做足了文章，不仅舰队频频出访，而且还通过电台、报纸、小说，大肆宣扬军舰的“友谊”。现在明白了，这原来是为了“炫耀军威”、“影响别人”。怎样“影响”？戈尔什科夫吞吞吐吐，说穿了，就是同美帝争霸海



洋。至于什么“赢得朋友”云云，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并不陌生，这无非是苏修侵略、掠夺、奴役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幌子罢了。

戈尔什科夫的自供，十足是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但是对于这种逻辑，他却十分自我欣赏。他旁证博引，大谈俄国的海军历史，从中引出“帝俄的强大只是由于它们具有强大的舰队”的结论。在这里，戈尔什科夫无意中吐露了北极熊海上称霸的根子。当年，老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穷兵黩武，驱使乌沙科夫统率海军在黑海等处逞王称霸。今天，新沙皇以及新的乌沙科夫之流向往的就是这称霸海洋的迷梦。

新沙皇继承的是老沙皇的衣钵。但是，如果把这个衣钵简单地说是老谱袭用，那未免也有点小看它了。当年，老沙皇还不过是一个海上的二等强国；今天，新沙皇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超级海上霸王。英国的《简氏战舰一览》把它列为世界舰队名单上的第一位；西方普遍认为，至少，它“在海上争霸中正接近于美国”。这些分析是有根据的。当年，老沙皇固然野心勃勃，妄想称霸世界，但是，由于力不从心，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望洋兴叹；今天，新沙皇心狠手辣，已远远超过了它的前辈。它主张“争取发第一炮”，认为这“在现代海战中取得了特殊重要的意义”。面对这种赤裸裸的强盗战略，如果希特勒仍然在世，恐怕也要甘拜下风。至于要让北极熊的旗帜“在世界海洋上到处飘扬”，正十足地暴露了苏修妄想成为奴役世界的“日不落国”的野心。

北极熊的勃勃野心，引起了西方世界的一片惊恐。超级大国争夺的首要目标是欧洲。苏修正北从巴伦支海、挪威海、波罗的海、北海，南从地中海，西从大西洋包抄欧洲，以使“强渡易北河”成为没有必要。这个严重的局势已经成了美国和西欧各国瞩目的中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伦斯说，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美国担心分散的海军力量难以抵挡北极熊的进攻，担

心在苏修疯狂的扩军备战面前，时间的因素对它自己不利。于是，美国国防部长提出了对付苏修的新的战略，美国海军部长提出了扩充美国海军的新方案。扩军备战的竞赛在海军中突出起来了，战争的乌云在世界五大洋上空积聚。

北极熊的称霸野心是当今世界上不得安宁的一个主要根源。“山雨欲来风满楼。”面对这种形势，必须有所警惕。我们要用加强战备的实际行动，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挫败苏修的一切侵略阴谋，挫败苏修称霸海洋的野心。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 海上的挑战

〔西德〕沃尔方·霍普柯<sup>①</sup>

在一九七三到一九七四年版的《简氏战舰一览》里，苏联的海军被排列在世界各国舰队名单上的第一位。这份受人重视的英国海军出版物，根据苏联海军力量的迅速增长所作的这种结论，甚至叫专家也感到意外。不过，钟摆尚在摇荡。具有公认的、强大导弹能力的苏联海军，是否确已赶上美国海军，还大有问题。但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军备竞赛的迹象，明摆着是会在这个领域里出现令人吃惊的事情的。

苏联不再是一个仅以土地大小计算的巨人了。这个从地理概念上说的陆上强国的典范，现在已远远超过了曾一度统治海洋的英国，并且在海上争霸中正接近于美国。这恐怕可以看作自苏联帝国建立以来对西方最大的一次挑战。这场挑战可能在后代人眼中看来，是一次富有历史意义的变化。

一九七四年三月底，曾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当了三年主席的约翰尼斯·斯坦霍夫严肃地指出：“日益强大的苏联海上力量，很可能是本世纪下半段时间里最为重大的军事、政治演变。”这话可不是海军大将说的，而是出自空军将领之口。这位空军将领在西方盟国最高军事机构的领导班子中工作多年，

---

<sup>①</sup> 沃尔方·霍普柯是一九四八年创办《德意志报——基督和世界》的发起人之一，一九五八年任该报驻波恩记者。著有《波罗的海——红色的内海？》，《地中海有多红？》，《向大西洋冲击——来自北方的威胁》等书。



日益倾向于把一场海上的冲突看得比一场陆地的冲突更为重要，更应提前考虑。

斯坦霍夫将军在他的情况报告中写道：“苏联在海上推行强权政治，几乎要比它在中欧的对抗更使我感到惊惶不安。”他又接着写道，苏联的军事机器，特别是它的海军，已成为一支强大力量，“当苏联在精心拟制的实力政策的框子里运用这种力量时，就势必出现许多妥协，而这些妥协对危机地区里日益衰弱的西方来说，将一次比一次更为不利。”

西方在改变它们对未来冲突可能采取的形式传统观点上，还是很勉强的；在开始认识由于苏联在所有海洋上的大肆扩张而使世界局势发生革命性变化的一点上，也是很勉强的。这个占有地球土地六分之一的巨大帝国，自建立一支远洋航行的舰队以来，已经把它以大陆为限的桎梏抛弃掉了；并已把争得世界强国地位的愿望付诸实施，它表现为拥有在全球所有地方进行直接干预的潜力。

### 无法损毁的公路

海洋是无法损毁的公路，是人皆可往的。苏联海军建设计划目前所花的钱，要比用在宇宙空间计划上的更多。这个国家已能充分体会海上力量的重大含义，它的海军建设计划搞得颇为起劲。使苏联获得力量的军事要素是船，而不是坦克了。海军政策就是外交政策。苏联随时准备着军事威胁，但它的用武之地首先在于显示政治力量。情况可能还是这样：苏联并不打算来一次大的军事冲突，它的造船计划主要是为它的地面武装力量增加另一项施加压力的手段，借以达到其帝国主义扩张的目的，更不必说在政治上统治欧洲了。

西方的观点是，武装力量只有在局势紧张期间，只有在非常时期里，才起作用。相反的，苏联的军事理论则认为，由于武装力量的存在，及其施展的压力、恐吓和威胁，即在和平时间里，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工具。特别是，当苏联建立起一支能够驶向一切海洋的远航舰队后，取得了同西方盟国相对抗的第二种选择，武装力量就更可充作政治工具了。苏联在进行扩张活动时，再也不必在边境线上打击敌人了；战争也不再需要在中欧发生；由于双方都在中欧集中着军事潜力，苏军只要在那里推进一下，就有立刻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是可以海军力量悄悄地破坏掉的——不必诉诸武力，只要显示军事威力就行了。西方仍然习惯于认为，西欧的安全有一条线——铁幕——作为标志，遇到侵犯时，那条线才是必须用核武器、或不用核武器加以保卫的。但是，如果为了达到它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在欧洲建立霸权体系，俄国人完全可以使用危险性较少的办法时，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强渡易北河呢？现在已到了西方对“威胁”这个名词加以重新释义的时候了。鉴于我们海上的供应线存在危险，以及核潜力已扩展到了大海之上，这个词已具有了更为广泛的含意。它也超越了目前对间接战略所下的定义，那原是把暴动、政变、游击战术都特别地归作为现代战争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

从经济上来说，这个横跨于易北河和太平洋之间，为莫斯科所控制的大陆帝国，事实上是自给自足的。它不需要红色舰队保护它的供应线。反之，对西方来说，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却要通过海洋。最近的中东危机已突出地说明了，这在和平时期里可能意味着什么，在紧张局势下更可能意味着什么。阿拉伯国家切断对西方的石油供应，从而孤立以色列并最后迫使它投降的企图，不能仅仅看作为一次“能源危机”的程式，不能仅仅从经济

的得失上去衡量。从长远的观点看，安全政策的背景是同样地重要，甚至更有决定意义。

威胁已取得新的规模，东西方冲突已扩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远远超出了中东这一麻烦的地区。如果没有苏联和它的强大海军力量的支持，石油国家是不敢如此毫无忌惮地推行它们那项大胆的禁运政策的。苏联的报纸宣传对石油禁运是不加掩饰地予以赞助和欢迎的。莫斯科曾指出，阿拉伯国家终于做到了苏联屡试无效的事情：使西方陷入一场严重危机，并同时西方盟国的能否团结一致进行考验。

### 代理人的战争

把中东战争描写为一场“代理人的战争”——阿拉伯一方在这场战争中试验了最新的武器系统和警报措施——不能仅限于直接的军事和战略领域。人们甚至还可以说它是一次“代理人的经济战”。苏联利用阿拉伯国家进行了一次彩排，试探运用经济武器，控制海道和必要时封锁海道，能在削弱西方工业国和日本，挫伤它们的士气上取得何种成效。阿拉伯的石油储备，加上苏联的海军，将作为施加压力的一种工具，用以促使西欧脱离美国，并在承认苏联霸权的意义上使西欧中立化和“芬兰化”。

跟这点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对欧洲的两个“近海的侧翼”加以包围的打算。在中欧，苏联今天主要是把它的吞并活动局限于易北河，而这是国际法所认可的。中欧紧张局势的和缓就自动地增加了苏联在欧洲北方和南方侧翼的压力，把压力从相对稳定的中部地区转移到侧翼后，莫斯科认为它已找到了解决中欧所产生的僵持局面（尽管力量历来是不平衡的，并对华沙条约组织有利）的最有效的办法。



苏联在中欧的军事扩张是被挡住了。苏联现在正绕向欧洲的西部，把它们主要的压力施加于西欧的边沿。这正是莫斯科认为已经找到了的、从事影响深远的冒险事业的活动场所。这同政治和颠覆活动结合在一起，是准备从海上迂回制胜欧亚大陆上的西欧“桥头堡”的计谋。在共同均衡裁军会议期间，西方往往都只是想到中欧，而对苏联前所未有的海军建设掉以轻心，这种普遍的倾向就更为危险了。

苏联总参谋部的一个基本设想是从欧洲的两个近海的侧翼，把欧洲包围起来。从中东冲突，加上石油危机和苏联地中海舰队的活动来看，南翼的局势应该认为是特别严重的。可是，两个侧翼上的钳形行动不应使我们看不清这事实，即扩张主义者的压力已更多地转移到北翼上去了。这也包括波罗的海区域，那里有船坞和潜在的训练设施，是苏联海军向全世界扩张的起点。可是，比过去更厉害的是苏联在北冰洋前线上的建树，那里集中着这么多的海军、陆军和空军，人们简直可以把它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军事综合体。在苏联人的眼睛里，不仅北海、波罗的海和丹麦的一些海峡构成一个战略整体。苏联在波罗的海地区里海军力量的压倒优势，使它能很方便地和北冰洋舰队的行动协调一致，并形成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一种钳制运动。莫斯科的侧翼观念又是跟中欧的战略目标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事实的另一种迹象，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不应该分别对待，而必须看作是一个整体。

### 存亡攸关的供应线

海上攻击力量集中于北欧，它的目标却是在广阔的大西洋。西方盟国存亡攸关的供应线经过大西洋，并且通过大西洋把西

欧和北美联系起来。当苏联还在地中海追求有限的目标时，北欧的海域则成了它们庞大的战略攻势的基础——把欧洲和它的“后方”（美国）切断，从而使欧洲的防务自动地垮台。沿着卢卑克-霍夫-帕骚一线（“卢卑克-的里雅斯特线”）的陆地前沿的防务，将从海上予以迂回击破。

苏联既已具有在大海上实施战略攻击任务的能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自成立二十五年以来所形成的北大西洋的平衡，是肯定无疑地改变了。这不仅指间接战略而言。涉及的还有些根本问题，甚至还有在发生战争时西方盟国会碰到的那个根本问题。伦敦秘书长曾说过，“保持海洋航线畅通无阻，对我们西方盟国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在北美和欧洲之间，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地中海”两岸之间挤得很紧密的航道，是西方盟国的神经系统。控制这些航道，封锁它们，截断它们，是苏联海战的优先目标。把海战引伸到大西洋，就是要打击中欧防务的主要支柱。

根据粗略的估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欧洲，在战时每天需要经过海洋运来十万吨的重要防务物资。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来说，材料、武器和其他物资的供应是极为重要的。即使进一步加强空运的能力，但极大部分的军事物资（约百分之九十）还将依靠海运。

保护供应线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必须在整个大西洋处处小心警戒，而苏联则能选择最有利的地区和时间进行攻击。不仅潜水艇的鱼雷攻击是这样，苏联那些经常在革新导弹装置的、比较新颖的水面舰艇同样如此。对海上联络的监视和越来越急的反潜艇战的需要，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项非常费钱的计划，何况现代武器系统的成本暴涨得如此厉害，情况不免更严重些。

海战时是无所谓什么前线的。双方力量在攻击和反击中不断改变着前线。马奇诺防线的概念也用不上。所需要的是灵活机动和大范围战区的部署。但对这种重大的作战专用海域的考虑并不排除一个中心问题，即西方在北大西洋中具备决定意义的后撤基地在哪里。有着科拉峡湾和摩尔曼斯克的巴伦支海，早已成了苏联的海，不再为西方所控制。按照苏联海军指挥部的想法，欧洲的北极海域看来也已内定为苏联海了。从苏联海军的演习概念中，可以日益清楚地看到，挪威的大部分早已落入苏联前沿战线的后方范围中。苏联人显然在估计，西方真正有实力的防卫，只是在冰岛、苏格兰和挪威中部之间的海峡才开始存在。

## 大西洋战略

核战正在海上开展这一事实，使大西洋战略增加了另一层重要意义。因为，用核武器装备起来的潜艇事实上不是一般概念中的海战工具，而必须看作为可以浮沉的导弹发射台，所以通常的海战的类别一下子就被突破了。海军只起了辅助者的作用。美国除了洲际导弹和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战略轰炸机之外，它那装备着导弹的潜艇舰队，也是被当作最有效的威慑手段的。大大加强苏联海军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要使美国在北大西洋中浮动的核潜力瘫痪掉。苏联海军活动的一部分目的，即在于通过建立它们自己的装有弹道导弹的潜艇舰队，来威胁大西洋两边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地区。

两个超级大国在核战略方面的争雄，已经闹得几乎不可开交，它们在海军方面的角逐更给那场竞赛增添了特别强烈的戏剧色彩。一九七四年年初，国防部长施莱辛格所宣告的修改美



国核战略的计划,正是为了保持那种受到威胁的平衡;美国准备加快发展诸如三叉戟潜艇导弹革新式武器系统,借以对付行将拥有更为有效的导弹的苏联水面舰艇和潜艇。施莱辛格先生所宣告的,规定着冲突升级级别的新的安排,将为美国总统提供有限的核战争选择,从而使美国维护和平的政策更能取信于人。

所有这些都是针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部分防区的北大西洋的。鉴于苏联舰队的扩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种把自己限制、束缚在北回归线以北的海区的做法,已一天比一天地更成为问题。西方盟国计划中所出现的南大西洋的真空,对苏联来说,吸引力与日俱增。除了古巴作为苏联基地之外,还必须加上正在发展成为苏联海空基地的科纳克里。

## 南 大 西 洋

南大西洋今天已不再是“无人之海”。自从封闭苏伊士运河、把欧亚之间的航运绕道好望角以来,大西洋的南部已突然变得非常重要。这次改变对取道自世界上石油储藏最富地区的波斯湾、绕过非洲南端而达到西欧的石油运输,影响尤为严重。在使用超级油船和集装箱货船的趋向中,即使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好望角路线仍将是巨大的国际货运航道。

在陆地上,北大西洋条约确有规定,对盟国之一的攻击,即侵犯它的领土时,就等于是对所有盟国的攻击;但在大海上,领域的界限可并无严格的划分。因此,尽管正式限定的是,在北大西洋地区里,西方要行动一致,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海军力量不能在其他海区进行接管和承担保卫任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葡萄牙在非洲的属地可以用作为好望角航线上的侧翼阵地。除日本之外,正在成为另一个潜在的世界新

强国的巴西，也在鲜明地表示它已理解在南大西洋中的责任，而进行着一项规模巨大的海军建设计划。这将和南非所从事的防务活动相配合。由于南非处于大西洋和印度洋之间战略上的关键位置，对苏联海军的进攻计划来说，南非是极为重要的阻击阵地。把这一事实考虑进去，将符合西欧和美国的防务利益。

在埃及和以色列武装力量脱离接触之后，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正成为解决中东问题的起点。而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在战略上特别有利于苏联。运河现有的宽度和深度，对苏联最大的巡洋舰级的战船是适宜的，甚至对将在一九七五年服役的苏联第一艘航空母舰同样如此。运河一旦重新开放，苏联进入印度洋的航程将大为缩短。当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没有直接的南北贯通的航道时，地中海里苏联舰队的活动终将是充分的。苏联舰队集中于东地中海并不只意味对欧洲南翼的威胁，它有着更深一层的战略意图。

印度洋是苏联大陆帝国唯一没有直接通路的海洋。但是，苏联不管地理上的一切缺陷，竟能在最近五年之内，把海军在印度洋出现的次数提升了十倍。苏伊士通道的开放，将使此种活动进一步迅速增加。苏联在世界的这块地方增加其出现次数，既有对抗西方的动机，也有对抗中国的动机。莫斯科的目的是同时对正在显示海上勃勃雄心的强大敌手中国，筑起一道海上壁垒。

莫斯科想在印度洋中树立它的旗帜和增加它的影响。除了心理和政治效果之外，派遣到印度洋去的苏联舰队，可能和驻泊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周围的太平洋舰队一起，都负有改变南亚和东南亚的战略形势的任务，象以往在阿拉伯地区所干的一样，不过阿拉伯地区必须被看作为苏联向全世界扩张的主要的得势地区。

这样，苏联在地中海的阵地将和它在印度洋北部的阵地相结合，构成一个环绕阿拉伯半岛和伸进波斯湾的战略综合体系。相对于波斯湾而言，苏联今天是把中东当作“近南”的。石油利益和战略问题两者联系在一起。苏联将能阻止西方取得波斯湾石油的前景，是苏联全球战略的一个强大动机。苏联海军一直试图在波斯湾的石油航道沿线构筑一连串的基地。非洲大陆的东侧和红海的一些据点，同样有此情况，而红海和东地中海相似，也是苏联海军参谋部计划中的一个潜在的苏联海。

当西方倾向于把海军看作为昨天的一种武力，苏联则把它变成了明天的武力。在缓和辞藻的烟幕后面，苏联增加了一整套直接和间接战略的新的可能性，由于海军力量的上升，情况尤其如此。从冷战到火热的和平，西方完全有理由防止一种想法，即打算把“大西洋说了算的和平”改为“苏联说了算的和平”。因此，西方在考虑由于苏联海军扩张所造成的新局面后，理应联系海上的情况，来研究它们总的威慑战略的含意。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第三期《北约评论》杂志 马家骅译）



## 俄国的海上力量

〔加拿大〕W·约翰·法夸尔森<sup>①</sup>

“苏联海军的旗帜现在趾高气扬地<sup>①</sup>在世界海洋上到处飘扬。美国海军迟早必将懂得，它已不再能控制世界海洋了！”

——苏联海军元帅谢尔盖·格奥尔基耶维奇·戈尔什科夫

讲这两句具有威胁味道的夸口之言的人，指导俄国海军的发展已有十八年之久。在此期间，戈尔什科夫曾惊人地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迫使一个不太愿意的莫斯科当局把“工农红军的海军部队”从一个规模不足道的沿海防御舰队转变为一个规模仅次于美国海军的全球性海军力量。

戈尔什科夫的四支海上舰队（北方、波罗的海、黑海以及太平洋舰队）现在是苏联推行外交政策时最显而易见、最得力和最灵活的助手。

现代俄国海军有四十六万五千名官兵和两千多艘军舰，大的包括装有五点九吋口径大炮的一万九千吨的斯维尔德洛夫级重型巡洋舰，小的包括时速四十五哩的四十吨科默尔级快速巡逻艇，还有三百九十五艘潜水艇，其中包括六十二艘最新式的Y级弹道导弹核潜艇。这种核潜艇在六十年代初一经问世，就使海军水下战争革命化了。同北极星/海神式潜艇一样，Y级潜艇是核动力的，载有十六枚能消灭城市的核弹头导弹。它能深潜海

<sup>①</sup> 作者是加拿大军事评论家。——译者

洋,躲开搜索它的战舰,只要莫斯科一声号令,就可随时毁灭象远在内地的芝加哥这样的目标。

Y级潜艇大约有一个半足球场那么长,其重量大致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巡洋舰的重量。它在水下的时速也能高达三十哩以上——较之多数搜索它的船只在水面上的航行速度来得快。

除了这六十二艘“走在时代前面”的Y级潜艇,苏联海军有十九艘重型巡洋舰,两艘新的反潜“直升飞机航空母舰”“莫斯科号”和“列宁格勒”号,二十四艘到二十八艘“导弹巡洋舰”(其中包括八艘最新式的克列斯塔-II级和克里瓦克级巡洋舰),一百二十艘驱逐舰和远洋护卫舰,还有七百多艘快速导弹巡逻艇、猎潜舰艇、核潜补给船和海军陆战队的攻击型登陆艇。

它的三百九十五艘潜水艇,其中一百二十艘装有导弹,而且六十二艘是弹道导弹核潜艇,这就使苏联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潜艇舰队。同美国共有一百六十艘潜艇相比,苏联的数字是大得多。但美国有七十九艘核潜艇。

然而,苏联正以每年八到十艘的速度添造Y级潜艇。并且愈来愈多的潜艇已能发射新型的水下导弹,其射程为一千五百哩到两千哩。(北极星/海神式潜艇导弹的射程为二千五百哩到二千八百哩。)

苏联海军航空部队有八百五十架飞机和驻在苏联基地上的十万多名航空兵。时速达一千哩的远程双发动机攻击型图22(眼罩式)喷气机正在取代较老的时速为六百五十哩的图16(獾式)喷气机。图22已成了他们的主要武器。海军航空部队的重型远程轰炸机(熊型)也经常试验如何飞近美国航空母舰而不被它的雷达所发现,因而不致于遭到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战斗巡逻机的截击。

苏联海军的目标是让它的飞机能飞到离航空母舰一百哩的地方而不被发现。在这一距离内，海军航空兵就能在航空母舰还来不及赶派战斗机去截击苏联海军轰炸机前十拿九稳地用空对船导弹打中航空母舰。

到现在为止，没有迹象表明俄国人将建造任何造价为五亿九千八百万美元的“尼米兹”式超级航空母舰。显然他们认为这样的航空母舰容易遭到导弹、核潜艇或装有核弹头的水雷的袭击。

但是，他们的两艘时速三十哩的一万八千吨“直升飞机航空母舰”“莫斯科”号和“列宁格勒”号各载有二十架象 Ka-25A 反潜直升飞机或雅克式直升喷气战斗机这样的飞机。这两艘船“监视”着地中海的美国第六舰队，进行对付北极星潜艇的反潜演习，并能在发生纠纷的地区空降一支“黑色”海军陆战队。美国就曾在黎巴嫩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空降过海军陆战队。

要把苏联海军图景描绘完整，还必须提一下这件事，即最近苏联恢复了大战时传奇式的“黑色”海军陆战队，那是一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列宁格勒战役的英雄部队。现在这支队伍有一万五千到两万人，都是经过精心挑选，身体特别棒和胆子特别大的人。这些海军陆战队士兵穿他们特有的黑色冬季和夏季制服以表示荣耀和威严。他们有特制的八轮装甲运兵车和登陆艇，还有在登陆时能从水里开上岸的两栖坦克。

苏联海军的到处出现已对世界事态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在一九六八年，在剑拔弩张的日本海中，几十艘苏联巡洋舰和导弹护卫舰就曾强行在北朝鲜海岸和美国的一支特遣舰队之间的水域上行驶。美国舰队被派往那里，是作为向北朝鲜提出释放“普韦布洛”号间谍船上的八十一名水手的外交要求的后盾。苏联海军这样做就抵销了美国施加的压力，使克里姆林宫



能在局部地区维持一个压力点而又不必诉诸核讹诈。

## **苏联的主要目标是 从侧翼包抄北约的陆地防御基地**

一九七〇年苏联海军舰队进行的“海洋大演习”，共出动了两百艘战舰，巡逻于世界各大洋，巧妙地提醒了美国海军去注意俄国的海军力量。

苏联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从侧翼包抄北约的陆地防御基地。通过渗透到地中海、印度洋以及现在甚至到了阿拉伯海，俄国人已部分地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在苏联的三百五十万军事人员中，苏联海军是如何同其他四个军种争夺俄国优秀青年新兵的呢？

陆军要去两百万人。空防部队又要去五十万人。苏联空军包括战术空军在内再要去四十七万人。精锐的战略火箭部队有三十五万人。这样就留了四十八万人给戈尔什科夫的海军。

戈尔什科夫在三十一岁时就成为俄国海军史上最年轻的一星海军少将。一九五六年他四十六岁时，赫鲁晓夫任命他为苏联海军总司令。那时他是一个爱吵架的三星海军上将。

六十年代中他再次得到提升，成为海军元帅。

在他把斯大林时代的海军大为扩张以后，他控制的组织和武器规模已足以使国防部长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又一次提升他，为他而新设立了苏联海军元帅的军衔。

不仅是人们一眼看到的他穿的海军制服上有了变化，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也已充分具备了当国防部副部长的条件。他还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

四个舰队（北方、波罗的海、黑海、太平洋）各自是一个强大

的、多兵种的、然而却是统一指挥的单位。它拥有强大的水面舰只，核动力和内燃机飞航式导弹潜水艇和反潜潜水艇，远程轰炸机和海军侦察机，海军陆战队，还有沿海防御用的大炮、导弹和火箭。

每支舰队有它自己的骠悍勇猛的“黑色”海军陆战队约四千人，备有登陆艇、水上坦克和装甲运兵车。由于海军陆战队的技术人员和士兵穿的是全黑的制服，手臂上带着红圈内有铁锚的臂章，所以他们是很容易识别的。

“支援舰队”有专门为核潜艇提供补给的乌格鲁级供应船；有供应内燃机飞航式导弹潜水艇的拉马级导弹储藏船，另外还有供应远程潜艇的顿河级供应船。海军的水上支援舰队还包括两艘雷达追踪船，几十艘雷达哨潜水艇，大量的测量船和装有“电子设备”的拖网渔船。所有这些船只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非战斗舰队”。

苏联的相当于北极星的Y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以及其他导弹潜艇，基本上是编在北方和太平洋舰队里的。北方舰队司令部共部署约三十艘Y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和三十五艘飞航式导弹潜艇，而太平洋舰队则部署其余的导弹潜艇——约四十艘Y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和四十五艘飞航式导弹潜艇。

四个舰队拥有苏联海军的最新式重型快速导弹战舰。

海军元帅洛鲍夫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北方舰队拥有八百艘舰艇，其中包括三艘巡洋舰、一百五十艘潜水艇和三十五艘驱逐舰。

海军上将米哈伊林的波罗的海舰队拥有七百五十艘舰艇，其中包括五艘巡洋舰、七十五艘潜水艇、三十五艘驱逐舰和两百艘快速巡逻艇。

海军上将西索耶夫的黑海舰队有七百艘舰艇，其中包括六

艘巡洋舰、四十艘潜水艇和五十艘驱逐舰。

海军上将斯米尔诺夫的太平洋舰队有七百五十艘舰艇，其中包括六艘巡洋舰、一百艘潜水艇、五十艘驱逐舰和大型护卫舰。

苏联海军现有一百多艘导弹潜水艇，构成了苏联战略核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正在尽快地建造Y级弹道导弹核潜艇，每年可造出八到十艘，而且还在设计更新型的核潜艇哩！

至少有三艘，有时多达九艘苏联弹道导弹核潜艇，在美国海岸外八百哩到一千哩的地方经常停留达两个月之久。

同美国的北极星核潜艇一样，苏联的Y级弹道导弹核潜艇载有十六枚SS-N-6导弹，每个导弹的射程约为一千七百哩。前国防部长莱尔德先生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九日曾指出，苏联的海上发射弹道导弹力量不久将达四百枚。根据现在的每年八到十艘的建造速度，那末苏联在一九七四年就能同美国北极星潜艇的力量相抗衡了。

苏联海军正在“计划恢复”最高司令部的“活力”，强调要对美国海军能发动核打击的航空母舰的强大威胁作出“灵活反应”，这意味着戈尔什科夫正在把他的最优秀的海军将军们提升到主要的舰队岗位上去。

这位总司令为自己设置了苏联海军元帅的军衔。他是海军中资历最深的现役高级军官，一九五六年从库兹涅佐夫海军元帅手里接过权力。人员有十万名的海军政治部，头头是海军上将格里沙诺夫，一九五八年以来一直担任此职。副总司令海军上将阿麦利科出生于一九一四年，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九年间在太平洋舰队服役了七年。

米哈伊林是以海军中将衔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七年间担任波罗的海舰队第一副司令的。然后他晋升为三星海军上将，从



海军上将奥列尔手里接过了指挥波罗的海舰队的权力。这是按照第一副司令可以晋升为指挥一个舰队的海军上将的“惯例”行事的。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波罗的海舰队的政治部主任则一直是两星海军中将波丘帕依洛。

西索耶夫是在一九六八年底被提升为海军上将，并从海军上将丘尔辛手里接过指挥黑海舰队的权力的。西索耶夫原先也是以海军中将衔在一九六六年起担任丘尔辛手下第一副司令的。

在分舰队司令员中，两次担任过里海分舰队司令（一九五五到一九五六年；一九六〇到一九六七年）的海军中将奥列伊尼克已在一九六七年调往莫斯科担任海军后勤部主任，里海分舰队司令之职就由原黑海舰队参谋长海军少将契尔诺巴伊接任了。

到了一九六九年年中时，苏联海军总参谋部成员也得到了一系列提升。北方舰队司令原海军上将洛鲍夫则晋升为海军元帅，从而突出了北方舰队的战略重要性。

一九六四年起担任莫斯科海军总参谋长的海军上将谢尔盖耶夫也被提升为海军元帅。通过这些提升，新兴的苏联海军就完全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下面的其他四个苏联军种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了。

苏联海军的战略任务是什么呢？

第一，保卫苏联的“心脏地带”和攻击敌人的“边缘地带”。第二，在敌人进攻时保卫四个舰队的安全，保证四个舰队的相互支援。第三，挡住在海上的美国核打击力量——美国的北极星/海神式核潜艇以及能发动核打击的攻击型航空母舰。第四，作为陆上武力在海洋上的延伸。

一位老资格的苏联元帅谈到海军的作用时用了这样扼要和说明问题的语句：“海军必须摧毁敌人的核潜艇和攻击敌人的航

空母舰，必须干扰敌人的航运，消灭和摧毁敌人的海军基地、海港、军舰抛锚处和海岸防御设施，然后由两栖部队登陆征服敌人的领土。”

### 基本理论是：“我们是在打仗”

俄国人不断地在世界各个海洋折磨美国海军。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我们是在打仗！”我们应从这个角度来估价和判断苏联海军的每一个行动。

俄国海军的素质又究竟如何呢？

当你看到俄国海军在指挥太平洋“红旗”舰队的海军上将面前接受检阅，看到俄国水兵穿着夏令白色制服在甲板上整齐地排列成队，战舰涂上漂亮的浅灰色，船的金属部分擦得闪亮时，这支海军确实是神气十足，素质再好不过的了。

但是，美国海军也看到过脏得出奇的苏联军舰，舰身生满了红锈，在蹩脚水手的操纵下，颠簸前进。这样的操纵状态在英美海军里是不允许的。这又是事物的另一面了。

尽管如此，现代苏联海军是训练有素、装备齐全的，并且不久就可以准备好打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日益逼近了。苏联海军构成了美国海军还从未面对过的最严重的威胁。

为了对付这个来自苏联的威胁，美国正在迅速推动三叉戟核潜艇的建造，这是一种比现在的海神式潜艇速度更快、噪音更少，并且大出一倍的潜艇。这种三叉戟武器系统具有毁灭性的潜在力量，可以最终用来保证和平。美国海军的战略核潜艇部门主任兼三叉戟计划的负责人海军少将罗伯特·考夫曼说：“我们已花了不少的时间和钱……我们造出的武器系统是不会很快

就被人制胜的。”但是第一艘一万六千吨载有二十四枚导弹的三叉戟潜艇要到一九七八年才可能下水。

另一个海军军官对任何“武器系统”能否医治美国海军的病症表示怀疑，他不同意海军少将考夫曼的估计。海军中校塞尔斯提出了社会道德日益败坏的问题。他特别提到他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新兵。他说：“我们尽管会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导弹、舰艇和飞机，但是操纵的人成问题的话，武器再好也不起作用。”

已退役的丹·加勒里和萨姆·埃利奥特·莫里森等海军将军们，曾写了一些书阐述强大的美国海军是如何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今天的美国海军必须熟读和钻研过去的光荣历史，从中吸取教益，否则它将遭覆灭的命运。

#### 附：苏联海上力量发展大事记

一九六一年，苏联战舰在挪威海进行了一些规模不太大的演习，而不象以往那样只是在北方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辖区之间不时来往。

一九六二年，黑海舰队的舰艇驶出黑海，进入辽阔的大西洋，驶往寒冷的北冰洋，参加演习。

一九六三年，莫斯科海军总参谋部规定在大西洋东北角定期进行演习；一支分遣队围绕英国岛屿航行。

一九六四年，一支小分遣队驶入地中海呆了好几个月（在此之前，地中海是美国第六舰队的“内湖”）。苏联战舰是由黑海舰队派往地中海的。苏联舰艇又开始访问古巴了。

一九六五年，又一次进行地中海“渗透”演习，参加的舰艇更多，时间更长。开始故意对第六舰队进行骚扰。原因：“对美国的阶级战争已有了一些成就。”



一九六六年，苏联军舰第一次在冰岛-法罗群岛之间进行基本训练的演习。

一九六七年，苏联的地中海分遣队变成了常驻舰队。自中东“六天战争”之后，苏联战舰驶入亚历山大港；研究船开始在印度洋进行勘测。

一九六八年，一支苏联海军分遣队在印度洋出现。

一九六九年，戈尔什科夫的海军加速了对付美国人的步伐。苏联“地中海”舰队经常在数量上超过美国第六舰队。

一九七〇年，为纪念列宁诞生一百周年而进行的世界性“海洋大演习”，大为强调了苏联海军力量的远洋作战能力。

一九七一年，苏联海军力量继续增强，加强了苏联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大放厥词的份量。他说：“我们光荣的海军旗帜现在已在世界各海洋的遥远角落飘扬了。”

一九七二年，苏联海军舰队为埃及和叙利亚输送大量战争物资，为一九七三年对以色列发动“赎罪日战争”作好准备。灾难性的“六天战争”中损失的坦克、大炮、军舰和飞机全部得到补给。苏联总参谋长扎哈罗夫访问埃及进行视察。苏联军舰大批出没于阿拉伯海。

一九七三年，中东爆发“赎罪日战争”。此时，戈尔什科夫已把他的地中海舰队扩大为九十多艘各种类型的舰艇，而第六舰队则仅有六十多艘舰艇。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八月号美国《武装部队杂志》

张仲礼译）

# 苏联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 对海军力量的看法

〔英〕P·H·维戈

一九七二年二月起，苏联海军总司令、海军元帅谢·格·戈尔什科夫在《海军手册》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内容相当广泛的文章，总题目是“战争与平时时期的海军”。读完最后一篇文章，给人的基本印象是：保持强大的舰队，对一个国家来说，事关重大。为了使人造成这种印象，戈尔什科夫求助于七世纪俄罗斯海军和十八世纪英国海军，用几个世纪前的事例来说明海军在和平时期的活动和战争时期的勇敢给国家带来的好处。同样，他也从反面的事例中加以论证，说明那些忽视舰队的国家都要因此而遭受损失。无论是议论封建时代还是今天的核装备海军，无论是议论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海洋作为连接殖民地的通道还是把海洋作为猎取原料的潜在对象，他都是使劲地把一个不变的音调吹进读者的耳鼓：那些具有强大海军的国家都是富强的，那些忽视海军的国家注定要衰亡。

## 海军在和平与战争时期的效用

按照戈尔什科夫的看法，海军具有内在的良好机动性。它能够秘密地集中舰队，在敌人想象不到的地方集中大量的武力。它比地面部队能更好地顶住核袭击。战时，在保卫本国海上交通、

打击敌人的海上交通以及入侵敌人的领土方面，它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此外，直至最近，只有海军才能保卫本国边疆以外的据点，从而防止敌军入侵本国所引起的震动。在和平时期，海军同样是宝贵的。它能通过礼节性访问和“炫耀军威”来赢得朋友和影响别人（戈尔什科夫专用几段文章发挥这一论点，说明他认为这一点是重要的）。而且，在现代世界上，海洋构成了食品和原料的重要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来源还要变得重要得多。苏联既拥有一支巨大的“产业”船队，也拥有一支商船队来开发这些资源。戈尔什科夫说，这些都是海军力量重要性的基本因素，它们需要保护，而海军的任务就是在和平和战争时期为它们提供保护。

通过威胁别的国家而又不引起战争，却能达到自己国家的政治目的，这是海军在和平时期所具有的另一个宝贵特点。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用大量篇幅专门发挥这一论点。他援引了英、美海军史上很多事例来证明这一论点，说明这些国家如何在和平时期利用它们的海军在世界各地建立和保持它们的霸权。在“帝国主义者”运用海军力量的现代事例中，他援引了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危机以及英国海军在镇压安哥拉和波斯湾岛屿的民族解放运动时所扮演的角色。

因此，毫不足奇，我们发现这位海军元帅是花了大量气力在说明：帝俄的强大和苏维埃俄罗斯的更加强大大只是由于它们具有强大的舰队。相反，凡是舰队受到忽视的时候，敌人就可以任意入侵。戈尔什科夫列举了一连串有关发生这种情况的动人事例。他指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海军的优越地位使得它们能把战争随意地延伸到俄罗斯沿海各地。又如在日俄战争时，远东俄罗斯舰队的失败是俄国战败的主要原因，它使日本能自由地向满洲输送军队，在它喜欢的任何地点和时间用船只登陆。



在苏维埃时期，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一九一八年夏，黑海舰队根据列宁的命令自行凿沉以防止落到德国人的手里，因而那个地区的苏联海岸事实上没有防卫了，使帝国主义海军得以充分利用这种形势。戈尔什科夫说，请注意，只有在没有海军来对抗它们的时候，它们才成功地在苏联领土上登陆。在有苏联海军的地方，例如波罗的海，帝国主义的军队从来不能上岸。

但是，戈尔什科夫不单是依靠历史的事例来论证海军的价值。我们已经举了他援引的战后时期的事例来证明美国海军所起的作用，它加强了美国在今天世界上的影响，使美国的观点在远离它海岸的地方都得到尊重。例如，倘若没有海军的话，美国人在黎巴嫩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登陆是不可能的。而且，美国还把它的海军基地偷偷地推进到距离苏联更近的地方（例如它在希腊的基地），正在设法改进它的海军战略地位，从而增加它对苏联安全的威胁。

### 制海权——作战的目的

假定戈尔什科夫已经使听众信服了，即一个强大的海军是必不可少的，那末，海军在战争时期应该追求什么目的呢？在和平时期应该追求什么目的呢？据这位海军元帅所说，战争时期所追求的目的肯定应该包括毁灭敌人的人力、船只和设备。他说，正象这些历来是海军作战的根本目的一样，现在它仍然是海军作战的根本目的。

要很好地完成上述目的，就需要赢得制海权，并在赢得以后保持制海权，或者至少不让敌人享有制海权。当然，这里所讲的制海权有一种苏联人特有的理解，象戈尔什科夫在文章里引用贝利的话那样，就是说，这里意味着“在某一战场，或者那个战场

的一部分制海权”。换言之，他并不要求在全世界所有海面上享有制海权，象英国皇家海军在它海上力量鼎盛时代所享有的那样。因此，如果我们试图分析戈尔什科夫所认为苏联海军要赢得的目标，很清楚，战时的主要目标之一必须是在它有作战兴趣的那些海域上的制海权，或者至少不让敌人享有制海权。戈尔什科夫说，在和平时期，海军所追求的目的是在一切地方具有保护苏联国家利益的能力。这里强烈地隐含着包括苏联海军享有进入各个特殊海域的权利以及开发各个特殊海域和海底的权利。

任何海军在和平时期所要追求的目的必须为战争作准备。俄国人说，这在今天特别显得重要，因为突然袭击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因素。引用戈尔什科夫自己的话说，“在现代海战中，这句古老的名言‘争取发第一炮’取得了特殊重要意义。”因此，可以假定苏联海军所要追求的目的之一是能发射第一炮。所谓第一炮，好象不只限于潜艇核导弹，似乎还包括那些对资本主义国家海军部队所发射的对地导弹，特别在地中海地区是如此。

最后，地中海从过去到现在一向对苏联的防卫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此，俄国的主要目标必须是支配地中海，至少是地中海的东端（在这里，戈尔什科夫关于塞浦路斯的巨大战略价值的话具有特别重要意义）。戈尔什科夫告诉我们，甚至在帝俄时代，地中海就是重要的，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它对苏联已经变得更是绝对重要。美国人把他们的地中海基地设在距离苏联领土越来越远的地方，这在戈尔什科夫看来是不能忽视的。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上的其他海和洋都没有象这样紧迫地被描绘在戈尔什科夫的文章里，也没有专门花上这样多的篇幅。因此，可以合理地推论，至少对戈尔什科夫来说，从今天苏联海军战略的角度来看，地中海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海域。

## 进攻战略的需要

戈尔什科夫所提出的战时战略的根本特点是，它必须是进攻性的。他在好几个地方强调海战采取攻势的压倒一切的价值，甚至在具体情况迫使俄国海军采取守势战略的时候，他也说，极端重要的是，战术的使用应该采取攻势。

总的来说，戈尔什科夫坚持战略必须是进攻性的。他用很大的篇幅说明，苏联不能在自己的沿海海域内实行进攻性的海军战略。因此，如果苏联海军执行攻势战略就必须到公海上去，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坚持俄国必须这样做。因此，苏联必须具备到公海上去的舰队，而且这个舰队必须庞大到能大批地同敌军作战，因为苏联的海军理论要求必须用大批船舰打击敌人。

这个到公海上去的海军必须庞大到能够大批的进行打击的地步(当然也要同任何可能的敌军力量大小相称)。但是俄国地理的同样特点还要求具备更庞大的舰队。苏联的四个海军舰队区相互距离很远，在彼此的联系上受到地理的阻碍很不方便。事实上，如果戈尔什科夫的引人注目的苏联海军政策得到恰当地执行的话，苏联必须保持四支独立的海军。

## 需要一支力量配备齐全的舰队

已经明确了苏联有必要具备一支海军，而且是庞大的海军，下一步必须问，苏联海军应包括那些具体种类的舰只。很明显，它们必须满足以上各段所概述的目的和战略上的要求。因此，当人们注意到要求是这么多、它们的活动范围又是这么广时，对戈尔什科夫关于具备种类齐全的舰只的要求，就不会产生怀疑



了。进一步研究这些文章，使我们看出，他要求的是些什么呢？他要潜艇，要飞机，要导弹，要突击舰，要各种可以想象到的水面船只。但他不仅要各种的船只，他还要求组成正确的“搭配”。换言之，他真正要求的是一支力量配备齐全的舰队，照他自己的定义指的是，要有一个“最合理的搭配所必不可少的和数量充足的力量”。他对这一点是极端强调的。甚至那些他一再强调其价值的舰只，例如潜艇，他认为，也只能在同其他种类的舰只密切配合下才能充分发挥它们的潜力。他极大地一再地强调潜艇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破坏敌人海上交通的价值，他还宣称自己是一个认为潜艇能在敌人的袭击下保持生存的热烈的主张者。在一段给人印象很深的话里，他向读者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总的来讲有近六百万人从事于反潜战，但潜艇攻势仍然能一直进行到战争的最后。

尽管如此，戈尔什科夫坚持说，要使潜艇攻势对破坏敌人的海运取得确实成功的机会，就必须有海军的其他武装的支持。他认为，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潜艇作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海军没有为它提供其他武装的支持。这一考虑指明了需要有一支力量配备齐全的舰队。没有水面船只和飞机的支持，潜艇就不能很好的活动，正如没有空中优势，船只不可能登陆，飞机单独作战也不能取得决定性成果一样。由于飞机和潜艇的建造在苏联海军的传统上有优先权，戈尔什科夫的观点是做了一点扭转以前情况的平衡工作。此外，他还认为苏联海军不仅要有足够的水面船只，而且要有足够的各种各样的水面船只，因为水面船只担负着各种不同的任务。戈尔什科夫著作的一个重要论点是，船只必须根据它们承担的任务来建造。他说，有些国家通过建造一种万能的船只来实现节约，但是，却没有成功。

水面船只对于帮助登陆也是极端重要的，这也是戈尔什科

夫一系列文章中占主要地位的一个论点。例如，他骄傲地注意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成功地进行了一百一十多次这样的活动，每次平均有二十五万人。象他在别处告诉我们的，尤其了不起的是，苏维埃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前，完全没有为登陆目的而建造的船只和突击登陆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没有建造过。

这样，再一次意味着为苏联海军服务的水面船只（不仅是专门为运载军队所需要的船只，还要有足够数量的护航舰）的数目将成为问题，因为每一个海军舰队区都必须有能力执行这种活动。因此，我们又回到平衡的问题，而这种平衡显然是规模十分宏大的。

但苏联能够在海洋上自由活动的大型水面舰艇（也就是戈尔什科夫内心最爱慕的水面舰艇），其数量确实不是那么多。据西方估计苏联拥有大型水面舰艇约二百三十一艘，乍听起来，好象是很多的，但是，必须记住，它们要分配在四个海军舰队区。这样，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海军力量相比就处于不利的地位。戈尔什科夫企图通过他写的文章引起苏联的统治者们对水面舰艇情况的注意，这可能就是他发表一系列文章的主要目的。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三月英国《英国皇家联合防务》杂志 王涵清译）

## 美国海军能胜任全球的任务吗？

〔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编辑部

### 美国海军貌似强大，但分得太散

美国海军经历了“马亚克斯”号危机之后，心情是复杂的。

首先，海军感到非常自傲，在同海军陆战队和空军一起救回美国商船及其船员的行动中，它出了一把力。

其次，海军却很担心，这出戏给人的印象是，美国海军是能够随意支配海洋的。

事实是，美国海军对它自己的力量是忧心忡忡，特别担心的是，在更大的紧急事件中，它的分得很散的舰队要多久才能把力量集中起来啊！

### 时间因素

即使在五月中旬这次规模尚小的行动中，正在澳大利亚和菲律宾之间的海面上巡弋的以“珊瑚海”号航空母舰为主的特遣舰队，要花两天的时间才赶到出事地点。

在以航空母舰为主的特遣舰队到达之前，先到达该处的“霍尔特”号护航驱逐舰没有敢贸然采取行动。

这就证实了越南战争结束后海军领导人一直在阐述的一点：美国海军貌似强大，但要在世界上到处巡逻以保卫美国的



利益和履行它承担的义务,力量是不够的。

海军头头们警告说,美国海军实际上只能应付一个大洋的需要。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詹姆斯·霍洛韦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说,如果远东和欧洲同时发生危机,美国海军就只能顾一头,只能保卫一个地区的航道。

随着美国正在不断从外国的基地上被赶走,美国海军在和平时期的负担甚至将愈来愈重。如果泰国、西班牙、菲律宾和土耳其迫使美军撤出它们的领土,可以预期海军必须在这些地区承受更大的负担。

目前的情况是:

舰艇是主要的问题。六年来,美国军舰数目已从九百七十六艘减为不到五百艘,是一九三九年以来的最低点。这比海军认为要在两个大洋保持有效的存在所必需的最低数字还少一百艘。

用来突出美国海外力量的关键舰艇——航空母舰,预期到六月底时将从十五艘减为十三艘。而两栖攻击舰的数目已从一九六八年的一百五十七艘减为六十六艘。在同期内,驱逐舰和护卫舰的数目已从二百四十艘减为九十艘。

现在已在进行中的重建计划,要完成它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根据法律规定,新战舰必须由私营造船厂承建,但是,这些造船厂却愈来愈倾向于承建更赚钱的商船了。

结果是,军舰的建造基本上集中在三个造船厂里,而这几个造船厂却缺少大约七千多个技工。由于这个以及其他的原因,军舰是极难得及时交货的,有的延期交货达四十四个月之久。

盟军的舰队也并不能抵补美国海军力量的不足。盟国的海军在欧洲水域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这些国家缺少远程补给船,不能远距离作战。

结果是，五角大楼的老资格海军将军们甚至担心，美国海军是否有能力控制世界上那些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水上通道咽喉，更不用说想控制辽阔的海洋了。

### 重要的“阻塞点”

具体地来说，这些海军将军们认为，美国想在非常时期控制十个左右对防务和国际航运至关重要的“阻塞点”，也是有困难的。

这些通道咽喉包括通向东印度群岛的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对马海峡，进入红海和苏伊士运河的入口处的亚丁，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从波罗的海到北海的出口处，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及冰岛两边俄国可以从北方进入大西洋的海洋通道。

甚至巴拿马运河也不能列为安全地带。这些海军领导人说，以古巴为基地的苏联潜水艇可以威胁到这些西方通道的安全。

要扭转这种局面，海军要求加速推行造船计划。

### 目标：六百艘舰艇

今年早些时候，众议院海上力量小组委员会同意了海军的看法。这个小组委员会建议美国要推动一项三百二十五亿美元的计划，在五年内修建一百七十九艘快速现代化舰艇，其中包括一百十五艘作战舰艇。小组委员会也同意要让海军船坞从单纯修船转为也建造新船。目标是要有一支以航空母舰为主的六百艘舰艇的海军。

小组委员会建议再修建两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作为最近编

入现役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的姊妹船。这些航空母舰造价都在十二亿美元以上。它们建成后，就可以使海军有四艘能以时速三十哩无限期地在世界海洋上巡弋的核舰艇。

小组委员会也批准修建六艘“攻击型巡洋舰”，这种巡洋舰能在没有护卫舰随同的情况下在远洋作战。

这些巡洋舰还在初期设计阶段，它们将载有许多攻击用和空防用的导弹。按照计划，它们的水面对水面导弹将能在几百哩之外击中敌舰，而且这种导弹也将能用来击中几百哩之外的陆上目标。每只船将载有它自己的直升飞机，并且还将装有反潜设备。总造价按照目前的估计约为每艘七亿五千万美元。

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些建议的。抱怀疑态度的众议员们认为，海军拥有其他造价不象航空母舰和其他结构复杂的舰艇那样昂贵的船只也能过得去。一个重大的争论问题是，作战舰艇应该用核动力，还是用内燃机。

### 危言耸听的做法受到指责

批评海军的人认为，海军头头们在宣扬他们自己的软弱地位和俄国的实力地位时是用了“大喊狼来了”的做法。这只是为了要吓唬国会，促使国会拨发更多的款项去造船。

按照这些分析家的看法，目前的造船计划就将大为改善舰队的质量，将使水面船只的平均舰龄从现在的十三年半减为一九八〇年的不到十年。一九八〇年时还将有十多艘新的核潜艇编入现役，这样就将加强水下的力量。

有的分析家还认为许多人把苏联的全球海上力量说过头了。他们指出苏联仅有两艘作战航空母舰，苏联的力量主要是集中在潜水艇和导弹舰艇方面。



美国海军军官就这一问题回答说，苏美海军结构不同是由于两者的使命完全不同。

拥有二百二十一艘水上作战舰艇和二百三十五艘攻击型导弹潜艇的苏联海军，其使命是要保护莫斯科的巨大欧亚领地的两翼以及截断西方工业国的海上航道。

美国海军拥有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一百六十四艘水上作战舰艇和包括四十一艘弹道导弹潜艇在内的一百十九艘潜水艇，使命是要使战火不致弥漫到美国海岸去，要突出美国的海外力量和保护海上的通道。

美国海军将军们说，这就是为什么海军需要更多的船。他们还相信，扩大海军的关键就在于要有一批新的航空母舰。

### 赞成航空母舰的理由

三位地位高的司令员——海军上将霍洛韦，海军作战部副部长、海军中将比尔·豪泽和海军的系统分析部门负责人、海军少将斯塔塞·霍尔库姆——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说：

随着美国海外基地的不断丧失，航空母舰就变得特别重要了。海军将军们坚信，大型航空母舰是迄今为止修建出来的最不易遭受袭击的船——它能躲开各种导弹和水雷的袭击，它的航行速度也使陆上发射的导弹不能打中它。

他们断言，在导弹时代，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基本上就是“可以多次重复使用的导弹”，可以用来攻击许许多多敌方目标。

国会是否会接受这些理由，从而投票赞成拨款修建更多的新式航空母舰，这还有待于今年晚些时候才能决定。

（译自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六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李中长译）

## 小资料

### 苏、美等国海军实力比较

	苏	美	英	法	日
兵力(千人)①	475	551	78	69	38
现役舰艇(只)②					
攻击型航空母舰	—	15	1	2	—
直升飞机航空母舰	5	—	—	—	—
核动力弹道导弹潜水艇	33	41	4	4	—
核动力攻击型潜水艇	15	59	—	1	—
核动力飞航式导弹潜水艇	39	—	—	—	—
常规弹道导弹潜水艇	23	12	—	—	—
常规飞航式导弹潜水艇	28	—	—	—	—
其他潜水艇	259	5	33	19	14
巡洋舰	32	7	11	2	—
驱逐舰	103	99	6	22	29
护航舰	111	31	73	27	16
护卫舰	—	66	—	—	—
小型护卫舰	193	—	—	25	20
扫雷舰	311	34	46	62	36
两栖登陆艇	163	63	54	33	58
总吨位(万吨)③	180	400	50		

① 摘自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军事力量对比,1974—1975》。

② 根据英国《简氏战舰年鉴,1974—1975》资料整理,比较不重要的舰艇未列入。

③ 摘自法国海洋和海外出版公司:《战舰年鉴,1974》前言部分。日本第四次防卫计划(1972—1976)完成时,总吨位将为21.4万吨。

(淮海整理)

# 中途岛之战

〔英〕亨利·莫尔

奇袭珍珠港以后，山本大将决定毫不迟延地摧毁美国的航空母舰舰队。

首先，他得引诱美国人出战，而进攻位于珍珠港西北一千一百三十六英里的美军中途岛基地，将能实现这一设想。美国已把由沙岛和东岛组成的中途岛，扩建为对保卫珍珠港起重要作用的海军巡逻机前进基地。如果没有它作为前方观察哨所，那末，珍珠港将无法固守，太平洋也会随之而沦入日军之手。

日军把进攻中途岛的决定性日子定为N日。但实际上，作战行动将于N日的前三天开始。到时候，日军将从海上向阿留申群岛（它象一片残缺不齐的月牙，从阿拉斯加伸展到北太平洋）发动牵制性攻击，美国人必定会派军舰前去侦查，于是，南云的主力舰队就从西北进攻中途岛。在N日那天，入侵部队将在近藤宣武将军的第二舰队的炮火掩护下，从四面八方涌上该岛。山本的战列舰队将泊在后面三百英里的洋面上，一等到美国舰队接近，即开入战域采取行动。随后，那些强大的战列舰上震天动地的舷侧炮火，将实现这次作战行动的主要目的。在这些战列舰中，山本的旗舰是六万四千吨的大和舰，它既是世界上吨位最大、也是火力最强的战列舰。

日本人虽然还没有雷达，但他们确信他们的潜艇屏幕和侦察机，能够发现美国舰队的接近。夏威夷和中途岛之间已布下



两道潜艇警戒线，其中一些潜艇携带着飞机燃料，为那些孤礁上的日本远程水上飞机加油。另一些远程潜艇带着袖珍子艇出航，通过对从悉尼到马达加斯加一带运输船舶和港口设施的袭击，进一步遮人耳目。

五月二十日，日本海军已在柱岛内海锚地集结待命。它拥有十一艘战列舰，二十二艘巡洋舰，八艘航空母舰，两艘水上飞机航空母舰，六十五艘驱逐舰和二十一艘潜艇，连同后勤船只在内，总计有两百多艘。而美国方面所能集结的仅有三艘航空母舰，三艘巡洋舰和十四艘驱逐舰。日本人认为胜利唾手可得，甚至对寄往中途岛的邮件也作了安排。

为了迷惑并包围美国舰队，庞大的日本舰队分成八支特遣舰队。其中两支被派往阿留申群岛东部的阿图岛和基斯卡岛担负佯攻任务，并在这两岛登陆；第三支舰队将沿着这一系列向阿拉斯加延伸的链状群岛进一步向东，前去摧毁荷兰港的小型美国基地。当日机开始轰炸荷兰港时，美国舰队就将仓促北上，而这时，部署在这一带北方海域的主要特遣舰队，即由大型战列舰和舰队航空母舰组成的第四特遣舰队，将向它们发动进攻。这支名为“阿留申支援力量”的第四特遣舰队，拥有四艘战列舰作为强劲可怕的核心力量。

进攻中途岛的地面部队也将同时向该岛进发。载运部队的运输舰，将由巡洋舰、驱逐舰和一支包括两艘战列舰在内的航程更远的强大舰队给予掩护。这三支称为“占领力量”的部队，由近藤中将指挥。

但是，以雷霆万钧之势对美国进行毁灭性打击的将是南云的舰队。它拥有携带作战飞机和富有经验的飞行员的四艘大型航空母舰。此外，还配有雾岛和榛名两艘战列舰，三艘巡洋舰和十一艘驱逐舰。同时，拥有陆奥、长门、大和三艘巨型战列舰的

强大火力的山本主力舰队,将使这支打击力量臻于完备。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部选定六月七日作为N日。那时的月光,将对夜间行动和登陆极为有利。预定在N日的前两天,当南云舰队仍在中途岛西北二百五十英里时,即发起大规模空袭,既要摧毁岛上的空军力量和防御工事,还将击沉所有附近的美国战舰。N日的前一天,一支由藤田将军率领的小型水上飞机供应部队,准备在中途岛西北六十英里的库雷小岛上降落,建立基地,一方面接应登陆部队,另一方面进行远程侦察,监视诱入圈套的美舰的来临。六月七日,天一亮,日本海军陆战队,将在栗田少将的重型巡洋舰支援大队的炮火掩护下,同时对沙岛和东岛发起猛攻,并强行登陆。在实施入侵的整个过程中,近藤中将的主要入侵舰队,将控制住中途岛以南和西南方向的进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部,指望美国人会被对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的同时进攻搞得晕头转向,以致在日军完成登陆来不及组织认真的抵抗。

山本的战列舰将守候在中途岛西北六百英里的洋面上,南云舰队则埋伏在中途岛以东三百英里处。高须四郎中将的由四艘战列舰、两艘轻型巡洋舰和十二艘驱逐舰组成的舰队,将泊在北面五百英里的洋面上;而在高须舰队以东三百英里的,则是角户觉二少将,他拥有隆伍、奋容两艘轻型航空母舰以及两艘重型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在整个作战海域周围,布有三道潜艇警戒线,敌舰逼近时将及早发出警报。

尽管日本人耍弄了诡计诈术,想迷惑美国人,但美国人对于这暗中进行的一切,却了解得一清二楚。在珍珠港,约瑟夫·J·小罗奇福特已破译了日本人的密码。在一系列发过太平洋的电报中,最引人注意的是“AF”两个字母,这一代号,显然表示着某一重大的军事行动。小罗奇福特的破译小组,发现在一份有



关两月前水上飞机袭击珍珠港一事的日方电报中，就曾提到过“AF”。电文说，水上飞机奉命到“AF”附近的一个珊瑚小岛上加油。据美方推测，“AF”只能是指中途岛。为了进一步核实，中途岛上的海军司令受命用浅显的英语拍发一份作为诱饵的无线电报，报告该岛淡水设备发生故障。不久以后，美军截获的一份日军密电果然声称：“AF”很可能缺少淡水。

尼米兹上将能够集结来保卫中途岛的部队实在是微乎其微，甚至连迎击庞大日本舰队的这种打算，也似乎是自取灭亡。他只有三艘航空母舰：远在南面所罗门群岛周围游弋的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以及在珊瑚海之战中被打坏的约克敦号。此外，只能再调集八艘巡洋舰和十四艘驱逐舰。同时，企业号的威廉·F·哈尔西中将于五月二十六日住院就医，这就使美国海军更增添一层忧虑。接替他的是一直指挥航空母舰护卫舰队中巡洋舰和驱逐舰的雷蒙德·A·斯普鲁恩斯海军少将。翌日，遭受重创的约克敦号摇摇晃晃地驶入珍珠港。经过日夜不停地努力抢修，终于在五月三十日又恢复了战斗力。

由于洞悉了日方的策划，美国人就能将计就计，设置陷阱。斯普鲁恩斯和弗莱彻两位将军（在约克敦号上）埋伏在中途岛东北两百英里的海面上。虽然尼米兹本人确信敌人的目标是中途岛，但别人却不相信这一点。因此，就将埋伏的位置选择在中途岛东北方。这样，航空母舰也可以转而保卫夏威夷或美国的西海岸。

与此同时，增援力量正火速派赴中途岛。两个B-17型“空中堡垒”远程轰炸机中队和四个改装后可作鱼雷攻击用的B-25型轰炸机中队，已在岛上着陆；整整一船的战斗机和俯冲轰炸机已运到岸上；高射炮正在源源调来。数百英里的刺铁丝、几万只沙袋和大量弹药从船上卸下，并立即运往正在加固的防御工事。



PT 鱼雷快艇部署在环礁湖内。若干中队的 B-17 型轰炸机也进驻珍珠港。

到这时候，美国破译人员，不仅查明了有多少日本战舰和部队驶向中途岛，而且知道参与这次行动的具体部队单位、各舰艇的舰长姓名、甚至它们的航线。美国人很幸运，因为日军刚启程驶往中途岛就更换了另一套密码。

六月二日拂晓，各支日本特遣舰队分别在远离锚地的太平洋上进入了指定位置。就在这时，巨型战列舰大和号的无线电报务员，截获了一份从美国远程潜艇上发出的冗长、而且显然是相当紧急的电报。这艘潜艇已发现了正在向前行驶的兵员运输舰和它的护航舰。日本人虽无法破译电文，但它显然是发往中途岛的，这表明美国人正在准备应付着一场进攻。

这消息并没有使日军司令官感到不安，相反，使他们更加感到高兴。他们深信美国人的反应，必定是从珍珠港派出舰队，从而导致不可避免的毁灭，这无疑正是他们进攻中途岛的主要目的。

守候在中途岛北面的南云，并不知道美国潜艇发往该岛的警报，而且能见度极差，使他不能派出弹着观察机。尽管大雾和阴晦的天色有效地遮蔽了他的舰队，使可能接近的任何敌舰（未必就有敌舰）无法发现，但他自己也成了睁眼瞎子。

三日黎明，迷雾更浓。甚至探照灯也几乎不能穿透周围的一片昏暗。由于有相互碰撞的危险，南云不得不动用一直保持沉默的无线电，向他的舰艇发布命令。

美国人打算用两支独立的舰队对庞大的日本舰队作战：由斯普鲁恩斯将军指挥的第十六特遣舰队，拥有大黄蜂号和企业号航空母舰以及五艘重型巡洋舰、一艘轻型巡洋舰和九艘驱逐舰；由弗莱彻将军指挥的第十七特遣舰队，拥有约克敦号航空

母舰以及两艘重型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前者于五月二十八日驶离珍珠港；后者于五月三十日出航。两支舰队奉命于六月三日同舰队油船会合加油，然后由弗莱彻将军指挥在中途岛东北海面列阵，准备在那里伏击南云的航空母舰，因为给南云的命令，美国人已了如指掌。而山本这时所得到的消息却是：敌方幸存的航空母舰，肯定还远在所罗门群岛。

三日晨，庞大的日本舰队在雨幕的掩蔽下，开始进入攻击位置。北上掩护阿留申群岛登陆的高须的警戒舰队，预定在六日进入基斯卡岛五百英里以内的海面。那时，山本主力将在高须南面五百英里处。这样，如果敌人在两个海域中的任何一个海域发起反击，两支部队就能迅速汇合起来。然而，高须舰队向北行驶还不到三十分钟，山本就不得不改变计划。他得到消息，全速驶向中途岛的日本运输舰队正受到空中监视，看来，美国人已料到日军的进犯，因而不得不考虑中途岛敌轰炸机先发制人的攻击。

不久，九架“空中堡垒”出现了，但是，它们的炸弹却白白地丢在大洋里，日军的运输舰和护航舰依然完好无损地向前行进。次日清晨，一小队掠海飞行的鱼雷轰炸机又全力紧逼袭击，但也只有一枚鱼雷奏效，击中护航舰队后尾的油船。尽管如此，山本还是忧虑不安。他原指望南云的俯冲轰炸机，甚至在敌人尚未怀疑有入侵舰队逼近前，就能轰炸中途岛和岛上的机场。

与此同时，六月三日，在天亮前几小时，进攻荷兰港的命令就已下达。寒气彻骨，气温在零下七度，海上阴云密布。日军轰炸机和护航机开始起飞，朝阿留申群岛的美军基地作一百八十英里的飞行。它们返回时报告说：找不到轰炸目标，但发现岛上确实设有空军基地。四架日本水上侦察机冒着最恶劣的气候条件前去探查敌方海岸，结果，遭到美野猫式战斗机的猛烈攻击，



两架被击落。

南面,在南云舰队中,群情激昂。那一天上午十时,迷雾消散,海天明朗,前进航路光明灿烂。舰队以最高航速破浪前进,划破了平静海面,蔚蓝色的海洋上掀起层层白浪,灰色钢铁战舰编成一支巨大的环形队列,炮管林立的战列舰榛名和雾岛气势巍然,四艘大型航空母舰威风凛凛地航行在队列中央。次日黎明,进攻时刻骤然来临。

当黎明最初的一抹淡晕出现在海天之际的时候,赤城、加贺、飞龙和苍龙四舰上的泛光灯突然打开,照亮了宽敞的飞行甲板。十五分钟内,一百零八架飞机(俯冲轰炸机、水平轰炸机和零式战斗机各三十六架)从航空母舰甲板上飞起,以壮观的环形队列轰鸣着绕舰一周,然后向东南方疾飞而去。飞机在霞光映红的天空中逐渐远去,最后只留下微弱的嗡嗡声。这时,第二批突击飞机又开始上升到飞行甲板。当飞行甲板再次停满飞机时,初升的红日,活象耀武扬威的日本国旗,已完全跃出海面。这次,日本人希望能有一些敌舰和海岸设施作为攻击目标。鱼雷轰炸机的飞行员是日本航空兵的精华,尽管所有日军司令官都确信,在附近各地根本没有美国的航空母舰,但南云为了防止万一,还是把他的最优秀飞行员保留下来,以便发动第二次攻势。

但是,中途岛的美国人已有所准备,正严阵以待南云的第一批突击飞机。当日军最前面的飞行中队逼近时,一支由二十六架野猫式战斗机组成的机队,已在中途岛上空振翼高飞。敌机离该岛还有三十英里时,一颗明亮夺目的照明弹,突然在它们正后方上空开花,这是由一架卡塔利纳机上的飞行员们发射的,他们一直勇敢地尾随监视着进攻的敌机。几分钟后,日本护航机队在美国战斗机还来不及冲入轰炸机群时,就和它们干上了,于是空中尽是飞机,俯冲、跃升、相互紧咬追逐。日本第一流的零式



机驾驶员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甚至没有让野猫式战斗机击落一架轰炸机，然而，日本轰炸机在中途岛所能找到的轰炸目标，只是几条空旷的飞行跑道和几个空飞机库，所有飞机都已飞入高空了。

好多架野猫式机被击落，其余的也几乎都被击伤，而进攻的日机只有六架没有返回母舰。不过日本人想要摧毁岛上美国轰炸机这一目的却未能得逞。他们将不得不发起再一次攻击。在航空母舰上已开始作起飞准备的第二批袭击飞机，如果再飞抵中途岛上空，那末，躲过了第一批飞机的美国轰炸机，这时就将被迫着陆而尽遭毁灭。

第一批突击飞机飞离中途岛后，为前进中的航空母舰舰队担任巡逻警戒的零式战斗机，正徒劳地追逐着一直在监视它们行动的卡塔利纳机。尽管这些美国水上飞机还不够灵活，但它们一面在云中穿行出没，一面又不断报告活动情况，把零式机搞得疯狂暴躁，疲惫不堪。

突然间，美国鱼雷轰炸机在空中出现。信号旗从日舰桅杆顶上升起，报警声响彻海空，零式战斗机进入战斗。几秒钟内，三架美国轰炸机中弹坠落大海，第四架脱身逃走。

几分钟后，十架美国复仇者和B-26型鱼雷轰炸机在右舷出现，日本战列舰重炮齐吼，高射炮的迅猛炮火震耳欲聋。美国轰炸机列成单行，穿过炮火，劈开被灼热弹片烤得发烫的空气，继续前进，朝着赤城舰扑来。有三架被零式机击中起火，但其余七架继续向日航空母舰紧逼，越飞越近。它们轮流丢下鱼雷，又跃上高空。其中一架轰炸机几乎从赤城舰舰面擦过，然后突然起火焚毁。

尽管六架复仇者鱼雷轰炸机和四架经特殊改装后可携鱼雷的B-26轰炸机的全体飞行员，在设有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出生

入死，舍身捐躯，但他们的光荣使命还是没有完成。只有一架复仇者和两架 B-26 返回中途岛。

南云充分意识到，这些美机的进攻险些儿取得成功。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岛上的轰炸机全部消灭干净！他命令第二批进攻飞机要用高爆炸弹重新装备。赤城舰和加贺舰上的飞行员和军械士，开始紧急地从原准备进攻敌舰的飞机上卸下鱼雷。飞机急速降到飞行甲板下面的装备甲板上，为执行新任务而准备弹药。正当这项工作还在加紧进行的时候，尖厉的空袭警报声再一次响遍整个舰队！十四架“空中堡垒”在两万英尺的高空，象嗡嗡叫的飞蛾一样，银光闪闪地由东南方飞来。它们扔下炸弹，但等海水平息后，日航空母舰仍安然无恙地向前航行。日战斗机并不想去追击那些多炮位的巨型“空中堡垒”，所有美机也都平安返回中途岛。

南云懂得，在空中飞行的十八架零式机应给以增援。他命令，原打算用来掩护第二批轰炸机的三十六架战斗机全部起飞。它们刚刚升到作战高度，就发现了又一队美机。这次，十六架毁灭者俯冲轰炸机以零乱的队形在空中散开飞行，它的高度不足以进行俯冲轰炸；而要作鱼雷攻击，又嫌过高。在这场生死格斗中，这些行将过时的飞机，由毫无俯冲轰炸经验的海军航空兵驾驶，本来就不能指望会有很多架保存下来。当零式机居高临下猛扑过去时，它们便一架接一架地相继爆炸。然而，也有少数几架逼近飞龙舰并投下了炸弹。其中八架设法回到了中途岛，但也已弹痕累累，遍体鳞伤。它们并没有给日舰造成多大损伤；南云对此感到放心。中途岛的轰炸机对他的舰只并没有多大危险，更何况他的第二批攻击飞机一定会把它们摧毁掉。它们根本不象那些从航空母舰起飞的作战飞机那样具有威胁性，后者是由受过攻击舰艇训练的飞行员驾驶的。



当由中途岛返航的日本第一批袭击飞机在归途之中，日本的护卫巡洋舰利根号的一架远程侦察机的飞行人员，发现了令人吃惊的情况。就在他们完成了三百英里的弧形搜索而准备返航时，发现有十艘战舰正向东南前进。稍后不久，南云接到了报告，他立即大为惊恐。航图室迅速计算的结果表明，敌舰离他们只有两百英里。不管海军最高司令部考虑得如何仔细周密，如果报告中的那十艘战舰中还有航空母舰，那末，南云的四艘大型航空母舰，此刻就处于岌岌可危的可怕境地。若是美国人要想设置埋伏，那末，上述战舰的位置是再有利不过的了。赤城、加贺两艘母舰上的第二批袭击飞机，即鱼雷轰炸机几乎全都在装备甲板上正重新装上高爆炸弹，以便进一步攻击岛上的地面目标。南云下令：立即停止攻击飞机的重新装弹；相反，必须刻不容缓地全速准备袭击敌人的海上目标。接着，正当装弹手、军械士和飞行员在疯狂地用攻舰鱼雷再次装备飞机时，利根号上的侦察机送来了宽慰人心的消息。它报告说：“敌舰乃是五艘巡洋舰和五艘驱逐舰。”象这样一支美国舰队对于南云可以说并没有多大的威胁。于是，他最后还是下令，准备攻击陆地目标。装备甲板便再一次陷入了一片混乱。

令人宽慰的气氛，在南云的舰桥上刚好持续了二十一分钟，利根舰的侦察机发来的另一份电文，使他的不祥预感又全部复活：“随同上述敌舰前来的后卫舰只，似乎是一艘航空母舰”。正当南云幕僚中的乐天派提醒说，侦察机所报告的不过是“似乎”有一艘航空母舰，这时，又送来一份关于发现敌舰队中另外两艘很清楚是巡洋舰的报告。至此，不管情报机构怎么说，这位将军确信，具有这样一种规模的敌人舰队，必然至少有一艘航空母舰。于是，他下令立即对敌舰发起攻击。面临着如此明显的威胁，中途岛只得暂时丢开不管了。



事实上,南云所处的困境,也正是所有航空母舰司令官们最害怕发生的情况。他的第一批袭击飞机已完成攻击任务,需要立刻上船加油;第二批袭击飞机还未能起飞;而那些直接保护航空母舰免遭袭击的战斗机,燃料也将耗尽。这时候,他是不是应该把那部分仍在飞行甲板上等待重新装鱼雷的鱼雷轰炸机派出去,用装在弹架上的杀伤力较低的炸弹去攻击敌舰呢?如果这样做,就得在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出击,而南云刚刚还亲眼看到没有战斗机护航的轰炸机去攻击防卫森严的航空母舰会遭到怎样的一个下场,而这已经由他自己的零式机在他面前无情地揭示过了。

此刻,南云只有三十六架俯冲轰炸机,在飞龙和苍龙的甲板上准备就绪,等待起飞。这些用来和敌航空母舰相搏斗的飞机将没有战斗机护航,因此很容易遭受严重损失,至于能不能给敌舰以致命打击,却毫无把握。而第一批正在返航的攻击飞机又首先得在舰上降落。于是他决定:舰队应当北撤,直到所有飞机都装备好,加足油,能够对敌舰发起大规模的袭击为止。

飞行甲板已腾空出清,第一批袭击飞机在舰上降落,并且装足了致命的“长枪”攻舰鱼雷。时间紧迫,来不及把卸下的炸弹送到下面的弹药库,而是匆忙地把它们堆在一边。实际上,人们这样集中全力装备鱼雷的时候,恰恰是在安排他们自己的末日!

南云用信号把他的新计划下达给所有舰只,并通知了山本和近藤将军。这显然是出于自尊心,他并没有提到在交锋前,他将后撤以完成准备工作。

日舰正在采取一系列的紧急行动,而迫使它们这样做的美国舰队也沉浸在一片紧张期待的气氛中。斯普鲁恩斯将军由于不断获得跟踪监视敌人的卡特利纳机提供的准确情报,因而按兵不动,静待时机,直到日航空母舰处于最不利的情况,即处于

清理飞行甲板以接纳返回的飞机,并为它们加油、重装弹药的这样一种情况。当这一时刻来到时,他就派遣一支由一百三十一架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组成的强大机群,去袭击日本航空母舰。出击的时机,选择得再恰当不过了!由中途岛返回的最后一架日机在舰上降落后只不过几分钟,南云舰队侦察屏幕的最外围的舰只就报告说:美机正在逼近。

第一批出现的是十五架毁灭者鱼雷轰炸机。它们低低掠过海面朝右舷飞来。一群将近五十架的零式机向它们涌去,于是,这些过时的、没有战斗机护航的飞机就毫无生路了。当十五个小黑点中的最后一个,化为一缕烟火消失殆尽时,欣喜若狂的日本水兵再次喝采叫好。然而采声未绝,哨舰就接连送来了两份令人震惊的报告:“敌鱼雷轰炸机正从低空飞向右舷!”“敌鱼雷机逼近左舷!”但美轰炸机还是没有战斗机护航。两队鱼雷轰炸机各成单行,十四架飞向右舷,十二架飞向左舷。零式机轮番俯冲,行动缓慢费力的毁灭者轰炸机一架又一架地被猛烈密集的弹雨所击毁。而那些好不容易挨近敌舰的美轰炸机也被舰上的炮火打得粉碎。只有五架飞向右舷和两架飞向左舷的轰炸机,进入能向飞龙号有效发射鱼雷的区域,但是这艘航空母舰规避了泡沫飞溅的鱼雷航迹,所有鱼雷都从舰身外侧穿过,没有对它造成任何损伤。

激战的喧嚣声逐渐平息之后,可以看到,四十一架出击的鱼雷轰炸机只剩下了六架。它们设法摇摇摆摆地返回远处的美航空母舰。日机也回到航空母舰上加油,痛歼敌机的飞行员们正受到欢呼。这时,突然出现了更严重的威胁。“俯冲轰炸机!俯冲轰炸机!”一名日哨兵尖声叫喊起来。他发现由企业号和约克敦号起飞的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的前锋机群正在云端高飞。它们一直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悄悄逼近,也正好是在日航空母舰舰



队无法还手的恰当时刻来到。美飞行员朝下看到的情况是，浩浩荡荡的战舰编成了一个巨大的环形队列，在这护卫圈的当中，是四艘大型航空母舰。对于任何俯冲轰炸机来说，这都是一幅蔚为壮观的景象。更妙的是，在俯冲轰炸机的上方、周围，连一架日机也没有。日机都排列在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它们对于危险处境似乎一无所知。没有多久，三十七架俯冲轰炸机群从蔚蓝色的晴空直朝着赤城和加贺呼啸而下。约克敦号的十七架飞机也对准苍龙直冲下来，没有一架日本战斗机起飞迎击，高射炮直到最后一分钟才仓促开火，炮弹在离它们很远的地方零星开花。

在南云的旗舰、烜赫一时的赤城舰上，要战斗机起飞的命令刚刚下达，一道明亮夺目的闪光照得舰桥上的军官们眼花缭乱，一支往上高窜的水柱将他们掀翻在地。几乎同时，第二枚炸弹穿透舰桥外的飞行甲板，轰然一声爆炸开来，火舌乱窜，浓烟四起。在船体内的这第一次爆炸波及甲板上的飞机、燃料和随手卸在一边的炸弹，引起了第二次爆炸，这艘巨舰的很大一部分船体被炸得粉碎。一枚又一枚的炸弹，穿过甲板，在船体深处爆炸。几秒钟内，炽烈的火焰从舱内腾起，四面蔓延，吞没了甲板上的飞机。舰尾尽遭破坏，舰舵失灵。航空母舰东倒西歪，颠簸摇晃，燃烧的飞机沿着甲板落入沸腾的大海。南云本人呆若木鸡，他的幕僚只得恳求他离开这艘火光烛天、注定覆灭的废舰。

当赤城号在转眼即逝的六分钟内被炸毁的时候，企业号上另一个飞行中队袭击了加贺舰。这艘巨舰也差不多同样迅速地报废了：舰上油烟滚滚，舰身被烈火烤得发黑，内舱不断发生爆炸，舰体摇晃不已，舰上的飞机为漫天大火所吞没。与此同时，约克敦号上的俯冲轰炸机也猛扑苍龙舰，几分钟内，它就成了一座爆炸燃烧的地狱。



这三艘大型航空母舰覆灭的命运，全都无可挽回地注定了。几分钟前，它们还是那么威风凛凛，转瞬就变成豁裂残断、烈火熊熊的庞大残骸，逐渐沉入碧波粼粼的太平洋之中。

山本大将的打击舰队已遭到了灭顶之灾，但他本人却蒙在鼓里，还继续带领着他的主力舰队在后面四百五十英里的洋面上破浪前进。直到上午十时三十分，“赤城号着火”的电报才突然打断他追求荣耀的美梦。这位总司令一言不发。在一位日本海军大将的词汇里，是找不到应付这类事件的字句的，对二十分钟后送来的电报，他也同样无言以对。电文说：“由于遭到陆上基地和航空母舰上的飞机的攻击，加贺、苍龙和赤城三舰全都起火。我们正向北撤退，并重新组织力量。”这份电报暗示出，幸免于难的飞龙舰将进行反攻。

山本只有一件事情可做，那就是率领他手下的全部舰只继续前进，将巨大的炮口对准中途岛，对准任何胆敢拦路的美舰，狠狠地报复一下。虽然他的主力舰队现正被团团迷雾围住，但他还是率领舰队以二十节的速度冒险向前急驶。海面朦胧、晦暗，每一艘巨舰都被一层危险的黑幕团团裹住。他命令所有特遣舰队都和他的战列舰相汇合，准备对敌人发动猛袭。兵员运输舰队将在中途岛西面五百英里的海面上列队待命，准备入侵。被指定去实施入侵前炮击的巡洋舰队，也将出发，并于当晚炮击中途岛。同时，残存的飞龙舰将迅速出动作战飞机，直接对美航空母舰施以报复性的打击。

飞龙舰转身又投入战斗。当轰炸机和战斗机的飞行员听到下列训示时都大为吃惊：他们已是绝无仅有的一批飞行员了。日本国的尊严和荣誉，将完全有赖于他们的英雄气概和娴熟技能。几分钟前，他们的任务还是无忧无虑地参加摧毁残存的美舰的战斗，可是，一转眼，却要去同优势之敌决一死战，为已遭覆灭的

三艘姊妹舰雪耻。正午,由十八架 Val 式俯冲轰炸机组成的第一支进攻机队,在六架零式机的掩护下向约克敦号紧逼。在高空盘旋的十二架野猫式战斗机,居高临下,冲入日本机群,击落六架,但其余的日轰炸机迅速向下低飞,进行俯冲轰炸。虽然更多的飞机被高射炮火所击毁,但还是有三颗炸弹命中约克敦号。炸弹在巨舰船体内爆炸,舱内人员被炸死,设备遭破坏,发动机也失灵了。当残存的日机消失之后,洋面上又回复到一片沉寂、肃穆,留下十三架 Val 式机和三架零式机的残骸,以及一大滩又一大滩的油迹漂浮在周围海面上。冒烟的约克敦号,无可奈何地在太平洋上旋转打圈。

然而,埃利奥特·巴克马斯特舰长和船员们并没有屈服。这艘巨舰由警惕戒备的驱逐舰围绕护卫着,向前行驶,虽然缓慢、吃力,但还是有五节航速。由于轮机人员等奋不顾身地抢修,约克敦号的航速逐渐加快,最后足足恢复到十五节。巴克马斯特舰长升起一面新的巨幅星条旗,作为傲然不屈的标帜。但这面显示威武不屈精神的大旗刚刚飘扬不久,又有十架日本鱼雷轰炸机在六架零式机的护卫下,掠海飞来。这是从飞龙舰起飞的第二批突击飞机。巴克马斯特想方设法躲避了第一批连续袭来的鱼雷。接着发来的鱼雷,还是击中了这艘巨舰的右舷和中部,而另一批鱼雷则破坏了舰上的全部动力、照明和通讯设备。约克敦号剧烈地向左倾侧,缓缓摇晃着,听任风浪的摆布,势将成为日军再次攻击的目标。巴克马斯特尽可能坚持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发出弃船的命令。

为约克敦号复仇的行动已经开始。在这艘被击伤的航空母舰还未遭到致命打击之前,有一架侦察机由该舰起飞。它发现西面有日本的两艘战列舰、三艘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以及一艘由它们护卫着的最重要的舰只,即飞龙航空母舰。这一消息,通过



无线电传到了企业号以后，斯普鲁恩斯将军便集结所有能调集的飞机。三个俯冲轰炸机中队经过上次战斗后，正好还剩下二十四架飞机，它们轰鸣着飞离企业号；由大黄蜂号上起飞的俯冲轰炸机也一同出击。它们从午后的太阳内钻出，呼啸着向日航空母舰冲去，炸弹就落在舰旁，激起一柱柱水浪，最后，接连投下的三枚炸弹正好穿过飞行甲板，相继引起了轰然爆炸。正当飞龙舰上的全体船员疯狂地同满船烈火搏斗的时候，由中途岛高飞而来的“空中堡垒”，又出现在懒洋洋的天空中，发出威胁性的轰鸣声。重磅炸弹在飞龙舰近旁周围爆炸，冲起越来越多的水柱；接着，又有更多的“空中堡垒”从遥远的夏威夷飞来助战。现在已再没有留下什么零式机可以将它们逐走了。随后，当大黄蜂号的俯冲轰炸机再次找到飞龙舰的时候，这艘巨舰已被更多的炸弹炸中，从头到尾，都淹没在火海里。飞龙舰完了。

这时，虽然山本正率领他的火力猛烈的大型战列舰向海战现场逼近，但他不得不暗自承认，这次战役已告结束。他的四艘航空母舰归于毁灭，两艘美航空母舰还在与他的舰队对峙着，而中途岛又仍在鏖战之中，面对这种情况，山本作为一个极为精明干练的海战行家，心里很清楚，他必须承认失败的现实。他一度打算从角田舰队调两艘小型航空母舰来参加战斗，但是浓雾依然在阿留申群岛周围滞留不散，他知道，那些战舰到达中途岛至少得四天。要挽救这场已降临到日本帝国海军头上的灾难，已为时太晚了。

战列舰一旦遭到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的攻击，则连招架的余地也没有，这已为珍珠港事件以及英国威尔士亲王号和退敌号在马来亚洋面上覆灭的命运所证实。日作战飞机怎样对付敌人的战列舰，美作战飞机也就能怎样对付日本的战列舰。于是，山本向手下所有指挥官发出电令：“几乎已遭全军覆没的



敌舰正向东败退……”这个弥天大谎突出地显示了，他不敢公开承认失败的无限苦衷。

在目瞪口呆的南云接到这份电文时，大火熊熊的苍龙舰刚刚沉没，几分钟后，遭到重创、船身烧焦发黑的加贺舰也翻转倾覆，葬身海底。几小时后，赤城舰不得不加以凿沉；这是迄今为止第一艘被水兵们自行凿沉的日本帝国海军的战舰。最后，遭到美俯冲轰炸机袭击的飞龙舰，也终于被迫抛弃了。

对山本和他实力仍很雄厚的舰队来说，样样都不顺手，处处事与愿违。山本铤而走险，想作最后一次尝试，吸引神出鬼没的美国人进行夜战。对于这种类型的海战，日本人曾受过长期的专门训练，可以稳操胜券。但老谋深算的斯普鲁恩斯，却迅速率领他的小小舰队趁黑夜向东驶去，埋伏在战场外围，等待黎明的到来。事实上，甚至连山本下达的在夜间炮击中途岛的命令也没有执行，因为派去的四艘日重型巡洋舰不能及时到达。而它们又怕在白天遭遇到岛上基地轰炸机的凶猛攻击。结果又有两艘巡洋舰在黑暗中相撞，受到严重损伤，山本在这一天一夜内所遭受的大灾难，可说是达到了顶点。

六月五日凌晨二时五十五分，日军总司令痛苦地下令：“取消中途岛的占领行动”。他的一些将军们主张，宁可在没有任何空中掩护的情况下，出动整个舰队冒险攻击中途岛，也不作丢脸的撤退。他们问山本：“我们一败至此，该如何向天皇陛下请罪呢？”山本沮丧地回答说：“让我来办吧。我是唯一需向天皇陛下请罪的人。”

（摘译自一九七二年英国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一书 上海第一钢铁厂工人业余翻译组译）

## 格奥尔基斯库对 资源消耗问题的新看法

〔美〕《商业周刊》编辑部

**编者按：**格奥尔基斯库，在美国被人称为“能源经济学预言家”。他认为，以往的经济学说都不灵了，因为它们是以过时的“牛顿力学”为前提的；现在，应该轮到“熵”出场了。按照他的“熵”理论，“任何生物或经济活动的代价总是比表面的代价还要严峻得多——任何这样的活动实际上是要产生亏损的”，就是说，能量的消耗是一去不复返的。因此，他主张禁止武器的生产，禁止搞“绿色革命”，甚至禁止生产化肥，等等。正如本文作者所说，这不过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但是，格奥尔基斯库的谬论却也反映了当前资本主义世界能源危机的一些情况，也反映了资产阶级无法摆脱重重危机的一种绝望情绪。

“熵是宇宙间物质和能源最终的衰退状态。”——第三版《韦氏大辞典》。

“熵是宇宙走向死亡和混乱的总趋势。”——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新共和》。

熵一向几乎是一个使攻读自然科学的大学一年级生感到困惑不解的哲学概念。但是突然之间，由于能源危机促进了若干

一度繁荣的西方国家发生经济衰退，熵对寻找解决办法的专家来说，就具有了新的意义。耐人寻味的是，这个鼓励人们对熵及其对能源政策的意义要采取新的看法的人却不是一位科学家，也并不真的是一位能源专家，而是一位名叫格奥尔基斯库-罗根的来自范德比尔特大学的经常唱反调的经济学家。

长期以来，格奥尔基斯库就是行业中的一位受人尊敬的关于分析方法的批评家。他对他的同行们说，那个被广为吹捧的计量经济学模式是建立在物理学家自己在一百年前由于理论的发展而屏弃的一个物理理论即牛顿力学之上的。他说，人的生产-消费活动并不受一切都可以复原过来的力学定律的支配，而是受能源一经使用就不复存在的热力学定律的支配。格奥尔基斯库和他的支持者们断言，这个思想正是国家制定对付能源危机计划时所需要的东西。

格奥尔基斯库用他的颇为生动的罗马尼亚口音说：“经济学家喜欢说我们不能不花代价就得到一些东西。但是用熵的措词来说，任何生物或经济活动的代价总是比表面的代价还要严峻得多——任何这样的活动实际上是要产生亏损的。”斯坦福研究所的控制论学者约翰·J·福特也说：“格奥尔基斯库阐述的东西就是要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世界。能源政策制定者当然知道资源是会枯竭的。但是，如果你环顾一下周围的情况，从人们的行为方面你能看到人们了解这一点吗？大家仍旧按照似乎一切都是可以复原过来的观念在行事。”

**关于资源保护：**要使外行了解熵的具体情节，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把熵应用到经济学上，更使这个概念变得复杂起来。从最广义的角度来看，熵指出的是，宇宙的能源总是在继续减少着。一旦你消费了能源，它就不能再被使用——它是不能周而复始再加以使用的。因此，就象生态学家已经争辩了



许多年的那样，人类必须学会更加珍惜地球上的资源，因为他今天所浪费的是永远收不回的了。而且，他愈是加快使用他所有的东西，他创造出来的必须加以消除的废物也就愈多。而要清除这些废物，就又转而要消耗能量，又要有熵，如此等等。

格奥尔基斯库说，如果政策制定者懂得这个恶性循环，他们为将来制定的计划就会有很大不同。他的思想的某些内容如下述：

关于独立自主的计划：“这个计划的麻烦在于它最终是不起作用的。它意味着我们将较早地用光我们自己的资源，使我们完全依赖外部世界的日子更快地到来。”

关于节省劳力的设备：“我们必须把自己那种钻在剃须机里兜不出来的‘团团转毛病’医治好，那种毛病就是一个人更快地为自己剃须，只是为了要有更多的时间去钻研一只剃须速度更快的剃须机。”

关于军事-工业的复合体：“一切战争工具的生产——而不只是战争本身——应该禁止。这将为国际援助解放出巨大的生产力而并不降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

格奥尔基斯库的思想响彻了这样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但是他也发出了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警报：理论家们现在必须开始把这些概念结合到他们的理论中去，否则在这个世界一旦终于开始看到了这些症状时，在它有机会纠正这些问题之前，它已经把自己烧尽了。他说：“如果你从很长的时间来看问题，这些事情的确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对人类抱有任何的关切的话，我们就不能忽视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受到的遭遇。”

他的思想在他的著作《熵定律和经济过程》一书中得到了细致的阐述，这本书在一九七二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了第一版，现在已有普及本出售。在这本书中，他带领着读者穿过密布着

物理学、生物学、经济史和热力学图案的花毯，以证明他的这门新的学科“生物经济学”是有道理的，这门学科对人类在经济活动中使用能源这一问题给了较为充分的考虑。

关于绿色革命：他指出，使诺曼·博劳格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新高产作物品种也是“违反经济原则的”。他说，为了取得相等数量的粮食，这些超级品种需要大得多的能量，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化肥和更高的机械化程度。格奥尔基斯库并不是建议突然停止进行所谓绿色的革命。但是他的确说，从长期来看，人类将不得不把人口降低到可以仅仅依靠使用有机肥料的农业来供养自己的水平，而农业机械方面的投资将不得不缩小而不是扩大。这位经济学家若有所思地说：“如果我的同行们没有那样固执地抱住他们的力学教条，他们早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来的”。

当然，只有时间将会告诉我们，格奥尔基斯库把熵有力地应用于经济学是否将出现他的同行们在寻找的一个完整的新理论。但是他在经济学方面是素负盛誉的，这也有助于宣扬他的那些深奥的理论。例如美国商会的首席经济学家卡尔·H·马登就曾经仔细研究过格奥尔基斯库的想法而变成为他的理论的一个信徒。马登说：“这个人的成就在于他甚至超过了熊彼特的精确的思想，要求把生物学引进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中去。”约瑟夫·熊彼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哈佛大学经济系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曾和格奥尔基斯库同事过，他也曾使用过某种生物学的类比创立了公司和行业兴衰周期的理论。

经济学家同行保罗·塞缪尔森说，“格奥尔基斯库是一位不寻常的人”。“就象优质的法国勃艮第葡萄酒一样，全世界的经济学行家都是赏识他的。格奥尔基斯库来一下敏捷的回刺往往是能致人死命的”。



格奥尔基斯库的书的确是指向古典经济学的咽喉的一次猛烈的刺杀。可以理解，这一下猛刺被人们用怀疑的眼光（有时是公然的嘲笑）所挡住了。马里兰大学的曼库尔·奥尔森是怀疑者之一，他的专长就是能源经济学。奥尔森说：“别的抑制因素，象人口，可能在熵起限制作用之前就会起作用的。”科罗拉多大学的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也是一位批评者，他说新经济学的基础应该是知识的发展，而不是熵。不过，在为格奥尔基斯库的书所写的书评中，博尔丁写道，如果有五百个处于关键地位的人阅读这本书，“科学和经济学也许决不会仍旧保存老样子了。”

**受到攻击：**格奥尔基斯库的批评者并非都是这样彬彬有礼的。最厉害的攻击来自一位物理学家约翰·安德林，他是众议院能源小组委员会主席迈克·麦考密克的助手。“熵和经济学根本是没有联系的嘛！”安德林激烈地批评说，“格奥尔基斯库的书充满了神秘主义和空话。他所使用的时间尺度实在不够长。如果这本书在一百年内对任何东西有任何影响的话，那末我将不禁为之目瞪口呆了。”

政府中有的人也有安德林的同样看法，认为格奥尔基斯库的书对实用主义者是无用的。行政管理和预算局负责经济、科学和能源方面的助理局长（联邦能源管理局副局长候选人）约翰·希尔认为，这本书对政策的制定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他说：“我同经济学家们肯定有很多交道要打，但是格奥尔基斯库所论及的那种把学科综合起来的工作，简直令人感到莫名其妙。”

但是，格奥尔基斯库的大多数同行们认为，他至少是在试图走向某种目标。哈佛大学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也是正在试图把熵的概念类推到信息过程中去的肯尼思·阿罗认为，借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是经济学司空见惯的事。阿罗说：“关键全在于你借用的巧妙的程度如何。经济学涉及的是生产和商品从一种形



式转为另一种形式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可以直接应用熵的概念的物理和化学的过程。”

新的兴趣：电力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米尔顿·萨雷尔指出，各方面的经济学家都在开始对工程科学发生愈来愈大的兴趣。他说：“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在试图懂得更多的热力学。基于同样的理由，我发现愈来愈多的物理学家也在学习经济学。”

至于有人指责格奥尔基斯库的创新对现实世界没有价值这一点，商会的马登辩驳说，这样的说法未免过份了。“谁说不能作这样的类推的呢？”他问道，“那就象一位数学家对把二值逻辑应用于计算机的创始者冯·诺伊曼说：‘你不能在你的计数系统中以二进制为基础’。”

马登还否定了那些指责格奥尔基斯库的想法是对工商界的威胁的说法。他说：“工业时代所追求的旧的财富形式，堵塞了格奥尔基斯库所建议的那种不要一味追求数量的财富形式。你不能对我说讲究质量的经济学是没有工业利润可赚的。”

在此期间，格奥尔基斯库对围绕着他的辩论基本上保持不参与的态度。他着重地指出，他并不是说经济学家就此可以放弃他们常用的分析工具。“但是如果他们了解熵的含义，他们就会进而考虑更有效地使用能源的渠道了。”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美国《商业周刊》

钱志坚译）

## 旧金山唐人街的两次罢工

〔美〕《革命》月刊编辑部

在旧金山唐人街，李马和荣塞(译音)两厂工人进行了重要的斗争。中国移民的罢工是为了反对剥削和压迫。

在唐人街，血汗工厂比比皆是，肺病发病率在美国最高，居住的拥挤程度占了第二位，上万老年工人孤苦伶仃地等死。现在这些工人站起来了，他们进行了回击，把他们的斗争同旧金山海湾地区工人阶级的斗争结合在一起。

李马厂是跨国公司法里农电气公司所属的一家装配厂。该厂的斗争是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开始的，当时，由于允许管理人员能参加工会的表决而使斗争遭到了很大的挫折。厂方大规模解雇和折磨工人，李马厂的九十名工人中有四十多名被解雇或被迫辞职。

以后，李马厂工人到社会上去进行活动，他们同亚洲-美国人反帝组织“为民社”和“亚洲人社会中心”一起，制定了继续斗争和要求工厂重新雇用工会的六个领导人的计划。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他们组成了李马工人协会，发动了罢工斗争。

在整个唐人街和海湾地区电子工业中，李马成了一个鼓舞人心的称号。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注视着李马厂资方和法里农资方为一方同李马厂工人为另一方而进行的一场激烈的电视辩论。李马厂工人还把队伍开到康科德的拉克尔厂罢工线去，鼓舞那里的许多工人坚持斗争，在那里有五百名妇女于一九七四

年五月起举行了罢工。他们还在“五一工人运动组织”、“为民社”和“海湾地区电子工业工人组织委员会”主持的进军和集会上发了言。

一九七四年八月三日，法里农资方同意跟李马厂工人谈判，但拒绝答应工人的要求，因此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有一个李马厂工人总结罢工的体会说：

“在整个这次斗争中，我们依靠自己，依靠华侨社会和整个海湾地区的工人。上星期五，有一百多个工人从海湾地区和唐人街来到我们的纠察线。我们从李马厂进军到唐人街，散发了七千多张传单。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才使我们得以支持这么久。也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才能使我们得到彻底的胜利。”

李马厂的斗争不断发展成长，它和海湾地区的其他斗争联结起来。经过五个月的罢工斗争——散发了成千上万张传单、进行了示威游行等等——李马厂工人终于使资方同意重新雇用六个领导人和补发工资。许多已被解雇和被迫辞职的李马厂工人，包括上面六个人，都拿到了补发工资，但都在他们新的工作岗位上，在别的工厂里进行活动。

李马厂的斗争给唐人街其他工人提供了勇气。唐人街的罢工和向资方提出申诉的次数已急剧上升，这是李马厂罢工斗争的最伟大胜利。

在李马厂斗争开始后几星期，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开始在荣塞缝纫公司（唐人街最大的一家服装工场）组织工会。老板一发现，就开始解雇工人。在李马厂的影响下，工人决定于七月十五日罢工，要求承认工会。普莱恩·简公司（荣塞厂是该公司在唐人街经营的一家承包工场）的老板杜格·汤普金斯就此关闭了这家工厂，不准工人进厂。

在工人纠察线上发生了两次大规模逮捕。每次逮捕之后，都



有车辆开过唐人街散发成万张传单，使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揭露了警察和法庭所充当的角色。

七月二十日的游行车队是引起全体唐人街居民对李马厂和荣塞厂斗争注目的头等大事之一。这个车队共有二十五辆汽车，包括一辆宣传车，载着李马厂和荣塞厂的工人和支持者，沿路散发了一万多张传单，使整个唐人街的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服装工人从他们的工场里冲了出来争夺传单，老板则使劲把工场门窗关了起来。直到今天，人们还一直在谈论这支车队，这是唐人街空前未曾有过的事啊！

八月二十四日，有六百多人出席了唐人街工人庆祝会。在会上演出了战斗性的节目，有来自李马厂和荣塞厂工人的发言，有工人演出的有关他们斗争的短剧，有燎原烈火歌咏团和五四歌咏团的歌唱表演。出席庆祝会的一个服装业女工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怕老板了。”一位荣塞厂罢工工人在庆祝会的结束演说中说：“我们是为唐人街工人而战斗，为美国工人和为全世界工人而战斗。”

在唐人街内外举行了许多支持罢工的活动。当纠察和群众战斗性行动在普莱恩·简公司的主厂搞起来时，老板汤普金斯几次提出要把荣塞厂的所有权让给他的一个管理人员万克·科泽克，然后重新开工。十二月二日，科泽克来签署劳资合同时却拿不出一张证明他已买下了荣塞厂的所有权证件。这种欺骗行为是令人作呕的。于是工人们继续进行纠察活动，并对普莱恩·简公司施加压力。动员范围不断扩大。警察整天都守在那里。尽管有一天有四个人遭到逮捕，但在第二天纠察线上的人数却增加了两倍。

受到压力震动的汤普金斯，再次抛出由科泽克出面的诡计，希望这次能得逞。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科泽克签署了一个

合同。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说这是“真心诚意的签字”，并宣布解散纠察线。工会开了四个小时的会议之后，从海湾地区各处来支援罢工的工人，其中包括为工人所信任的译员，都被撵走了。

尽管有十位最积极的战士坚决加以反对，但未能争取到使大多数罢工者继续支持罢工。工会对她们说：“你们只是一帮连英语都讲不来的老太婆。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在这里是没有权的。你们是斗不过这个制度的。”

工人们等候复工等了一个月之后，才发现科泽克从未买下这个厂，这个合同原来是无效的。工会是在合同签订之后三天就知道情况的。当工人和支持者去工会办事处询问关于他们的工作着落时，工会除了对工人说了“你站在哪一边？工会一边还是支持者一边？滚出去！”的话之外，什么也不讲。

工会出卖了他们，解除了斗争的武装。在罢工期间，工会一次又一次地叫把纠察撤除，这就使越来越多的工人看穿了工会以及它在开始时许下的玫瑰色诺言的实质。利用工会就是普莱恩·简公司能削弱罢工工人力量的唯一可行办法。而后，就在撤除纠察和工人等候复工的一个月中，这家公司终于得以把工厂永久关闭，把机器全部卖掉。

到罢工将结束时，纠察线上有四个人遭到逮捕，工会却对警察说它对这事不负任何责任，实际上就是工会同意警察为所欲为。当罢工工人在第二天进行另一次动员时，工会一早赶来，象往常一样，恫吓工人，要他们离开。工会代表说：“双方之间搞得太紧张了。”工会领导已准备好让这四个人去坐牢，其中一个还是工会会员哩！

工会是按照公司的最高利益行动的，而且在罢工支持者中间还有工会领导人的代理人，例如亚洲人“共产党”组织义华馆

(音译)就是。在罢工中,它一直不断地提出要有工会来领导。实际上这伙人从外表到行动上都是工会的爪牙。

义华馆只是和最落后的人混在一起,形成一个作为工会外围组织的反动集团。工人们把他们这伙人看成是工会的坐探。一个感到气愤不堪的荣塞厂罢工工人评论说:“它们只为工会作翻译工作,而不是为我们工人作翻译工作的。如果工会是头的话,他们只是一味附和的尾巴。”义华馆虽然打的是华裔美国人的旗号,但采用极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办法,也几乎没有为唐人街社会做过什么事。他们搞了一个宣传牌,对其他力量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加以攻击。

跟从工贼及其反动的假“共产党”盟友的背叛行为中所得到的教训相比,对荣塞厂和李马厂工人来说,意义更为重大的是,使他们懂得了,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以及工人阶级能够而且将在一切斗争中起作用。

在发展旧金山海湾地区的革命工人运动中,“五一工人运动”中工作的“革命联盟”成员建议于一九七四年九月六日举行一次反帝的工人进军,把唐人街以及慕尼黑公交公司等城市工人的斗争联结起来。

对于必须使李马厂和荣塞厂的罢工从狭隘的工联主义道路上摆脱出来,有些人不领会。他们认为这次进军和散发传单是把“水平提得太高了”。这些持有“阶段论”的人认为并不是所有工人都想要共同前进的,因此前进是根本不可能的。为了反对这一种倾向,下面作了一个分析以便能了解在荣塞厂和李马厂工人中谁是先进的力量。

在中国移民工人中间,有许多人出身于小资产阶级。这些人往往比其他人接受过更多的教育,即便最多只读到八年级也罢。在荣塞厂斗争中,其中有些人被别的工人和支持者称做“知识工



人”。他们能读会写，较熟悉情况，在斗争开始时他们表现得最有声有色。于是他们就控制了荣塞厂十四人罢工委员会名额的极大部分。但是这些“知识工人”在日子难过时就动摇起来了。极少数比较落后的工人则出身于类似的或甚至是上层的诸如地主、军人或国民党的家庭。

在李马厂斗争中最有代表性的另一群工人是出身于工人阶级的移民，他们有大量在社会化工业部门工作过的经验，其中有些人还有过组织工人的经验。这些工人往往是最先进的。他们很快就看出了那些工会和机会主义分子的性质，懂得必须依靠他们自己、社会和整个工人阶级来进行他们的斗争。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更加日益意识到这个斗争的阶级性。

九月六日成功的进军驳斥了这个“阶段论”，证明工人并不是一批没有一定目的、也没有内部矛盾的群众。这个阶级分析实际上证明这些矛盾乃是进步的基础。必须提高斗争的水平和对斗争的认识，否则就要倒退。工人必须更加意识到自己是革命阶级的一部分，才能提高斗争的水平和对斗争的认识。他们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一下子做到这样的程度的。

经历了李马厂和荣塞厂的罢工斗争之后，旧金山唐人街再也不会是老样子了。这些罢工斗争推动了华侨社会和一些行业去进行迫切需要的斗争，从而对整个工人阶级的斗争作出重要的贡献。这些罢工斗争为在更高水平上进行更多的活动奠定了基础。我们向李马厂和荣塞厂的工人们致敬！团结起来的人民必胜！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四月号美国《革命》月刊 陈敏紫译）

## 列昂节夫

列夫·阿·列昂节夫，苏联经济学家。一九〇一年三月生于考纳斯，一九一九年加入苏联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在红色教授学院毕业以后，从事科学和教育活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工作，任务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学著作译成俄文。这期间曾一度在高级党校任职。一九三五年起，转到《真理报》编辑部工作。一九三九年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一九四三年起任《新时代》杂志副主编。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三年，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负责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工作。一九七四年六月死去以前是苏修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领导成员。

一九五三年以前，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列昂节夫写过一些比较好的著作和文章，一九三五年写的《政治经济学》一书，文字比较通俗。此外，他还写过《关于列宁论帝国主义的笔记》、《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等书。

自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苏联篡党篡政、复辟资本主义以来，列昂节夫参与鼓吹修正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发表恶毒的反华文章，例如，他在一九七二年第三期苏联《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杂志上发表的题为《世界解放运动的历史路标》的反华文章中，就竭力对我进行恶毒攻击。他说：“帝国主义把巨大的希望寄托在北京领导集团的分裂活动上，后者执行的是大国沙文主义的反苏政策。”在这篇文章中，列昂节夫还攻击我

党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政策，诬蔑为什么“大汉沙文主义”。同时，他还挑拨我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说什么“在北京反苏集团和践踏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利益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当苏联这个世界社会主义的强国，给巩固自己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国家以全面的帮助和支持的时候，北京领导集团执行的是相反的政策。当然，它们是用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伪善言辞来掩盖它们的本质”。列昂节夫的晚年言行证明，他已沦为苏修叛徒集团的御用工具。

（靳 翔）



## 汉森——美国的凯恩斯

〔美〕保罗·塞缪尔森

**编者按：**阿尔文·汉森，一八八七年生。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的忠实门徒，曾任美国政府和联邦储备银行首席经济顾问、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和哈佛大学教授等职。汉森被认为是多产作家，著有《财政政策与商业循环》、《经济政策与充分就业》、《凯恩斯学说指南》等书，在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有一定的影响。一九七五年汉森死去。同年六月十六日美国《新闻周刊》刊载了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保罗·塞缪尔森为纪念汉森所写的一篇悼词，本刊予以摘译发表，供参考。

就政治经济学而论，哈佛校园里的黄金时代可以更恰当地称之为汉森时代。满载多年荣誉、刚于上周去世的阿尔文·汉森，往往被称之为美国的凯恩斯。但是这个称呼对他来说是并不公允的。

确实，汉森是凯恩斯开辟新径、别树一帜的经济分析方法在美国的主要解释人，而且由于凯恩斯主义的经典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一九三六年出版时，汉森早已是中年人了，因而这一切显得格外惊人。正如伟大的原子量物理学创始人普兰克所说的那样，科学促成一系列的进步，老的学说决不转换为

新的学说，它们干脆被新的一代所替代。汉森则是一个例外。他读了凯恩斯的著作，开头并不同意作者的论点。后来他反复阅读凯恩斯著作，终于同意了。

更重要的是，他详细拟定了新的凯恩斯范例的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但也包括货币政策）的含义。美国是一个丰裕而庞大的大陆经济，实际上较之英国更适合推行凯恩斯的新理论。

罗斯福总统开始完全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他在反对胡佛的竞选演说中作了平衡预算的诺言。他的早期智囊人物，其激进的程度，充其量不过是凡勃仑式的计划者，对于现代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错综复杂性的无知程度，不亚于他们痛骂的老一辈银行家。

但在罗斯福第二任期内，生活现实衰沉下去，使“国家复兴法”和“炉边谈话”本身都不足以恢复繁荣；计划工作的美丽辞藻不足以提供工业所需的货币需求，为不自愿失业的四分之一的人口提供工作职位。预算亏空不但远不是萧条的一个不幸的伴随物，而且这个国家如果要重新运行的话，还应该有意识地加以设计。这是汉森同他的哈佛训练的经济学家逐渐使总统和国会懂得经济生活的现实。

对一般公众来说，汉森名声之所以受到挫折，是由于他关于象我们这样丰裕的国家多半会面临长期停滞问题的学说。

凯恩斯体系的汉森动态翻版要求：随着土地的增加，人口也要大量增长，来适应储蓄和投资的活跃平衡。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迹象表明：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都在继续下降。最后，汉森同他的哈佛同事约瑟夫·熊彼特都强调技术革新和发明对于提供私人投资支出动机的重要作用。根据公司储蓄来提供内部资金来源的记录，以及节约资本而不是节约劳动的技术革新，汉森提出了他的在未冲淡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引起

长期停滞的学说。

这种学说使汉森在保守派中不得人心。没有人喜欢注定有劫数的预言。但更不得人心的是这个预言家建议政府对他所提出警告的问题采取些措施。他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好斗的倡议者，一方面要稳定商业循环的起伏，同时要保持充分就业、储蓄和投资的平衡。

第二次世界大战暂时驱除了这些担忧。汉森是少数受尊敬的预言家之一，正确地预见到战事的结束不会带来大规模失业，反而会造成重置存货的繁荣。汉森早在三十年以前首先看出下列情况之一，即“混合经济”不能同时带来充分就业、稳定的物价水平和自由市场工资以及规定物价的制度。

汉森活着看到他的预见得以实现。使政府创纪录地负责提供工作机会的“一九四六年就业法”是他的永恒的遗产。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美国《新闻周刊》

徐宗士译）



# 中国和日本

〔日〕贝冢茂树

**编者按：**在日本，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很多。一九七四年开始分卷出版的十卷本《中国历史》是其中的一种。本文是该书的前言，由主编之一的贝冢茂树所写，特译出，供参考。

## 同种之中的差异

中国和日本是隔海相邻的国家。而且，自古以来日本是受了亚洲先进国家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它的刺激下发展了独特的文化。理解这个关系密切的邻国，对现代的日本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决不能说我们已正确地理解着中国的事情。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正是由于日本同中国的关系太密切，文化方面受了后者的巨大影响，就认为中国对日本是一个毋须研究的国家，因而不去深入思考两国的差异。

从人种方面来考虑，日本同中国在广义上属于同一个蒙古人种。然而，中国是广阔的大陆国，各地区的发展多具特色。华北的中国人最为高大。人们认为，日本人的体质同长江以南的中国人相似。虽然在体质上属于同一蒙古人种，但仔细地看看，就有相当的差异。

## 汉字和汉字文化

自古以来,日本就一直吸收中国的先进文化,其中最大的文化遗产是汉字和由它表现的思想。应神天皇时<sup>①</sup>,百济国王遣学者王仁将《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赠送我国。王仁当了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教他汉文典籍。《古事记》载,结果王仁的子孙世世代代在古代日本掌管文书工作。

关于这个传说,有东洋史,本国史学者的各种研究,不管怎样,汉文的经典和孔子的《论语》,经过朝鲜半岛的百济国从中国传到了古代的日本。

不知文字的古代日本人采用了汉字,而且让传授它的人担任秘书职务,用汉文撰写宫中与官厅的文件。日本古代国家的机构,靠着这个汉字汉文的传入而开始完善起来。

飞鸟时期<sup>②</sup>以来,日本派遣隋使、遣唐使前往中国,努力吸取中国文化,贵族们热情地学习汉文的经典、诗文等等,不久就从表意文字的汉字中创造出音标文字的假名<sup>③</sup>来。然后又研究出用这种假名将先前由口头流传下来的诗歌传说写成作品的方法。

由于这种假名的发明,日本的古代文学同汉文学并行发展,成为日本国民文学独立的基础。《万叶集》、《古今集》等诗集和《源氏物语》等日本文学最古的古典作品就这样地产生了。

---

① 出卒年不详。根据《日本书纪》,他是日本传说中的第十五代天皇,名誉田别。日本有的历史学者认为,我国《宋书》中提到的倭王赞就是应神天皇。

② 飞鸟是奈良县高市郡飞鸟村一带的地名,是推古天皇以后百余年间的皇都所在地。飞鸟时期广义地是指圣德太子就任摄政的五九三年(推古一年)至七一〇年(和铜三年)迁都平城时止的时期。

③ 日文字母。

## 地理条件的不同

中国是占有亚洲大陆东部的辽阔的大陆国，日本是连绵于其东方海上的狭小的岛国。这个地理位置和环境的差异，是造成两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显著差别的原因之一。

日本同亚洲大陆的地理关系，很象岛国英国同欧洲大陆的关系。可是，隔开英国同大陆的多佛尔海峡不超过四十公里，据说在大晴天可以隐约望见对岸。与此相比，隔开日本同朝鲜半岛的对马海峡，则宽达两百几十公里，为前者的五倍之多。这个海峡的宽度所造成的日本列岛地理上跟外界的隔绝，对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对日本国民性格的形成，都给予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越过狭窄的多佛尔海峡，从欧洲大陆运送大军去征服英国，即使在航海术不怎么进步的帆船时代，只要这个岛国不是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国家，这也并不是具有什么困难的冒险。就是这个缘故，英国曾经成为罗马帝国的殖民地，而且被本来是海盗的诺曼民族征服过。与此相反，拿日本的情况来看，连征服了亚洲大陆的大部分，甚至将侵略魔手伸至东欧的强大的蒙古帝国，虽然尝试了文永、弘安年间两次大规模的对日侵犯，却终于以失败告终。其理由虽然可以作种种的考虑，而在军事上看来，在亚洲大陆上四处驰骋的蒙古骑兵，就象是现代在陆地上作战的装甲部队，那坐骑就算是现代的坦克。这种重要的武器——马匹，因对马海峡的长时间航行搞得精疲力竭，登陆后不能立即发挥其特有的机动能力，因此登陆作战陷于胶着状态：这也是原因之一。

然而，仅仅地理条件不是决定历史的因素。蒙古来犯的当



时，从藤原的文弱的公家<sup>①</sup>时代进入了崇尚勇武的镰仓武士的时代，这对日本是幸福的。日本的封建武士划分繁复，实行全国统一的军事行动是相当困难的。虽然如此，集结在博多海岸的武士团，不畏蒙古的大炮等新武器，持续进行了激烈的防御战。倘若日本的公家时代照旧延续到这个时期的话，也许蒙古骑兵会轻易地在日本登陆，靠着拿手的机动能力征服了日本列岛。

## 文化的吸取与创造

从奈良时期至平安时期（六〇〇年至八九四年）的三个世纪，日本派了二十一批外交代表团作为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国去。每回两艘至四艘船，每艘船员平均约一百二十人，因而同军队的输送比较起来是小规模的。虽然如此，因为当时是船舶构造低劣、航海术未臻熟练的时代，所以遣唐使曾八次在海上遇难。虽然也有象唐招提寺的鉴真那样的高僧，为了将佛教的戒律传到日本，多少回船只遇险也不气馁，终于得偿宿愿。但相当数量的日本的使节、儒僧、留学生和技术人员，成为这种失事船只的牺牲品。

不怕这种危险，越过波涛汹涌的迢迢海洋，敢于前往中国的僧侣、学者等留学人士的寻求教义、有志学习的热情，是使日本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由隔开中国同日本的地理上的距离而引起的航海的危险性，反而促成把被选拔的代表日本民族的智慧和坚强的信念的青年学生派遣到中国去。学成回国的学生，理解佛教、儒教自然不在话下，其中理解中国文学艺术的精髓的人也为数颇多。他们当中有在比睿山创始了天台宗的最澄、在高野山建立了真言

<sup>①</sup> 指天皇、朝廷。

宗的空海、被称为书法圣手的橘逸势等人。用不着说，他们带回日本的大陆文化，成了以后日本文化发展的基础。

唐的内乱成为一个理由，根据菅原道真的提议，遣唐使被停止派遣；以后，官方代表团没有了，然而私人找到便船渡海去中国的人，似乎很多。而且，当唐朝灭亡、宋王朝一统天下以后，私人身份的留学僧的往来就又频繁起来。

同大陆中国的正式邦交中断期间，成了自奈良时期至平安时期输入的隋唐文物被改造为适合于固有的日本民族性的时期。如长篇小说《源氏物语》那样远超过当时世界文学水平的独创性的文学作品，就是产生于那一时期。

建国于东方海上的日本民族，同东亚大陆的中国的高级文化对比起来，是迟了很久才开始了自己的历史。能够同西罗马帝国相较量的文明国家——汉王朝的文化，同古坟时代日本古代国家的胎动阶段的文化上的落差，是无法设想的。那时，世界上最大最高的文明国家——隋唐帝国同飞鸟时期的落差虽颇有缩短，但仍然是相当可观的。这种文化上的落差，随着时代的前进逐渐缩短；进入德川时期，国家的规模虽小，却产生出非常完备的体制。

这样，日本在地理上的孤立，促使它不断向大陆寻求优秀文化，把先进国家的文化输入进来。日本以此为基础，对它的刺激作出了反应，因此，地理环境本身反而成为培植民族独特文化的极好条件。

## 中国文化的历史特征

中国和日本在亚洲大陆的东端，在世界中的地理位置有相同之处。中国是世界上古代文明国家之一，但同埃及、美索不达

米亚、印度等东南亚和南亚的各古代文明国家距离相隔甚远。这种地理位置造成的文化上的孤立，固然是中国的，也是在它东边的日本一起被安排好了的历史命运。

在东亚世界，文化上先进国家的中国民族，因为它的周围并没有同它对立的高级文化的民族，因而不知不觉之间怀有这样的自信：中国是位于世界中心的百花争妍似的文明国家，也就是“中华”。这种东亚文明处于远离西方文明的地方，似乎是孤立的样子。可是这种孤立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北方，越过中亚细亚的草原、沙漠、喀喇昆仑山的峻岭，通过依靠骆驼背的商队和被叫做朝贡的同游牧民族之间的政治性贸易，中国同西方世界，虽然是断断续续地，却一直在进行文化的交流。

在这种交流中，中国遇到的第一回而且是最大的事件，是从在亚洲同中国并列为文明古国的印度传来了佛教。

佛教在它的创始人释迦牟尼逝世四百多年之后，经过中亚细亚，于公元一世纪左右传播至中国。起初，它被误认为盛行于中国汉代的民间宗教，即信奉神仙的原始道教的一派而加以信仰，约于后汉末年（二世纪下半期）动手汉译佛教经典以来，才开始为人们承认它是具有教义的高级宗教。在初期，这种承认是被人们以中国土生土长的儒教和老子、庄子等人的思想为媒介，对佛教作了中国式的理解，而从五、六世纪前后开始，不再借助它们的媒介，差不多完全理解了佛教独特的宗教思想体系。

这样，流传以来经过五个世纪的漫长时间，好容易才正式地接受了对中国说来是产生于异国的异质的宗教，这在一方面显示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抵抗外来的文化、思想的坚定性。还有，在另一方面，虽然进行了极激烈的抵抗，但终于将它完全消化，作为中国的宗教而扎下了根，这表现了中国未必是绝对排斥外来的文化，只会作出拒绝的反映的国家。



而且,佛教从南北朝时期至唐代,不仅在宗教界,还在思想界压倒儒教而掌握了主导权。到唐代中期,儒教方面趁当时的文人韩愈发表排佛议论的机会出现了反动。于是,以此为转折点,宋代的新儒教即所谓宋学继而勃兴,成了思想界的主流。中国的思想努力消化了外来的佛教之后,靠着它的刺激,改革并且改造了儒教。通过这个儒佛两家的主导权的争夺,中国思想的传统不单是排斥别种文化,而是一面很好地吸取它,一面自己得到了发展。

中国在它地理上孤立的环境中,利用了同外国高级文化的微少的接触机会。它并不囿于固有的传统,一直拒绝异质的文化,而是吸取它,不断取得了进步。尽管那样,当初碰上佛教之后,花费了几个世纪,好不容易才正式地接受了它,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是相当巩固的。

## 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应付

中国同其他高级文明的第二次相遇,就是碰上了开始于十六世纪的西方近代文明。同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比较起来,西方近代文明同中国的接触,不仅是文化方面的,也是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由于科学技术、特别是航海术的发达,西方文明是随着近代西方各国的帝国主义侵略而传来。尤其是因为一八四〇年同英国之间发生的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朝这个由异民族统治的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国家被陷于崩溃的危机之中,由于随后发生的民国革命而终于灭亡。

中国对西方各近代文明国家的东进的应付方法,同应付印度的佛教时一样,经历了非常缓慢的过程。其结果:搞到将重要港口和一些半岛割让给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日本等国作为其

领土或租借地那样狼狈的地步，陷入了半殖民地的状态。

中国同日本之间，在应付这种西方近代文明的态度上有了很大的差异。中国在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中败于英国的消息，通过荷兰被带到日本。那时以前，西方的医学、自然科学即兰学，已经过长崎相当普及于日本。于是，一部分以这个兰学为根据的学者，在某种程度上已被世界形势打开了眼界。一八三八年高野长英在《梦物语》中促使人们注意西方大国——英国的实力之可怕。而在中国，战败后的一八四二年，魏源的《海国图志》才广泛地把世界知识传授给有识之士。

一八四一年鸦片战争进行中间，在日本，高岛秋帆在军队中实行了洋式训练。之后，由于一八五三年佩里率美国舰队来访，从而人们具体地对西方近代武器的威力感到惊奇，于是着手进口武器和培训近代化军队。一八五五年在长崎设立海军学校。一八五七年设立釜石冶炼厂，开始了炼钢事业。中国比日本迟了二十年才决心搞军队的洋式训练。这个二十年的落后，终于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处境搞得极其艰难。

同中国迟迟应付西方近代文明比较起来，日本却能早就对此作出反应，这是因为中国是东亚先进的文明国家，没有接触过同本国对立的文化，从而不知不觉之间为中华意识所束缚，对于正确掌握世界的国际关系、制定应付它的政策缺乏热情。

与此相反，东亚海上的岛国、一直热情地输入中国和印度的先进文化来作为本国文化发展的基础的日本，把西方文明作为代替中国的新颖的异质的先进文化，简单地承认它，怀着热忱尽力从事西方文明的认真接受。

自德川末期至明治年间，日本输入西方文明和对其理解的速度是惊人的。用不着说，日本已经习惯于接受中国的儒教、印度的佛教那样的外国先进文化，对西洋文明格格不入的感觉是

淡薄的,而且,即使在德川时期,通过私塾以儒学为基础的教育,至少是假名等的阅读、书写和使用算盘的计算,在人民群众中已经普及,这成了接受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础。

## 东亚世界共同的文化遗产

我们这部《中国历史》,是作为为了比较并正确理解日中两国的文化和历史的初步尝试而编写的。

日本同古典中国的关系,恰好可以同近代欧洲各国如英、法、德等国同希腊和罗马的关系相比拟。这些国家将希腊、罗马当作共同的古典文化来研究,当作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

中国的古典文化,对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各国说来,是它们公共的遗产。往昔的希腊、罗马完全灭亡了,现代的希腊、罗马人在民族方面处于变化之中,因而正在变成不是前者的正统的继承者。所以,希腊、罗马的文化能够照原样成为近代西方各国的古典文化。

然而,在中国,虽有异民族的侵入,屡次建立了征服王朝,但中国民族总的说来是照样继承了古典文化,把它发展了下来。希腊、罗马的文化是纯粹的西方古典文化,而中国的古典文化则是东亚的古典文化,同时又是中国的国民文化。

日本人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艰巨性就是由此而产生的。也许对中国学者说来,中国的经典首先是属于自己国民的。但是,中国经典另一方面又是东亚民族的公共遗产。就我们日本学者来说,必须一面对中国人的这种感情有充分的理解,一面开展关于中国的文化、历史的研究。

(丁日初摘译)